

# 斯大林全集

第十一卷



## 第十一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包括約·維·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的著作。

這個時期，布爾什維克黨依據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已經獲得的成就，為引導勞動農民羣衆從個體經濟的道路轉到集體農莊社會主義經濟的道路展開了緊張的準備工作。黨始終如一地執行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農業集體化的方針，為農民大批加入集體農莊準備了一切必要條件。

自從黨轉為向富農進攻，布哈林—李可夫右傾投降主義敵對集團就拋棄了假面具，公開反對黨的政策。

在『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員』一信中，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等演說中，在『墮落到極點了』一文和其他著作中，約·維·斯大林揭露了右傾的富農反革命本質，揭穿了右傾投降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反蘇維埃秘密組織的破壞活動，指出了必須進行不調和的兩條戰綫的鬥爭，同時集中了火力反對右傾。

在『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

「總結」的報告中，在『糧食戰綫上』的談話中，在『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的演說中，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在『論糧食收講和農業發展的前途』的講話中，在『列寧和聯合中農問題』一文和其他著作中，約·維·斯大林確定了解決穀物問題、建設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鞏固城鄉結合的主要途徑和方法。在這些著作中，約·維·斯大林論證了迅速發展工業——社會主義和國防的基礎的必要性，提出了造就工人階級出身的、能掌握科學和技術的新幹部的任務。約·維·斯大林着重指出了迫切需要全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認為這是布爾什維克教育幹部的的方法，是蘇維埃社會發展的動力。

第一次發表的著作『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在民族問題方面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並論證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在這篇著作中，約·維·斯大林提出了關於第一次在蘇聯形成的新式民族即社會主義民族的原理，指出了資產階級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之間的原則差別，着重指出了社會主義民族的團結性和生命力。

編入第十一卷的還有約·維·斯大林的著名演說『論紅軍的三個特點』。這篇演說指出了紅軍的力量和威力的泉源，規定了進一步鞏固紅軍的辦法。

『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總結』的報告和『論共產國際綱領』、『論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危險』兩篇演說論述了國際革命運動問題和各兄弟共產黨的任務。約·維·斯大林着重指出了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國際意義。約·維·斯大林說明了蘇維埃國家的新經濟政策

是世界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必經的階段。

第十一卷中第一次發表了約·維·斯大林的下列十四篇著作：『論糧食收購和農業發展的前途』、『收購運動的初步總結和今後黨的任務』、『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員』、『論共產國際綱領』、『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給古比雪夫同志的信』、『答什·同志』、『答庫什特謝夫』、『墮落到極點了』、『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答比里—別洛策爾柯夫斯基』、『致普羅斯庫羅夫城的賀電』、『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

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



# 目 錄

|   |       |
|---|-------|
| 第十一卷說明  | 一—三   |
| 論糧食收購和農業發展的前途（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西伯利亞各地區的<br>講話節錄）（簡要記錄）                 | 三—一〇  |
| 收購運動的初步總結和今後黨的任務（給聯共（布）各級組織）                                  | 一一—一八 |
| 慶祝紅軍建軍十周年賀電   | 一九    |
| 論紅軍的三個特點（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蘇維埃紀念紅軍<br>建軍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的演說）            | 二〇—二四 |
| 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一九二八年<br>四月十三日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 | 二五—三〇 |
| 一 關於自我批評  | 三一—三六 |
| 二 關於糧食收購問題  | 三六—四〇 |
| 三 沙赫特事件   | 四〇—四四 |

四 總結

致科斯特羅馬工人的賀電

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一 加強工人階級的戰鬥準備

二 組織自下而上的羣衆性的批評

三 青年必須掌握科學

給「青年團真理報」（紀念創刊三周年）

給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紀念成立十周年）

在糧食戰綫上（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紅色教授學院、共產主義科學院、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的談話節錄）

給共產主義科學院黨建組組員的信

列寧和聯合中農問題（答斯·同志）

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答弗魯姆金）（關於弗魯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來信）

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  |        |
|--|--------|
| 聯共(布)中央全會(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 .....                               | 二三一—二七 |
| 論共產國際綱領(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的演說) .....                                  | 二五—二七  |
| 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的演說) .....                                | 三六—四   |
| 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演說節錄) .....                            | 四—七    |
| 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總結(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br>聯共(布)列寧格勒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 ..... | 七一—八   |
| 一 共產國際的問題 .....  | 七一     |
| 一、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基本問題 .....                                     | 七一     |
| 二、共產國際綱領 .....   | 七      |
| 二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   | 七      |
| 一、關於糧食收購政策的問題 .....  | 七      |
| 二、關於造就工業建設幹部的問題 .....  | 六      |
| 三 結論 .....   | 六      |
| 給列寧格勒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協會 .....  | 八      |
| 給古比雪夫同志的信 .....  | 八      |
| 悼念伊·伊·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同志 .....                                   | 九      |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聯共(布)

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二九一—三〇〇

答什·同志.....

三〇六—三〇八

致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慶祝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十周年的賀電).....

三〇九—三二〇

紀念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十周年.....

三二一

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的演說).....

三三一—三三九

一 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

三三三

二 穀物問題.....

三三三

三 關於反對各種傾向和對這些傾向的調和態度的鬥爭.....

三三一

給斯摩稜斯克省『線軸』工廠的工人和雅爾采沃工廠的工人.....

三三〇

給『紅色工會國際』工廠的工人(別日察市).....

三三一

紀念伏龍芝工農紅軍軍事學院十周年.....

三三三

論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危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共產國際

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的演說).....

三三六—三三七

一 資本主義穩定問題.....

三三四

|   |         |
|---|---------|
| 二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問題   | 三三七     |
| 三 德國共產黨問題   | 三六〇     |
| 四 德共黨內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分子   | 三六四     |
| 五 關於秘密信和公開信的草案  | 三六六     |
| 答庫什特謝夫  | 三六八—三六九 |
| 墮落到極點了  | 三七一—三七五 |
| 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一月底和二月初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的發言節錄)(簡要記錄) | 三七一—三九六 |
| 答比里別洛策爾柯夫斯基   | 三八〇—三八三 |
| 給「紅三角」工廠的男女工人   | 三八六     |
| 致普羅斯庫羅夫城第一紅色哥薩克團的紅軍戰士、指揮員和<br>政治工作人員的賀電                           | 三八九     |
| 給「農業報」的祝詞   | 三九三     |
| 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 三九六—四〇五 |
| 一 「民族」概念  | 四〇六     |
| 二 民族的產生和發展  | 四〇八     |

|                   |         |
|-------------------|---------|
| 三 民族和民族語言的未來      | 二五      |
| 四 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      | 三〇〇     |
| 註釋                | 三〇七—三二六 |
| 年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 三二七—三四  |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 論糧食收購和農業發展的前途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西伯利亞各地區的講話節錄(三)(簡要記錄)

我被派到你們西伯利亞來一個短時期。我的任務是幫助你們完成糧食收購計劃，同時和你們討論關於農業發展前途以及在你們邊區展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建設的計劃的問題。

你們一定知道，從我國糧食平衡表上可以看出，我們今年缺糧一億多普特。因此，政府和中央委員會不得不加強各地區的糧食收購工作，以便補足我們糧食平衡表上的這個缺額。消滅缺額首先要靠豐收地區，所以這些地區不僅要完成而且要超額完成糧食收購計劃。

你們當然知道，如果缺額不消滅，它會造成什麼結果。它會使我們的城市和工業中心以及我們的紅軍陷於困難的境地，使它們的供應狀況惡化，使它們遭受飢餓的威脅。顯然，我們不能讓這種情形發生。

對於這一點你們是怎麼想的呢？你們打算採取什麼辦法來履行自己對國家的義務呢？我在你們邊區各地走了一趟，這使我有可能相信，你們這裏的人沒有真正關心如何幫助我們國家擺脫糧食危機。你們的收成很好，可以說是空前的。今年你們的餘糧比哪一年都多，而糧食收購計劃却沒有完

成。爲什麼，有什麼理由？

你們說，糧食收購計劃太緊，完成不了。爲什麼完成不了，這是從哪裏說起呢？今年你們的收成的確是空前的，難道不是事實？今年西伯利亞的糧食收購計劃和去年幾乎一樣，難道不是事實？爲什麼你們認爲計劃完成不了？請看看富農吧：他們的穀倉和木棚裏堆滿了糧食，由於保存的地方不夠，連草棚下也堆了糧食；除了種子、口糧和牲畜飼料以外，每戶富農還有五六萬普特的餘糧；而你們却說糧食收購計劃完成不了。你們這種悲觀主義是從哪裏來的呢？

你們說，富農不願意拿出糧食來，他們在等待糧價提高，他們寧願進行瘋狂的投機。這是事實。但是富農不單是等待糧價提高，而且要求把糧價提高到比國家價格高兩倍。你們認爲可以滿足富農的要求嗎？貧農和很大一部分中農已經按照國家價格把糧食賣給國家了。能不能讓國家付給富農的糧價比付給貧農和中農的高兩倍呢？只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就會懂得滿足富農的要求是絕對不容許的。

既然富農在糧價上進行瘋狂的投機，爲什麼你們不懲辦他們呢？難道你們不知道有對付投機的法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七條嗎？根據這條法律，投機犯應當送交法庭判罪，商品由國家沒收。爲什麼你們不使用這條法律來對付糧食投機分子呢？難道你們怕擾亂富農老爺的安寧嗎？！

你們說，對富農使用第一百零七條是一種非常措施，這樣做不會有好結果，只會使農村情況惡

化。查古明尼同志特別堅持這一點。就算是一種非常措施吧，那又有什麼呢？爲什麼在其他地區使用第一百零七條產生了很好的結果，把勞動農民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並且改善了農村的情況，而在你們西伯利亞，使用這條法律似乎一定會產生不好的結果並使情況惡化呢？爲什麼，有什麼理由？

你們說，你們的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還沒有準備好做這種工作。但是，爲什麼其他地區的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已經準備好並且工作得十分順利，而在你們這裏，這些機關却還沒有準備好對投機分子使用第一百零七條呢？這是誰的過錯？看來，這是你們黨組織的過錯，你們黨組織的工作顯然做得不好，沒有設法使我們國家的法律得到切實的執行。我看到了你們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好幾個幹部。他們幾乎都住在富農家裏，在富農家裏做食客，所以他們自然要竭力同富農和睦相處。我問過他們，他們回答說，富農的住宅乾淨些，吃得好些。很明顯，決不能指望這樣的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幹部會給蘇維埃國家做出什麼好的和有益的事情來。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麼直到現在這些先生還沒有被清洗掉，還沒有由另外一些誠實的工作人員來代替。

我建議：

(甲) 要富農立刻按照國家價格交出全部餘糧；

(乙) 如果富農不服從法律，就依照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七條把他們送交法庭判罪，餘糧由國家沒收，從沒收的糧食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五，按低廉的國家價格或者用長期信貸的方式分配給貧農和力量單薄的中農。



至於你們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幹部，那末應該把所有不中用的一律撤職，而以忠誠老實的蘇維埃人代替他們。

你們很快就會看到這些措施將產生很好的結果，你們將不僅能夠完成而且能夠超額完成糧食收購計劃。

但是問題還不限於此。採取這些措施只能使今年的情況好轉，但不能保證富農明年對於糧食收購不再怠工。不僅如此，可以肯定地說，只要富農存在，對於糧食收購的怠工就一定會存在。爲了使糧食收購工作有比較穩固的基礎，必須採取其他措施。什麼措施呢？我指的就是展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建設。

你們大家都知道，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是能夠採用拖拉機和機器的大農場。這種農場比地主和富農的農場能出產更多的商品。應當注意，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工業正在發展，並且將一年比一年發展。這對於國家的工業化是必要的。因此，糧食的需求將一年比一年增加，也就是說，糧食收購計劃將擴大。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工業任憑富農擺佈。因此，必須在最近三四年內做到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些糧食繳納者至少能夠供給國家所需糧食的三分之一。這樣做就能把富農排擠到後面去，並能給比較正常地供應工人和紅軍糧食的工作打下基礎。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不惜人力和物力，大力展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建設。這是可以做到的，並且是我們必須做到的。

但是這也不够。我們的國家不能只看到今天。我們還應當想到明天，想到我國農業發展的前途

以及我國社會主義的命運。糧食問題是農業問題的一部分，而農業問題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勉強強供應工人階級和紅軍糧食，有了我剛才所說的農業局部集體化就夠了，但是要做到下面兩點，單靠農業局部集體化却是完全不夠的：

(甲) 建立一個能充分供應全國糧食並能保證國家掌握必要糧食後備的牢固基礎；

(乙) 使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村中，在農業方面獲得勝利。

目前蘇維埃制度是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上：聯合的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蘇維埃制度不能長久地建立在這兩種不同的基礎上呢？不，不能。

列寧說，只要產生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還佔優勢，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會存在。顯然，只要這種危險還存在，就不能真正地來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所以，要鞏固蘇維埃制度並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獲得勝利，單是工業社會主義化是完全不夠的。為此還必須從工業社會主義化進到整個農業社會主義化。

這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說，必須逐步而又堅定不移地把出產商品最少的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出產商品最多的集體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

第二、這就是說，必須使我國各地區毫無例外地都佈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它們在向國家繳納糧食方面不僅能够代替富農而且能够代替個體農民。

第三、這就是說，剷除一切產生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根源並消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

第四、這就是說，建立一個牢固的基礎，以便不僅以糧食而且以其他各種食品不斷地大量供應全國，並且保證國家有必要的糧食後備。

第五、這就是說，爲蘇維埃制度、蘇維埃政權建立統一的和牢固的社會主義基礎。

最後，這就是說，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這就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前途。

這就是我國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

任務是不簡單的，是艱難的，但完全是可以實現的，因爲困難的存在就是要人去克服它和戰勝它。

應該知道，我們在個體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是不能進一步發展的，我們需要的是能夠採用機器和提供最多的商品的大規模農業經濟。建立大規模農業經濟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使大批農民破產而建立對勞動進行剝削的資本主義大田莊的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把小農經濟聯合爲大規模集體經濟的道路，是農民不會遭到破產、勞動也不會受到剝削的道路。我們黨選擇了建立大規模農業經濟的社會主義道路。

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前，後來又在剛剛取得勝利之後，就向黨提出把小農經濟聯合爲大規模集體經濟的任務，認爲這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在農業中獲得勝利的決定

性的方法。

列寧指示說：

(甲)『商品生產下的小經濟制度決不能使人類擺脫羣衆所受的貧困和壓迫』(『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五十一頁)；

(乙)『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經濟來生活，即使我們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是不免要滅亡的』(『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六五頁)；

(丙)『只有依靠共同的、勞動組合的、協作的勞動才能擺脫帝國主義戰爭迫使我們進入的絕境』(『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二三頁)。

列寧又指示說：

『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能够在事實上向農民指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的時候，只有當它能够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的時候，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才能牢靠地和實在地把千百萬農民羣衆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因此，任何有助於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農業的措施，其意義都是難以估價的。我們有千百萬零散的、分佈在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只有當過渡到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農業是必要而可能的這一點在實踐中和在農民親身經驗中得到證明的时候，我們才有權利說：俄國這樣幅員廣大的農民國家已經在社會主義農業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列寧全集』第四版

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四頁)

列寧的指示就是這樣。

根據列寧的這些指示，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sup>③</sup>在『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中決定：

『在目前時期，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並改造為大規模集體經濟這一任務應該作為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sup>④</sup>

同志們，關於我國農業社會主義化的問題就是如此。

我們的責任就是執行這些指示。

第一次刊印

③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 收購運動的初步總結和今後黨的任務

(給聯共(布)各級組織)

大約一個半月以前，即一九二七年底，我們的糧食收購發生了極嚴重的危機。一九二六年底，我們已經收購到四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糧食，可是一九二七年底，收購的糧食才勉強達到三億普特。可見拿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六年底比較，我們缺糧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這個缺額也就是糧食收購危機在數字上的大略表現。

糧食收購危機意味着什麼呢？它的意義和可能產生的後果如何呢？

首先，這意味着工人區的供應發生危機，這些地區的糧價上漲，工人的實際工資下降。

第二，這意味着紅軍的供應發生危機，紅軍戰士中產生不滿情緒。

第三，這意味着產麻區和產棉區的供應發生危機，這些地區出現投機的糧價，麻農和棉農改種糧食，因而棉、麻生產縮小，紡織工業的有關部門也隨之縮小。

第四，這意味着國家手中缺乏糧食後備，既不能滿足國內需要（逢歉收時），也不能滿足為輸入設備和農業機器所必需的需要。

最後，這意味着我們的全部價格政策遭受破壞，穩定糧價的政策遭受破壞，不斷降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遭受破壞。

爲了擺脫這些困難，應當彌補虧空，消滅收購方面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的缺額。要消滅這個缺額，應當使黨和政府的一切槓桿都動起來，打破各組織中的死氣沉沉的狀態，從上到下把黨的優秀力量都投到收購戰綫上去，無論如何要充分利用泥濘時期以前有限的時間來提高收購量。

正是爲了這些目的，聯共（布）中央發出了頭兩個關於糧食收購工作的指示（第一個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發出，第二個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發出）。但是因爲這兩個指示沒有發生效力，聯共（布）中央不得不又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發出了第三個指示，這個指示不論按語氣或要求來說都是空前嚴厲的。指示的結尾指出，如果黨組織的領導者在最短期間不能徹底扭轉糧食收購方面的狀況，那就要給予他們處分了。當然，這種處分只能在非常情況下採用，況且，黨組織的書記們做工作並不是爲了應付差事，而是爲了革命。可是，鑒於上述非常情況，中央認爲採取這一步驟是適當的。

在引起糧食收購危機的若干原因中必須指出下列幾點：

第一、農村正在發展和富裕起來。首先是富農已經發展和富裕起來了。三年的豐收不是沒有作用的。今年的餘糧不比去年少，正如今年國內工業品不比去年少而比去年多一樣。可是農村富裕階層今年已經有可能依靠原料作物、肉類產品等等來周轉，而把糧食囤積起來以抬高糧價。固然，富農

不能算是糧食的主要持有者；但他們是農村中的經濟權威，他們和以高價收買糧食的城市投機分子勾結在一起，如果不遇到我們收購機關的反對，他們就有可能在抬高糧價的問題上，在破壞蘇維埃價格政策的問題上使中農跟着他們走。

第二、我們的收購機關沒有担負起自己的任務。它們濫用加價和各種「合法」增價的辦法，它們不去制止投機活動，而是彼此之間進行瘋狂的競爭，破壞收購機關的統一戰綫，抬高糧價，從而不自覺地幫助了投機分子和富農破壞蘇維埃的價格政策和惡化市場，使收購量降低。固然，黨可以加以干涉，把這些缺點消滅掉。但是黨陶醉於去年收購工作的成績，同時又忙於爭論<sup>(6)</sup>，竟放過了這些缺點，以為一切缺點都會自行消滅。而且有許多黨組織形式主義地對待收購工作，好像這個工作和它們無關，它們忘記了，對收購工作中的缺點，以及對一切經濟組織和合作社組織工作中的缺點，要向工人階級負責的首先是黨。

第三、我們的農村工作路綫在許多地區被歪曲了。黨的「依靠貧農，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對富農的鬥爭」這個基本口號往往執行得不正確。各級黨組織已經學會了和中農結成聯盟，這是黨的一個巨大的成績，但是它們遠遠不是一切地方都把貧農工作做好了。至於同富農和富農危險作鬥爭，那末我們的黨組織在這方面遠遠沒有做到它們應該做的一切。這也就說明為什麼最近在我們的各種組織中，不論是黨的或其他的組織中，都出現了一些黨的異己分子，他們看不見農村中有階級，不了解我們階級政策的原則，企圖這樣來進行工作：在農村中不得罪任何人，同富農和



睦相處，在農村「各階層」中都保有聲望。顯然，在農村中有這種「共產黨員」是不能改進我們的農村工作，限制富農的剝削傾向以及把貧農團結在黨的周圍的。

其次，在一月份以前，農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由於非穀類農作物、畜牧業和零活等收入增加而比去年大為提高，但是商品的供應總值有一定的減少（雖然運往農村的工業品數量已經增加），也就是說，商品的供應落後於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提高。

所有這一切再加上我們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如工業品運往農村遲緩、只依靠農業稅、不善於吸取農村游資等等，就給糧食收購危機造成了條件。

不言而喻，應該對這些錯誤負責的首要的是中央委員會，不僅僅是地方黨組織。

爲了消除危機，首先必須發揮各級黨組織的主動性，並且告訴它們，收購工作是全黨的事情。

第二、必須用打擊投機商和富農投機分子的辦法來制止投機活動和健全市場，爲此可以使用那些禁止在日用品方面進行投機的蘇維埃法律。

第三、必須吸收農村游資，爲此可以利用關於捐獻、發行農民公債和禁止釀造私酒的法律。

第四、必須使我們的收購機關受黨組織的監督，制止這些機關互相競爭，責成它們執行蘇維埃價格政策。

最後，必須使黨的路綫在農村實際工作中不再被歪曲，把對富農危險作鬥爭的任務當做工作重點，責成我們的黨組織「繼續向富農展開進攻」（見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農村工作」的決

議) (五)。

從中央的指示中可以知道，黨在加強收購工作的鬥爭中正是採取了這些措施，並且在全國展開了相應的運動。

在其他的條件和其他的情況下，黨是會採取其他的鬥爭方式的，例如把幾千萬普特糧食拋到市場上，去制服不肯拿糧食上市的農村富裕階層。但是要這樣做，國家就必須掌握足夠的糧食後備，或者擁有用於從國外輸入幾千萬普特糧食的大量外匯後備。但是，大家知道，國家並沒有這些後備。正因為沒有這些後備，所以黨採取了一些非常措施，這些措施已經反映在中央的指示裏，表現在展開了的收購運動中，但是其中大部分只在目前收購年度有效。

有人說我們好像在取消新經濟政策，在施行餘糧收集制和剝奪富農，如此等等。這是反革命的謠言，必須和它進行堅決的鬥爭。新經濟政策是我們經濟政策的基礎，而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不會改變。新經濟政策意味着在國家有權、有可能從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調節商業的條件下進行商品流轉和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沒有這個條件，新經濟政策就意味着資本主義的單純恢復，這一點是大談取消新經濟政策的反革命造謠者所不願意了解的。

現在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斷定，我們所採取的措施和展開了的糧食收購運動已經使黨取得第一個決定性的勝利。收購速度已經確定而普遍地提高。一月份的收購量比十二月份增加了一倍。二月份的收購速度又有所提高。收購運動對於我們所有的組織，不論是黨的或蘇維埃的和合作社的組織，

都是一次檢查，它使這些組織容易清除蜕化分子和提拔新的革命的工作人員。我們正在揭露收購機關工作中的缺點並在收購運動的進程中制定糾正這些缺點的辦法。農村中黨的工作正在改進並日有起色，歪曲黨的路綫的現象正在消滅。農村中富農的影響正在削弱，貧農工作日趨活躍，農村中蘇維埃的社會力量正在加強，蘇維埃政權在基本農民羣衆（包括中農）中的威信正在提高。

我們顯然正在擺脫糧食收購危機。

但是，除了上述成績以外，在執行黨的指示的實踐中還有許多歪曲和過火行爲，如果不消滅就會造成新的困難。這些歪曲和過火行爲就是某些地區企圖實行直接的商品交換，強行攤派農業公債，建立類似巡查隊的組織以及任意捕人、非法沒收餘糧等等。

所有這些現象必須堅決消滅。

除了進一步加強各機關的工作使糧食收購計劃全部完成以外，中央並責成黨和蘇維埃的一切地方組織立即進行春季播種運動的準備工作，以保證擴大春季播種面積。

針對着個別富農投機分子縮小播種面積的煽動，應當在集體農莊的特別支持之下展開擴大農村貧農階層和中農的播種面積的團結一致、萬衆一心的有組織的運動。

根據上述情況，聯共（布）中央建議：

- (一) 毫不放鬆地繼續加強糧食收購運動，無論如何要完成本年度糧食收購計劃。
- (二) 加緊和一切直接或間接提高公議價格的方式作鬥爭。

(三) 堅決消除國家收購機關和合作社收購機關之間的競爭，切實保證收購機關在同投機倒把抬高糧價的包買主和富農進行鬥爭中的統一戰綫。

(四) 繼續對大批商品糧食的真正持有者——富農施加壓力，在施加壓力時必須完全依照蘇維埃法律（例如對兩千普特或更多商品糧食的持有者中的個別頑固的壞分子使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一百零七條和烏克蘭法律中的相當條款），但是無論如何不能用諸如此類的辦法去侵犯中農。

(五) 從依法沒收的投機商和富農投機分子的餘糧中抽出百分之二十五，用長期信貸的方式交給貧農作為種子之用，必要時可以作為消費之用。

(六) 堅決取締在加強糧食收購的運動中發生的過火行為和歪曲行為，這種行為在個別情況下已經發展為採用徵收餘糧的方法，如按戶攤派糧食，在個別地區的交界地方設巡查隊等等。

(七) 在收取農民拖欠國家的款項（農業稅、保險費、貸款等方面的尾欠）時，對農村富裕階層特別是對富農應當繼續施加壓力，而對貧農，必要時也對力量單薄的中農，則採取減輕或優待的辦法。

(八) 在捐獻方面，對農村富農階層和富裕階層實行較農業稅為高的累進率。保證農村貧苦階層免除捐獻，力量單薄的中農和紅軍家屬則減少捐獻。在各地開展捐獻運動的時候，要發揮社會的自動精神，廣泛吸收貧農、青年團、婦女代表和農村知識分子參加這一工作。捐獻的款項應該嚴格實行專款專用，不得用作機關經費，用款的項目、支出預算等等必須經農民大會具體討論和批准，款項的使

用應該受廣大公衆的監督。

(九) 堅決取締用行政手段攤派農民公債的行爲(用公債券償付糧款，按戶強行攤派公債等等)，要特別注意向農民解釋農民公債對他們的一切好處，並且利用農村中社會團體的影響和力量在農村富裕階層中推銷農民公債。

(十) 要重視滿足糧食收購區對工業品的需求。取締已經出現的糧食和工業品直接或間接的商  
品交換的方式，在特殊情況下，在供應奇缺的商品方面，對於那些沒有參加合作社的農民，只要他們  
出售糧食，就可以用優待合作社社員的辦法優待他們。

(十一) 繼續在收購運動的進程中檢查並堅決清洗黨的、蘇維埃的和合作社的組織，把異己分子  
和混進來的分子驅逐出去，以堅定的黨員和經過審查的非黨工作人員代替他們。

約·斯大林

(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委託)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

第一次刊印

# 慶祝紅軍建軍十周年賀電

向在偉大的戰鬥中捍衛了十月革命勝利果實的紅軍致敬！  
光榮屬於爲無產階級事業而犧牲的戰士們！  
光榮屬於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戰士們！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紅星報」第四十六號

# 論紅軍的三個特點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蘇維埃紀念  
紅軍建軍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請允許我代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向我們的紅軍戰士、我們的紅海軍戰士、我們的紅空軍戰士、我們的準備入伍的青年——蘇聯的武裝工人致敬。

使黨感到自豪的，是它依靠工人和農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紅軍，這支紅軍在極偉大的戰鬥中捍衛並且捍衛住了工農的自由。

使黨感到自豪的，是紅軍光榮地走過了對我國工農的內外敵人進行極殘酷的戰鬥的艱苦道路，是紅軍已經成爲一支使工人階級的敵人胆顫心驚而使一切被壓迫被奴役者歡欣鼓舞的極強大的戰鬥的革命力量。

使黨感到自豪的，是紅軍走過了把工人和農民從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漫長道路，終於爭到了慶祝自己誕生十周年紀念日的權利。

同志們，我們紅軍的力量何在呢？產生這種力量的泉源何在呢？

我們紅軍和世界上古今所有一切軍隊根本不同的特點何在呢？

成爲我們紅軍力量和威力的泉源的特點何在呢？

我們紅軍的第一個基本特點就在於它是解放了的工農的軍隊，它是十月革命的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軍隊。

到現在爲止，一切存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軍隊，不管它們的成分怎樣，都是鞏固資產階級政權的軍隊。這種軍隊過去是現在還是維持資產階級統治的軍隊。各國資產者都在撒謊，說軍隊在政治上是不中立的。這是不正確的。在資產階級國家裏，軍隊被剝奪了政治權利，被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這是事實。然而這絕對不是說軍隊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恰恰相反，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裏，軍隊過去和現在都被捲入政治鬥爭，充當鎮壓勞動人民的工具。軍隊在那裏鎮壓工人，充當統治者的支柱，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和這種軍隊不同，我們紅軍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它是鞏固工農政權的工具，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是把工人和農民從地主和資本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工具。

我們的軍隊是解放勞動人民的軍隊。

同志們，在過去以及在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人民都是怕軍隊的，在人民和軍隊之間有一道把軍隊和人民隔開的鴻溝，這一點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呢？而在我國又是怎樣呢？在我國恰恰相反，人民和軍隊是一個整體，是一家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不像我國人民這樣愛護和關懷軍隊。在



我國，軍隊受到熱愛、尊敬和關懷。爲什麼呢？因爲工人和農民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軍隊，這支軍隊不是替統治者效勞，而是替那些以前當奴隸、現在已經獲得解放的工農服務的。

我們紅軍的力量源泉就在這裏。

人民熱愛自己的軍隊，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這樣的軍隊一定會有極鞏固的後方，這樣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

一支沒有鞏固的後方的軍隊算得什麼呢？算不得什麼。最大的軍隊，裝備最好的軍隊，往往由於沒有鞏固的後方，沒有來自後方、來自勞動人民的支援和同情而土崩瓦解、化爲烏有。我們的軍隊是世界上唯一得到工農同情和支援的軍隊。它的力量就在這裏，它的堅固性就在這裏。

我們紅軍和世界上過去和現在所有其他一切軍隊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這裏。

黨的願望，黨的任務，就是要使我們紅軍的這個特點，使它和工農的這種兄弟般親密的關係保持並鞏固起來。

我們紅軍的第二個特點就在於它是鞏固我國各民族間兄弟關係的軍隊，是解放我國各被壓迫民族的軍隊，是保衛我國各民族自由和獨立的軍隊。

過去軍隊受到的通常是大國主義的教育，侵略主義的教育，必須征服弱小民族的教育。正因爲如此，舊式的軍隊，資本主義的軍隊，同時也就是實行民族壓迫、實行殖民地壓迫的軍隊。這也就是舊軍隊的一個基本弱點。我們的軍隊是和實行殖民地壓迫的軍隊根本不同的。我們軍隊的全部實質，

我們軍隊的全部制度，是建築在鞏固我國各民族間友好關係的基礎上，是建築在解放各被壓迫民族，保衛蘇聯各加盟社會主義共和國自由和獨立的思想的基礎上的。

這就是我們紅軍的力量和威力的第二個主要泉源。這就是我們軍隊在緊急關頭能獲得我們廣大國土上各民族千百萬羣衆最大的支援的保證。

黨的願望，黨的任務，就是要使我們紅軍的這個特點也保持並鞏固起來。

最後，談談紅軍的第三個特點。這個特點就在於我們軍隊中培養和鞏固的是國際主義精神，充滿了我們紅軍全軍的是國際主義精神。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通常是以仇視別國人民、仇視其他國家、仇視別國工農的精神教育軍隊的。這樣做是爲了什麼呢？爲了把軍隊變成馴服的獸羣，供國家間、列強間發生軍事衝突時驅使。一切資本主義軍隊力量薄弱的根源就在這裏。

我們的軍隊却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我們紅軍的力量在於它從誕生的那天起就受着國際主義的教育，受着尊重別國人民的教育，受着熱愛和尊敬世界各國工人的教育，受着保衛並鞏固各國間的和平的教育。正因爲我們的軍隊受的是國際主義的教育，是世界各國工人利益一致的教育，所以我們的軍隊是世界各國工人的軍隊。

如果各國資產者胆敢侵犯我國，那末他們就會認識到上述這一點就是我國軍隊力量和威力的泉源，因爲那時他們就會看見，我們的以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出來的紅軍在世界上各個地方，從上海到紐

約，從倫敦到加爾各答，到處都有無數的朋友和同盟者。

同志們，這就是貫串在我們軍隊的全部精神中並成爲我們軍隊力量和威力的泉源的第三個基本特點。

黨的願望，黨的任務，就是要使我們軍隊的這個特點也保持並鞏固起來。

我們軍隊所以強大有力，就是由於它具備這三個特點。

這也就說明爲什麼我們的軍隊知道自己往哪裏去，因爲我們的軍隊不是由錫製的兵組成的，而是由知道自己往哪裏去和爲了什麼而戰的覺悟分子組成的。

同志們，知道自己爲了什麼而鬥爭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

正因爲如此，我們紅軍有一切理由成爲世界上最好的軍隊。

我們的紅軍萬歲！

紅軍戰士萬歲！

紅軍指揮員萬歲！

產生了紅軍，使它獲得了勝利並得到了光榮的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熱烈鼓掌多時）

載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五十號

# 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 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  
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①)

同志們！剛剛結束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②具有一個和最近兩年來舉行的各次全會不同的特點。這個特點就是：這次全會純粹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會議，是沒有黨內爭吵的會議，是沒有黨內緊張局面的會議。

排在議程上的都是最迫切的問題：糧食收購問題，沙赫特事件③問題，以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會的工作計劃問題。你們可以看出，這些問題都是相當重要的。雖然如此，全會上的討論還是完全實事求是的，而決議也是一致通過的。

① 在這篇報告中補入了當時報刊上沒有發表的幾段文字。——編者註

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

這是因爲全會上已經沒有反對派了。這是因爲人們都以嚴格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來對待問題，不要派別手腕，不進行派別煽動。這是因爲只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後，只是在消滅了反對派之後，黨才有可能認真地和切實地處理實際問題。

這就是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後，在消滅了反對派之後，我們所進入的這個發展階段的好的方面，也可以說，無比有利的方面。

## 一 關於自我批評

全會工作的特點，全會討論和全會決議的特點是：全會的工作自始至終都是在極嚴厲的自我批評的標誌下進行的。不僅如此，在全會的每一個問題上，在每一次發言中，都對我們工作的缺點進行了批評，我們的組織都進行了自我批評。對我們缺點的批評，黨、蘇維埃和經濟組織的真誠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這就是全會工作的總的精神。

我知道，黨的隊伍裏有一些人一般地不喜歡批評，尤其不喜歡自我批評。這些人，我想可以把他們叫做「塗了漆的」共產黨員，（笑聲）他們逃避自我批評，經常發牢騷說：又是這該死的自我批評，又是揭發我們的缺點，——能不能讓我們安靜地過日子呢？顯然，這些「塗了漆的」共產黨員和我們黨的精神，和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毫無共同之處。既然人們有這種情緒，既然人們遠不是熱情地對待

自我批評，那末請問：我們需不需要自我批評？自我批評從何而來？它有什麼好處？

同志們，我認爲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就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我認爲沒有自我批評，我們的黨就無法前進，就無法割開我們的膿瘡，就無法消滅我們的缺點。而我們的缺點是很多的。這一點必須公開老實地承認。

自我批評口號不能認爲是一個新口號。它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基礎。它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基礎。既然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領導專政的是一個黨，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黨分享政權的共產黨，那末，我們要前進，我們自己就應當揭露和糾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嗎？除了我們以外，再不會有人來揭露和糾正這些錯誤，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同志們，自我批評應當成爲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力量，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自我批評口號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後特別有力地貫徹下去了。爲什麼呢？因爲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消滅了反對派之後，黨內形成了一種不能不引起我們注意的新情況。

這種新情況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我們這裏再也沒有或者幾乎再也沒有反對派了。表現在我們黨內由於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反對派（這個勝利本身對黨非常有利）而可能產生一種高枕無憂、安然自得、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熟視無睹的危險。

輕而易舉地戰勝了反對派，這對我們黨是非常有利的。但是這個勝利本身包含着特別不利的方面，那就是黨內可能滋長自滿自足、自以爲是和高枕無憂的情緒。而高枕無憂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

我們已經停止前進。爲了不使這種情形發生，我們就需要自我批評，但不是反對派所進行的那種惡意的、實質上是反革命的批評，而是真誠的公開的批評，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

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估計到這種情況，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從那時起，自我批評的浪潮就日益高漲，它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上也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如果怕我們的敵人，國內和國外的敵人利用我們對缺點的批評來叫囂；嘿，他們布爾什維克那裏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呵，——那就奇怪了。如果我們布爾什維克怕這一點，那就奇怪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力量正是在於它不怕承認自己的錯誤。讓黨，讓布爾什維克，讓我國一切誠實的工人和勞動羣衆來揭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我們建設中的缺點；讓他們指出消滅我們這些缺點的途徑，使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建設不會有保守、停滯和腐敗的現象，使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整個建設事業日益改進，從勝利走向勝利。現在主要的就是這一點。至於我們的敵人，那就讓他們去亂談我們的缺點吧，——這種無聊的事情是不會也不應當使布爾什維克不安的。

最後，還有一種情況推動我們去進行自我批評。我指的是羣衆和領袖的問題。最近我們這裏領袖和羣衆之間開始形成了某種特殊的關係。一方面，我們這裏出現了、從歷史上形成了一批威信越來越高的領導者，他們幾乎成了羣衆所無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勞動羣衆，首先是工人階級羣衆，却上升得非常慢，他們開始眯着眼睛從下面向上望領袖，並且往往怕批評自己的領袖。

當然，我們這裏形成了一批上升得非常高並且有很高的威信的領導者，這個事實本身是我們黨

的巨大的成就。顯然，沒有這樣一批有威信的領導者，要領導一個大國是不可設想的。但是，領袖上升的時候逐漸離開羣衆，而羣衆開始從下面向上望他們，不敢批評他們，這個事實就不會不產生領袖脫離羣衆，羣衆離開領袖的某種危險。

這種危險會使領袖驕傲自大，認爲自己十全十美。而領導上層驕傲自大，開始從上面向下看羣衆，這會有什麼結果呢？顯然，除了黨遭到毀滅以外，什麼結果也不會有。可是，我們要的是向前邁進，改進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毀滅黨。正是爲了前進並改善羣衆和領袖之間的關係，就應當時時刻刻敞開自我批評的大門，應當使蘇維埃人有可能『責罵』自己的領袖，批評他們的錯誤，使領袖不會驕傲自大，而羣衆也不會離開領袖。

有時人們把羣衆和領袖的問題同提拔的問題混爲一談。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雖然提拔新的領袖一事值得黨的嚴重注意，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要保存已經提拔起來而且極有威信的領袖，並在他們和羣衆之間建立經常的牢不可破的聯系。問題在於要通過對我們缺點的自我批評和批評來組織黨內的廣泛的輿論，來組織工人階級的廣泛的輿論，使之成爲生動銳敏的精神上的監督力量；極有威信的領袖如果要保持黨和工人階級對他們的信任，就應當傾聽這種力量的呼聲。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報刊的作用，我們黨的和蘇維埃的報刊的作用，的確是不可估量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能不歡迎『真理報』創辦『工農檢查院專頁』來經常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不過，批評必須力求嚴肅深刻，不應該限於表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應當歡迎『青年團真理報』發



向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展開猛烈而熱情的攻擊。

有時人們罵批評者，說他們的批評不全面，說批評有時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人們往往要求批評的每一點都是正確的；如果批評不是完全正確的，他們對批評就加以指摘和謾罵。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危險的錯誤。你們只要提出這種要求，就會把成千上萬願意糾正我們的缺點但是有時不善於正確表達自己意思的工人、工人通訊員和農村通訊員的嘴巴堵住。這是墳墓，不是自我批評。

你們應當知道，工人有時對於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有點怕說實話。他們害怕，不只是因為怕說了會『挨揍』，而且也是因為怕批評得不全面會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農民雖然親身感覺到我們的工作和我們的計劃有缺點，但他們哪裏能夠頭頭是道地論證自己的批評呢？如果你們要求他們的批評百分之百的正確，那你們就會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評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評的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即使批評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應該歡迎，應該仔細聽取，並考慮到它的好地方。再說一遍，否則你們就一定會把成千上萬忠實於蘇維埃事業的人們的嘴巴堵住；他們雖然還不大善於批評，但他們說的却是真理。

正是爲了發揚自我批評而不是扼殺自我批評，正是爲了這一點，必須仔細聽取蘇維埃人的一切批評，即使批評有時不完全正確或者不是各方面都正確。只有這樣才能使羣衆確信：他們不會因批評不全面而『挨揍』，也不會因批評有某些錯誤而遭到『嘲笑』。只有這樣，自我批評才能真正具有羣

衆性，才能真正得到羣衆的響應。

不言而喻，這裏指的不是「任何」批評。反革命分子的批評也是批評。但這種批評的目的是要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威信，摧殘我們的工業，瓦解我們黨的工作。顯然，我們指的不是這樣的批評。我說的不是這樣的批評，而是那種來自蘇維埃人的批評，是爲了改善蘇維埃政權機關，改進我們的工業，改進我們黨的工作和工會工作而進行的批評。我們需要批評是爲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而不是爲了削弱它。正是爲了加強和改進我們的工作，正是爲了這一點，黨才宣佈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口號。

我們期待於自我批評口號的首先是什麼呢？如果自我批評口號得到正確的和誠實的執行，那末它會給我們產生什麼結果呢？它至少會產生兩個結果。第一、它會提高工人階級的警惕性，加強他們對我們缺點的注意，使這些缺點容易糾正，使我們的建設工作不可能發生任何「意外」。第二、它會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水平，培養他們的國家主人翁感，使他們容易學會管理國家。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不僅沙赫特事件，而且一九二七年底的收購危機，對我們很多人都是「意外」呢？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沙赫特事件。一批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家按照國際資本反蘇維埃組織的指示活動了五年。五年來我們的組織草擬並分發了各種各樣的決議和決定。當然，我們的煤礦工業總還是上升的，因爲蘇維埃經濟制度富有生命力，非常強大，儘管我們不用腦子而且有了錯誤，儘管專家們進行破壞活動，它還是佔了上風。五年來，這批反革命專家在我們工業中進行暗害活動，炸毀鍋爐，毀壞渦輪等等。而我們却若無其事地坐着。「突然」，好似晴天霹靂，——沙赫特事件發生了。

同志們，這是正常的嗎？我認爲極不正常。握着舵，睜着眼，但是當某種災難臨頭之前，竟什麼也看不到，——這不能算是領導。布爾什維主義不是這樣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應當有預見。而預見，同志們，不是什麼時候都容易做到的。

一種情況是：一二十個領導同志注意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而工人羣衆却不願意或不能够注意和發現缺點。這裏一定會忽略一些缺點，不能把所有的缺點都發現。另一種情況是：千百萬工人和一二十個領導同志一起來注意和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揭露我們的錯誤，投入共同的建設事業，並指出改進工作的途徑。這裏就更能保證不會發生意外，保證及時發現不良現象並及時採取措施來消除這些現象。

我們必須使工人階級的警惕性不斷提高，而不要使它喪失；我們必須使千百萬工人都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事業；我們不僅必須使十來個領導者，而且必須使千百萬工人和農民都來注意我國建設的進程，指出我們的錯誤，揭露我們的錯誤。只有這樣，我們這裏才不會發生「意外」。但是要做這一點，我們必須對我們的缺點展開自下而上的批評，我們必須使批評成爲羣衆性的批評，我們必須領會並貫徹自我批評的口號。

最後，談一談和實現自我批評口號有關的問題，就是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以及培養他們管理國家的技能的問題。列寧說過：

「我們所缺少的主要的東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領……  
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

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力量。(110)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建設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培養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經濟、管理工業的技能和本領。

不發揮工人的力量和才能，不發揮工人階級優秀分子的力量和才能來批評我們的錯誤，指出我們的缺點並推進我們的工作，能不能培養工人階級的這種技能和本領呢？顯然不能。

爲了發揮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力量和才能，並使他們能夠獲得管理國家的技能，需要做些什麼呢？這首先需要誠實地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進行自我批評，誠實地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展開自下而上的批評。工人利用機會來公開和直接地批評工作中的缺點，來改進並推動我們的工作，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工人積極參與了領導國家、領導經濟和領導工業的事業。而這就不會不提高工人的國家主人翁感，不會不提高他們的積極性、警惕性和文化水平。

工人階級的文化力量問題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之一。爲什麼呢？因爲在過去和現在的一切統治階級中，工人階級這一統治階級在歷史上所處的地位是有點特殊和不十分有利的。所有以前的統治階級——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同時又是富有階級。他們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學到管理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工人階級和他們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在於它是貧窮階級，它過去沒有可能使自己的子弟學到管理的知識和技能，只有現在，在取得政權以後，才得到了這種可能。

我國文化革命問題的迫切性也就在於此。固然，蘇聯工人階級在其統治的十年內，在這方面所獲得的成就比地主和資本家在幾百年內所獲得的要大得多。但是，從國際和國內情況來看，我們取得的成績還遠遠不夠。因此，凡是能够提高工人階級文化力量的發展水平的手段，凡是能够促進培養工人階級管理國家、管理工業的技能和本領的手段，我們都應當盡量利用。

根據上面所說的應當得出結論說：自我批評口號是用來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力量並培養工人階級管理技能的極重要手段之一。由此又得到一個根據，證明實現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的迫切任務。使我們把自我批評口號作為當前口號的根據大體上就是如此。

因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在自我批評的標誌下進行是毫不奇怪的。

現在我們來談談糧食收購問題吧。

## 二 關於糧食收購問題

首先，我來略為談談去年年底在我國爆發的糧食收購危機的實質。實際情況是這樣：從去年十月起，我們的收購量開始下降，十二月降到最低點，到去年年底，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有了一億三千萬普特的缺額。我們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壞，也可能比上年度差一點。本年度的存糧比上

年度多，一般認為本年度我國的商品糧食不比上年度少而比上年度多。

根據這種情況，本年度的收購計劃訂得比上年度稍微高了些。儘管如此，收購量却下降了，到一九二七年底，我們缺糧一億三千萬普特。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國內糧食很多，而糧食收購量却在下降，使城市和紅軍受到飢餓的威脅。

這種『奇特的』現象該怎麼解釋呢？這裏是不是有什麼偶然性呢？有許多人喜歡這樣解釋，說我們打瞌睡了，說我們忙於對付反對派，因而忽略了一些事情。說我們真的打瞌睡了，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在這裏拿打瞌睡來解釋一切，那就大錯特錯了。更不能把收購危機說成是偶然的。這樣的事情不會是偶然的。這種解釋未免太不值錢了。

那末，造成收購危機的條件究竟是什麼呢？

我認為這裏至少有三個條件。

第一、在我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環境中，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首先，我指的是發展城市工業的困難。本來應當拿各種各樣的商品大量供應農村，以便從農村取得最大數量的農產品。為此就必須比現在更迅速地發展我國工業。但是要加緊發展工業，就必須加快社會主義積累的速度。可是，同志們，要達到這樣的積累速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由此就產生了農村商品供應不足的現象。

其次，我指的是我們在農村建設方面的困難。同志們，農業增長得很慢。本來農業應當一日千里地發展，糧價應當逐漸下降，收成應當不斷提高，肥料應當盡量使用，糧食生產的機械化應當迅速發

展。但是，同志們，我們的情況不是這樣，而且最近也不會這樣。

爲什麼呢？

因爲我們的農業是小農經濟，很難接受重大的改進。統計數字說明，戰前我們全國約有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現在我們約有二千五百萬個體農戶。這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真正的小農經濟國家。小農經濟是什麼呢？這是最沒有保障、最原始、最不發達、出產商品最少的經濟。同志們，全部實質就在這裏。肥料、機器、農學知識以及其他改進辦法，這都是些在大農場中可以有效地採用，而在小農經濟中沒有採用或者幾乎沒有採用的東西。這就是小農經濟的弱點。這也就是它競爭不過富農的大農場的原因。

一般說來，我們農村中是不是有採用機器、肥料、農學知識等等的大農場呢？是的，是有的。第一、這就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但是，同志們，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還很少。第二、這就是富農的大農場（資本主義農場）。這種農場在我國並不算少；它們在農業中仍然起着相當大的作用。

我們在農村中能不能走鼓勵私人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的道路呢？顯然不能。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要加緊在農村中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一類的大農場，努力把它們變成國家的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糧食工廠。正因爲如此，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才提出全力展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建設的口號。

如果以爲集體農莊只能由貧農階層組成，那就錯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我們的集體農莊應當

是貧農和中農的農莊，它不僅應當包括個別集團或小集團，而且應當包括整個村子。應當給中農指出前途，告訴他們：通過集體農莊，他們能够最順利最迅速地發展經濟。既然中農不能上升，不能上升爲富農，而下降爲貧農又是不合理的，那就應當給他們指出前途：他們可以通過集體農莊建設來改善經濟。

但是，目前我們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還很少，少得不像話。由此就產生了我們在農村建設方面的困難。由此就產生了我們糧食生產不足的現象。

第二、由此可見，我們在城市和農村建設中的困難就是收購危機得以爆發的基礎。但是這還不是說，收購危機正應當在本年度爆發。大家知道，這些困難不僅本年度有，上年度也是有的。可是，爲什麼正是在本年度爆發了收購危機呢？秘密何在呢？

秘密在於富農在這一年已經有可能利用這些困難來抬高糧價，進攻蘇維埃價格政策，從而阻撓我們的收購工作。而他們所以能够利用這些困難，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三年的豐收起了作用，富農在這個時期內成長起來了，整個農村，特別是富農，在這個時期內都積下了糧食，因此，富農就有試圖操縱糧價的可能了；

第二、富農得到城市投機分子的支持，這些投機分子興風作浪，抬高糧價，使物價高漲。

當然，這還不是說，富農是糧食的主要持有者。持有大部分糧食的主要和基本羣衆是中農。但是富農在農村中有一定的經濟權威，所以在糧價問題上有時能使中農跟着他們走。因此，農村富農分



子就有可能利用我們建設中的困難來進行投機，抬高糧價。

如果像富農和投機分子所做的那樣，把糧價抬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那末這是什麼意思呢？首先，這就是降低工人的實際工資。假定說，那時我們提高了工人的工資。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得不提高工業品的價格，從而既使工人階級也使貧農和中農在物質生活方面受到打擊。而這又意味着什麼呢？這無疑是意味着直接破壞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

但是問題還不限於此。假定說，我們在今年一月或今年春季即準備播種之前把糧價提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這會產生什麼後果呢？那時我們的工業原料基地就會遭到破壞。棉農就會不種棉花而改種糧食，因為種糧食更有利。麻農就會不種亞麻，也改種糧食。種甜菜的農民也會這樣做。以此類推。簡單說來：我們的工業原料基地就會由於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投機野心而遭到破壞。

但是還不僅如此。假如我們在今年春季提高了糧價，那末我們一定會害了貧農，因為貧農在春天既需要買口糧也需要買種子。貧農和下中農也就有充分權利對我們說：你們欺騙了我們，因為去年秋天我們按低價把糧食賣給你們，可是你們現在却要我們按高價來買糧食，——蘇維埃人先生們，你們到底保護誰？保護窮人還是保護富農？

正因為如此，黨對富農抬高糧價這一投機進攻必須予以回擊，以便打破富農和投機分子拿飢餓來威脅工人階級和我們紅軍的妄想。

第三、毫無疑問，假如沒有另一種情況幫助農村資本主義分子，他們就不可能把我們建設中的

困難利用到他們在事實上所利用到的這種程度，而收購危機也不會這樣嚴重。這種情況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的收購機關鬆懈渙散，彼此之間沒有統一戰綫，相互競爭，不願意對抬高糧價的活動進行堅決的鬥爭。

再就是我們糧食收購區的黨組織消極懈怠，不願意以應有的態度來過問糧食收購運動，不願意干預這件事情以消除收購戰綫上普遍的鬆懈現象。

我們的收購機關和黨組織陶醉於上年度收購運動的成就，認為本年度收購工作可以聽其自流，讓一切都聽從『上帝的意志』，這樣就為富農和投機分子掃清了活動場所。而富農所期待的也正是這個。幾乎用不着懷疑，如果沒有這種情況，收購危機是不會這樣嚴重的。

不應當忘記，我們，也就是說我們的收購機關和其他組織在供應農村工業品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八十，在農村中的收購方面差不多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不用說，這種情況使我們有可能在農村中控制住富農，只要我們的組織善於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可是我們沒有利用這個有利條件，一切都聽其自流，這樣就便利了（當然是無意的）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同志們，造成去年底收購危機的條件就是如此。

這樣，你們可以看出，收購危機不能認為是偶然的。

你們可以看出，收購危機反映着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我國建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即糧食收購問題上，對蘇維埃政權發動的第一次嚴重進攻。

同志們，這就是糧食收購危機的階級背景。

你們知道，爲了消除收購危機和制止富農的投機野心，黨和蘇維埃政權不得不採取一系列的實際措施。關於這些措施，我們的報刊上已經講得很多，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決議中也講得相當詳細。因此，我想不必在這裏重複了。

我只想談一談由於非常情況而採取的一些非常措施。當然，只要這種非常情況不再存在，這些措施也就會取消。我指的是使用對付投機活動的第一百零七條法律。這條法律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二六年通過的。這條法律我們在上年度沒有使用。爲什麼呢？因爲正如大家所說的，糧食收購工作的進行是正常的，所以沒有理由使用這一條。只是在本年度，一九二八年初，才想起了這一條。所以想起了這一條，是因爲富農的投機詭計在我們這裏造成了一些非常情況，使我們受到飢餓的威脅。顯然，假如下一個收購年度不再發生非常情況，收購工作進行得很正常，那末第一百零七條也就不會使用了。相反地，假如發生非常情況，資本主義分子又『掉起花槍』來，那末第一百零七條就會重新出現在舞台上。

如果根據這一點便以爲要『取消』新經濟政策、『恢復』餘糧收集制等等，那就愚蠢了。現在只有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才會想到要取消新經濟政策。現在新經濟政策對蘇維埃政權比對任何人都有利。但是，有些人以爲新經濟政策不是意味着加強對包括富農在內的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以戰勝他們，而是意味着停止同富農及其他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不用說，這種人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因爲

我們黨內沒有也不可能有一種人的位置。

黨和蘇維埃政權爲了消除糧食危機而採取的一些措施所產生的結果，你們也都是知道的。簡單說來，有下面幾點：

第一、我們彌補了虧空，收購了糧食，趕上了甚至有些地方超過了上年度的收購速度。大家知道，在一月到三月這三個月期間，我們已經收購了二億七千萬普特糧食。當然，我們所需要的不止這一些。我們還需要收購一億多普特。但這畢竟是一種必要的成績，它使我們有可能消除收購危機。現在我們有充分權利說，黨和蘇維埃政權在這條戰綫上已經獲得極大的成就。

第二、我們整頓了，多多少少整頓了我們各地的收購機關和黨組織，在實踐中考查了它們的戰鬥準備，清除了它們中間那些不承認農村中有階級並且不願意同富農「吵嘴」的顯然已經腐化的分子。

第三、我們改進了農村工作，孤立了富農，稍微得罪了富裕的中農上層，使貧農更加靠近我們，使絕大多數中農跟着我們走。這樣，我們就實現了列寧還在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1926)上就已經提出的布爾什維克的老口號：依靠貧農，善於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對富農的鬥爭。

我知道有些同志不大樂意接受這個口號。如果認爲在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鞏固的情況下的工農聯盟就是工人和包括富農在內的全體農民的聯盟，那就奇怪了。同志們：不是的，我們不鼓吹也不能鼓吹這樣的聯盟。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在工人階級政權已經鞏固的條件下，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

盟是：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反對富農。誰認為在我們的情況下同農民聯盟就是同富農聯盟，誰就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誰想在農村中實行一種既使富人喜歡也使窮人喜歡的政策，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傻瓜，因為，同志們，世界上是沒有這種政策的。（笑聲，鼓掌。）我們的政策是階級政策。

我們加強糧食收購工作的措施所產生的結果大體上就是如此。

毫無疑問，在實行這些措施的時候，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有過許多過火行為和歪曲黨的路綫的事實。大家都知道，在許多場合由於我們不用腦子，歪曲了我們的政策，首先打擊了貧農和中農，不正確地運用了第一百零七條等等。我們現在嚴懲並且將來還要嚴懲犯了這些歪曲行為的人。但是，如果因為有這種歪曲行為就看不到黨採取的措施（不採取這些措施我們就不能擺脫收購危機）所獲得的良好的和真正重大的結果，那就奇怪了。這樣做就是閉眼不看主要的東西，而把個別的和偶然的東西提到首位。這樣做就是把收購運動最大的成績淹沒在歪曲我們路綫的個別現象的一勺水裏，其實這些現象完全不是從黨所採取的那些措施中產生的。

我們這裏是不是有一些情況使我們的收購運動容易獲得成功，並使我們容易對付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進攻呢？

是的，是有的。這樣的情況至少可以指出兩種：

第一、在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之後，在消滅了反對派之後，在黨消滅了黨內敵人而達到了

最高度的統一之後，我們黨干預了收購運動，並打擊了富農和投機分子。不能認為對富農進行鬥爭是輕而易舉的事。要粉碎富農和投機分子的詭計而又不致在國內引起任何混亂，就必須有絕對團結的黨，絕對鞏固的後方和十分鞏固的政權。幾乎用不着懷疑，這些條件的存在是在迫使富農立刻退却這一點上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二、我們已經能够把壓制富農和投機分子的實際措施同工人階級、紅軍和農村無產階層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富農和投機分子使城鄉勞動羣衆遭受飢餓的威脅，同時違反蘇維埃政權的法律（第一百零七條），這種情況不能不使我們在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中得到農村大多數人的擁護。富農傷天害理地進行糧食投機，給城鄉造成極大的困難，同時違反蘇維埃政權的法律，也就是違反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意志，——這種情況一定會便於我們孤立富農，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於是，在某種程度上也就發生了一九二一年發生過的那種情形（當然是有一定的附帶條件的）。當時以列寧爲首的黨鑒於國內發生飢荒，就提出了沒收教會貴重物品來購買糧食救濟災區的問題，並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了極廣泛的反宗教運動；當時神甫們抓住貴重物品不放，實際上就是反對挨餓的羣衆，因而激起了羣衆對整個教會，也對宗教偏見，尤其對神甫及其領導者的憤懣。那時在我們黨內有一些怪人，他們以爲列寧只是在一九二一年才懂得同教會作鬥爭的必要性，（笑聲）在這以前，好像他並不懂得這一點。同志們，這當然是荒謬的。列寧在一九二一年以前當然也懂得同教會作鬥爭

的必要性。但是問題完全不在這裏。問題在於：要把廣大羣衆性的反宗教運動和爭取人民羣衆切身利益的鬥爭結合起來，並且要做到使這個運動爲羣衆所了解，爲羣衆所支持。

關於今年年初黨因糧食收購運動而採取的措施也必須這樣說。有些人以爲黨只是到現在才懂得同富農危險作鬥爭的必要性。同志們，這當然是荒謬的。黨向來就懂得這種鬥爭的必要性，並且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進行了這個鬥爭。今年年初黨所採取的措施的特點是：黨在今年已經有可能把反對農村富農和投機分子的堅決鬥爭同爭取廣大勞動羣衆切身利益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因爲把兩者結合起來了，黨就做到了使農村大多數的勞動羣衆跟着自己走而使富農陷於孤立。

布爾什維克政策的藝術決不在於不考慮時間和地點，不考慮羣衆支持領導上這些或那些措施的決心如何，不加選擇地在各個戰綫上用所有的大砲同時開火。布爾什維克政策的藝術在於善於選擇時間和地點並估計各種情況，以便把火力集中到那個最可能獲得最大戰果的戰綫上。

三年以前，我們還沒有得到中農的擁護，中農滿懷仇恨並攻擊我們的鄉執行委員會主席，貧農對新經濟政策的結果感到驚異，我們的播種面積只有戰前的百分之七十五，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問題是在農村中擴大糧食和原料的生產，我們還沒有爲工業建立可靠的糧食和原料基地。假如我們那時給富農極嚴重的打擊，事實上我們現在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

我不懷疑，這樣做我們就會失敗，就不能把播種面積擴大到現在這樣的規模，就會破壞爲工業建立糧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會使富農容易壯大，就會使中農脫離我們，也許現在國內就會發生極

嚴重的政治混亂。

今年年初我們農村中的情況怎樣呢？播種面積擴大到了戰前規模，爲工業建立了鞏固的原料和糧食基地，大多數中農擁護蘇維埃政權，貧農多少是組織起來了，農村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已經改善並鞏固了。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組織對富農和投機分子的打擊才能指望得到巨大的成就，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只有害神經病的人才不能了解在組織廣泛的羣衆性的反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方面這兩種情況之間的全部差別，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這就是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說明：不考慮時間和地點，不考慮鬥爭力量的對比，不加選擇地在各個戰綫上用所有的大砲同時開火是多麼愚蠢。

同志們，關於糧食收購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談沙赫特事件吧。

### 三 沙赫特事件

沙赫特事件的階級背景怎樣？沙赫特事件的根源何在？這個經濟反革命事件是在怎樣的階級基礎上發生的？

有些同志認爲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他們一般都說：我們在這裏打瞌睡打得太厲害了，疏忽大



意了；如果我們不打瞌睡，那我們這裏是不會發生任何沙赫特事件的。這裏有人在打瞌睡而且打得很厲害，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拿打瞌睡來解釋一切，那就是不了解問題的實質。

事實說明了什麼呢？沙赫特事件的材料說明了什麼呢？

事實說明：沙赫特事件是一部分以前掌管煤礦工業的資產階級專家所策動的經濟反革命事件。

其次，事實說明：這些結成秘密集團的專家，是從現在流亡國外的舊主人那裏和從西方資本主義反蘇反革命組織那裏取得經費來進行暗害活動的。

最後，事實說明：這個資產階級專家集團是遵照西方資本主義組織的指示進行活動，破壞我國工業的。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

說明我們在這裏遇到的是西歐資本主義反蘇組織對我國工業的經濟干涉。有一個時期發生了軍事政治干涉，這種干涉被我們用勝利的國內戰爭粉碎了。現在我們遇到的是經濟干涉的嘗試；要粉碎它，我們並不需要進行國內戰爭，但是我們還是必須粉碎它，而且我們正在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手段來粉碎它。

如果以為國際資本會讓我們安靜地過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階級還存在，國際資本還存在，它是不會平心靜氣地看着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的。從前國際資本想用直接的軍事干涉來推翻蘇維埃政權。這種企圖沒有實現。現在國際資本竭力設法而且今後還會竭

力設法用隱蔽的、不總是可以察覺的、但是相當強大的經濟干涉來削弱我國的經濟實力；它組織暗害活動，在這些或那些工業部門中製造種種『危機』，從而使將來的軍事干涉更有可能實現。這裏的一切都和國際資本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階級鬥爭密切相連，根本談不到什麼偶然性。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我們今後仍將執行革命政策，把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者團結在蘇聯工人階級的周圍，——那時國際資本將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前進；

或者我們放棄自己的革命政策，對國際資本做若干原則性的讓步，——那時國際資本大概不會反對『幫助』我們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變為『和善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有人認為我們可以執行解放的對外政策，同時又能博得歐美資本家對我們的這種行為的讚揚。我不想來證明，這些天真的人和我們黨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絲毫共同之處的。

比如說，英國要求我們和它在某些地方，如波斯、阿富汗或土耳其劃分侵略性的勢力範圍；同時它保證，如果我們能做這種讓步，它就同意和我們建立『友誼』。怎麼樣，同志們，我們也許要做這種讓步吧？

全場高喊：不！

斯大林：美國要求我們根本放棄支持別國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政策，如果我們能做這種讓步，那末一切都好辦。怎麼樣，同志們，我們也許要做這種讓步吧？

全場高喊：不！

斯大林：如果我們同意和日本瓜分滿洲，我們就可以和日本建立「友好」關係。我們能做這種讓步嗎？

全場高喊：不！

斯大林：或者，比如說，有人要求我們「放鬆」對外貿易壟斷並且同意償付戰時和戰前的一切債務。同志們，我們也許要同意這樣做吧？

全場高喊：不！

斯大林：正因為我們不能做諸如此類的讓步，不能背叛自己，所以我們必須估計到國際資本今後將繼續給我們製造各種各樣的禍害，不管這是沙赫特事件還是其他類似的什麼事件，反正都是一樣。這就是沙赫特事件的階級根源。

爲什麼當時國際資本能夠對我國進行軍事干涉呢？因爲在我們國內有整批整批的軍事專家，將軍和軍官，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子弟，他們時刻準備着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如果沒有國際資本在財政上、軍事上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支持，這些軍官和將軍能不能發動嚴重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呢？當然不能。如果沒有這批白衛軍官和將軍的幫助，國際資本能不能發動嚴重的干涉呢？我認爲不能。

當時我們有些同志認爲：軍事干涉是偶然的，如果我們不把克拉斯諾夫和馬蒙托夫等人從監獄裏釋放出來，那就不會發生干涉了。這當然是不對的。馬蒙托夫、克拉斯諾夫等白衛將軍的釋放，在

國內戰爭的發展上起過作用，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軍事干涉的根源不在這裏，而在於蘇維埃政權和國際資本及其俄國走狗將軍們之間的階級矛盾，這一點也是毫無疑問的。

某些資產階級專家，從前的礦主，如果沒有國際資本在財政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如果不是指望國際資本會來幫助他們推翻蘇維埃政權，他們能不能在我們這裏製造沙赫特事件呢？當然不能。如果在我國沒有資產階級，其中包括我國一批把蘇維埃政權恨入骨髓的資產階級專家，國際資本能不能對我國發動像沙赫特事件這樣的經濟干涉呢？顯然不能。一般說來，我國有沒有這樣一些決心進行經濟干涉、破壞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專家呢？我認爲是有的。我認爲這些人不會很多。但是，我國有數目不大的比軍事干涉時期少得多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專家，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這兩種力量結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對蘇聯進行經濟干涉的基礎。  
這就是沙赫特事件的階級背景。

現在來談一談從沙赫特事件得出的實際結論。

我想談談沙赫特事件提供給我們的四個實際結論。

列寧說過，挑選人材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問題之一。沙赫特事件表明，我們的經濟幹部挑選得不好，不但挑選得不好，而且使這些幹部處於難以發展的條件下。人們提到第三十三號命令，特別是隨這個命令頒佈的『標準條例』(11)。這個標準條例的特點就是：它幾乎把一切權力都交給了技術廠長，正廠長的權限只是調解糾紛，『代表』本廠，彈彈三絃琴而已。顯然，在這種條件下，我們的經濟

幹部是不能充分發展的。

這個命令在當時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那時我們根本還沒有自己的經濟幹部，我們還不會管理工業，因而不得不把主要的權力交給技術廠長。但是現在這個命令已經變成了桎梏。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有經驗的、能够發展成爲我國工業真正領導者的經濟幹部。正因爲如此，現在已經到了廢除過時的標準條例而代之以新條例的時候了。

有人說，共產黨員，特別是做經濟工作的工人共產黨員，不可能掌握化學公式和一般技術知識。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世界上沒有勞動人民和布爾什維克攻不下的堡壘。（鼓掌）我們在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攻下了更難攻的堡壘。全部問題在於：要有掌握技術知識的願望，要以堅定不移的決心和布爾什維克堅忍不拔的精神來武裝自己。可是爲了改變我們經濟幹部的工作條件，幫助他們成爲真正的、有充分權力的管理者，就必須廢除舊的標準條例，拿新的來代替它。否則，我們就會有毀壞我們的人材的危險。

難道我們那些墮落的經濟工作人員本來就比我們中間任何人都要壞嗎？爲什麼這一類的同志墮落腐化起來，在生活上和資產階級專家打成一片呢？這是因爲在我們經濟方面的實際工作中有不正確的地方，我們挑選經濟工作人員的條件以及他們的工作條件阻礙了他們的發展，把他們變成資產階級專家的尾巴。同志們，必須消滅這種現象。

沙赫特事件提供給我們的第二個結論是：我們我們的高等技術學校裏沒有把幹部訓練好，沒

有把我們的紅色專家培養好。這個結論是一定要得出的。比如說，爲什麼我們許多年輕專家不適合於工作，對工業沒有用處呢？因爲他們學的是書本上的東西，他們是書本上的專家，沒有實際經驗，和生產脫節，他們自然會遭到失敗。難道我們需要的是這樣的專家嗎？不，我們需要的不是這樣的專家，即使他們是非常年輕的專家我們也不需要。我們需要的專家，不管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必須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經驗上，和在生產的聯系上都是很強的。

那些沒有見過礦井也不願意下礦井的年輕專家，那些沒有見過工廠也不願意在工廠裏弄髒自己的年輕專家，是永遠不能戰勝舊的、經過實際工作鍛鍊的、但是仇視我們事業的專家的。因此，很容易了解，爲什麼不僅舊的專家，不僅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就連工人也往往很不歡迎這種年輕專家。但是爲了不再使年輕專家遭到這種意外，必須改變對他們的教育，並且必須這樣改變：使年輕專家從進入高等技術學校學習的最初幾年起就和生產、工廠、礦井等有密切的聯系。

第三個結論是關於吸引廣大工人羣衆參加管理工業的問題。從沙赫特事件的材料來看，這方面的情况如何呢？很壞。壞得不像話，同志們。事實證明：勞動法規遭到破壞，地下六小時工作制並不經常遵守，勞動保護條例遭到踐踏。但是工人忍受着，工會默不作聲，黨組織也不設法消滅這種不健康的現象。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到過頓巴斯，他下到礦井裏去，向礦工了解他們的工作條件。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礦工認爲對工作條件有發牢騷的必要。這位同志問他們：『同志們，你們的生活怎樣？』

礦工們回答他說：「同志，沒有什麼，生活不錯。」這位同志說：「我要到莫斯科去，你們有什麼話要我轉達中央？」礦工們回答他說：「你到那裏就說我們的生活不錯。」這位同志對礦工們說：「同志們，聽我說，我又不是外國人，我是俄國人，我到這裏來就是要向你們了解真實情況。」礦工們回答他說：「同志，我們對誰都一樣，不管對外國人或者對自己人我們都只說實話。」

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礦工的面貌。這不是普通的工人，而是英雄。我們已經積累在工人心中的精神資本的寶藏也正是在這裏。這是十月革命的極偉大的遺產，而我們竟像敗家子那樣無恥地、罪惡地糟蹋這種無價之寶的精神資本，真是痛心！同志們，長久地依靠原有的精神資本，任意糟蹋這種資本是不行的。已經到了消滅這種現象的時候了。早已是時候了！

最後，第四個結論是關於檢查執行情況的問題。沙赫特事件表明：一切管理部門，不管是黨的、工業的或工會的，在檢查執行情況方面都糟透了。只是寫決議，發指示，但是誰也不想問問自己：這些決議和指示執行得怎樣了？是確實執行了還是束之高閣了？

伊里奇說過，管理國家的重要問題之一是檢查執行情況的問題。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搞得糟透了。領導——這並不等於寫決議和發指示。領導——這就是檢查指示的執行情況，不僅檢查指示的執行情況，而且檢查指示本身，從生動的實際工作的觀點來檢查這些指示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果以為我們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確，那就可笑了。同志們，這樣的事情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檢查執行情況正是要我們的工作人員在實踐的烈火中，不僅檢查我們指示的執行情況，而且檢查

指示本身是否正確。因此，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們的整個領導有缺陷。

就拿純粹黨方面的檢查執行情況的工作來說吧。我們通常都是叫州委員會和省委員會的書記到中央來報告工作，以便檢查中央指示的執行情況。書記們做了報告，也承認了自己工作中的缺點。中央就指摘他們，通過老一套的決議，指示說，要深入工作，要展開工作，要強調這點那點，要着重注意這點那點等等。書記們帶着這種決議回到各地。以後又叫他們來，同樣又是深入、展開等等一套。我不是說，所有這一套沒有一點好處。不，同志們，從教育和督促各級組織的意義上來說，這樣做有它好的一面。但是應當承認，這種檢查執行情況的方法已經不夠了。應當承認，這種方法必須拿另一種方法來補充，那就是把我們黨和蘇維埃上層人員派去做地方工作。（喊聲：「這是好事情！」）我說的是派我們的領導同志暫時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是去做指揮員而是去做聽從地方組織指揮的普通工作人員。我認為這個辦法很有前途，如果老老實實地誠心誠意地加以執行，它可以改進檢查執行情況的工作。

如果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正副人民委員、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團委員、各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等經常到地方上去，在那裏進行工作，以便了解工作情況，研究一切困難、一切缺點和優點，那末你們可以確信，這將是對執行情況的最切實有效的檢查。這將是豐富我們可敬的領導者的經驗的最好方法。如果這個方法成了一種制度（而這是必須成爲制度的），那末你們可以確信，我們這裏擬定的法律，我們制定的指示，就會比目前的要切合實際和正確得多了。



同志們，關於沙赫特事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 四 總 結

我們有國內敵人，也有國外敵人。同志們，這一點是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的。

我們有過收購危機，但是這種危機已經消除了。收購危機標誌着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對蘇維埃政權發動的第一次嚴重進攻。

我們又有沙赫特事件，但是這種事件已在處理而且無疑一定會處理好。沙赫特事件標誌着國際資本及其在我國的代理人對蘇維埃政權發動的又一次嚴重進攻。這是對我國內政的經濟干涉。

不用說，無論從內部來的或外部來的諸如此類的進攻，是可能重演而且大概會重演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有最高度的警惕，時刻戒備。同志們，如果我們警惕起來，我們將來也一定會打敗我們的敵人，正像我們現在和過去打敗了他們一樣。（熱烈鼓掌多時）

載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八日

「真理報」第九十號

# 致科斯特羅馬工人的賀電

在五一節，在我們黨的創始人列寧的紀念像於科斯特羅馬揭幕的日子，謹向科斯特羅馬的工人致兄弟的敬禮！

科斯特羅馬工人萬歲！

五一萬歲！

列寧永遠活在工人階級的心裏！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

載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

「北方真理報」（科斯特羅馬）

第一〇二號

# 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

## 第八次代表大會<sup>(三)</sup>上的演說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

同志們！通常在代表大會上總是談成績。毫無疑問，我們是有成績的。當然，這些成績並不小，而且也用不着把它們隱瞞起來。但是，同志們，我們這裏最近談成績談得這樣多，有時談得這樣膩，以致使人再也不想重複了。因此，請允許我打破慣例，不向你們談成績，而略為談談我們的缺點以及因為這些缺點而產生的我們的任務。

同志們，我指的是有關我們國內建設問題的任務。

這些任務涉及三個問題：我們政治工作路線的問題，提高廣大人民羣衆的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反官僚主義鬥爭的問題，以及培養我們新的經濟建設幹部的問題。

### 一 加強工人階級的戰鬥準備

我們先談第一個問題。目前的特點是：我們在和平發展的條件下進行建設已經五年了。我所說的和平發展的條件不僅是指我們沒有和國外敵人作戰，而且也是指國內沒有內戰的因素。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我國建設的和平發展的條件。

你們知道，我們和全世界的資本家打了三年仗，就是爲了贏得這些和平發展的條件。你們知道，我們已經贏得這些條件，我們認爲這是我們極大的成就。但是，同志們，任何勝利，其中也包括這個勝利，還有它不利的一面。和平建設的條件對我們不是沒有影響的。這些條件在我們的工作上，在我們的工作人員身上和他們的心理上，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在這五年內，我們就像沿着軌道一樣平穩地前進着。因此，我們許多工作人員就產生了一種情緒，認爲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們就好像坐在特別快車上，不用換車，沿着軌道一直向社會主義前進。

在這個基礎上就產生了『自流』論，『碰運氣』論，自然而然『一切都會搞好』的理論，我們這裏沒有階級、我們的敵人已經安靜，我們這裏一切都會如意的理論。由此就產生了某種懈怠、沉睡的傾向。這種沉睡的心理，這種任工作『自流』的心理，也就構成和平發展時期不利的一面。

這種情緒的危險性何在呢？就在於這種情緒會蒙蔽工人階級的眼睛，使他們看不清自己的敵人，用誇大敵人的弱點的話來麻痹工人階級，破壞工人階級的戰鬥準備。

決不能安慰自己說，我們的黨有一百萬黨員，青年團有二百萬團員，工會有一千萬會員，因此就完全可以保證徹底戰勝敵人。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歷史證明：最大的軍隊，由於驕傲自大，過分相

信自己的力量，過分輕視敵人的力量，由於沉睡，失去了戰鬥準備，在緊急關頭陷於突然受敵的境地，結果遭到了滅亡。

就是最大的政黨，如果它不接受歷史的教訓，如果它不時時刻刻加強本階級的戰鬥準備，也可能陷於突然受敵的境地，也可能遭到滅亡。同志們，陷於突然受敵的境地是最危險的事情。陷於突然受敵的境地，就是成了「意外」的犧牲品，成了在敵人面前張皇失措的犧牲品。而張皇失措的結果就是瓦解、失敗和滅亡。

我可以給你們舉出國內戰爭時期我們軍隊生活中的許多例子，當時小部隊往往把大兵團打得落花流水，因為這些兵團沒有充分的戰鬥準備。我可以告訴你們：在一九二〇年，不下五千人的三個騎兵師被一個步兵營打得落花流水，狼狽而逃，這僅僅是因為騎兵師陷於突然受敵的境地，在敵人面前張皇失措，它們不了解敵人，其實敵人的數量非常少，如果這幾個師沒有處於沉睡的狀態，後來也沒有陷於張皇失措、束手無策的境地，那末一下子就能把敵人打垮。

關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青年團、我們的工會以及我們的一般力量也必須這樣說。以為我們已經沒有階級敵人了，他們已被打垮和肅清了，這是不對的。不，同志們，我們的階級敵人還存在。不僅存在，而且還在增長，企圖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發動。

本年度冬季我們收購方面的困難說明了這一點，當時農村資本主義分子企圖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政策。

沙赫特事件說明了這一點，這個事件是國際資本和我們國內的資產階級共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表現。

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方面的許許多多事實也都說明了這一點，這些事實你們都知道，所以用不着在這裏多說了。

決不能絕口不提工人階級的這些敵人。輕視工人階級的階級敵人的力量就是犯罪。特別是現在，在我國和平發展時期，當破壞工人階級戰鬥準備的沉睡論和「自流」論有某種有利地盤的時候，就更不能絕口不提這一切了。

收購危機和沙赫特事件的重大教育意義就是：它們驚醒了我們所有的組織，打破了「自流」論，再一次有力地指出了階級敵人的存在，這些敵人存在着，他們並沒有打瞌睡，所以必須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警惕性、革命性和戰鬥準備去反對這些敵人。

因此，黨的當前任務，黨的日常工作政治路綫就是：加強工人階級的戰鬥準備去反對它的階級敵人。

不能不指出，青年團的這次代表大會，特別是「青年國真理報」，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重視這一任務了。你們知道，在發言人的講話中以及在「青年國真理報」的文章裏，都指出了這一任務的重要性。同志們，這很好。不過還必須使大家不要把這一任務看做臨時的、瞬息即逝的任務，因為在我們國內還有階級，我們還受資本主義包圍的時候，加強無產階級戰鬥準備這樣一個任務就應該貫

串在我們的全部工作中。

## 二 組織自下而上的羣衆性的批評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反官僚主義鬥爭的任務，關於對我們的缺點組織羣衆性的批評的任務，關於組織自下而上的羣衆性的監督的任務。

阻礙我們前進的最兇惡的敵人之一就是官僚主義。它生活在我們的一切組織裏，不論是黨組織、青年團組織、工會組織或經濟組織。人們說到官僚主義分子的時候，通常是指那些非黨的舊官吏，這些人在我們的諷刺畫中通常被畫成是戴眼鏡的。（笑聲）同志們，這是不完全對的。如果問題只在舊官僚主義分子身上，那末反官僚主義鬥爭就是最容易不過的事了。糟糕的是問題並不在舊官僚主義分子身上。同志們，問題是在新官僚主義分子身上，問題是在同情蘇維埃政權的官僚主義分子身上。最後，問題是在共產黨員中的官僚主義分子身上。共產黨員官僚主義分子是最危險的一種官僚主義分子。爲什麼呢？因爲他以黨員的稱號來掩飾自己的官僚主義。遺憾的是，這樣的共產黨員官僚主義分子在我們這裏並不少。

就拿我們黨組織來說吧。你們大概已經知道斯摩稜斯克事件、阿爾喬莫夫斯克事件等等。試問，這是偶然的嗎？爲什麼在我們黨組織的某些環節中會發生這種腐化墮落的可恥事件呢？這是因爲有

些人把黨的壟斷弄到了荒謬的地步，壓制了下層的呼聲，取消了黨內民主，培植了官僚主義。怎樣來消除這種禍害呢？我認爲要消除這種禍害，除了組織黨員羣衆自下而上的監督以外，除了發揚黨內民主以外，沒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辦法。激起黨員羣衆對這些腐化分子的憤恨並且讓他們有可能把這些分子攆出去，這有什麼可以反對的呢？幾乎是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

或者拿青年團來說。你們當然不會否認，在青年團的某些組織裏有些徹頭徹尾的腐化分子，向這些分子展開無情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但是我們暫且不談腐化分子。我們就拿最近的事實來說，青年團內存在着以個人爲對象的無原則的小集團鬥爭，弄得團內烏煙瘴氣。爲什麼在青年團裏「柯薩列夫之流」和「索波列夫之流」要多少就有多少，而要馬克思主義者却不得不打着燈籠去找呢？（鼓掌）這個事實不是說明青年團上層機構的某些環節正處在官僚主義的僵化過程中，又是說明什麼呢？

而工會呢？誰會否認在工會裏有的是官僚主義呢？在企業中我們有生產會議，在工會中我們有臨時監察委員會。這些組織的任務是：喚起羣衆，揭發我們的缺點，指出改進我們建設的途徑。爲什麼這些組織在我們這裏沒有發揮作用呢？爲什麼這些組織不是生氣勃勃的呢？工會裏的官僚主義加上黨組織裏的官僚主義使工人階級的這些極重要的組織不能發揮作用，這不是很明顯嗎？

最後，談談我們的經濟組織。誰會否認我們的經濟機關有官僚主義的毛病呢？就拿沙赫特事件來說吧。難道沙赫特事件不是表明了我們的經濟機關不是在邁步前進，而是在蹣跚爬行嗎？

怎樣才能肅清所有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呢？



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組織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來批評我們機關裏的官僚主義，批評它們的缺點和錯誤。

我知道，激起勞動羣衆的憤怒來反對我們組織裏的官僚主義病態，有時會觸犯我們某些過去有過功勞而現在害了官僚主義毛病的同志。可是這難道就能阻止我們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嗎？我認爲不能而且不應當。這些同志過去有功勞，應該向他們彎腰鞠躬，他們現在犯了錯誤，有了官僚主義，可以把他們痛打一頓。（笑聲，鼓掌。）不這樣又怎麼辦呢？既然事業的利益要求這樣，爲什麼不這樣做呢？

有人提到來自上面的批評，來自工農檢查院、來自我們黨中央等等的批評。當然，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這還非常不夠。而且現在主要的問題完全不在這裏。現在主要的問題在於：掀起極廣泛的自下而上的批評浪潮來反對官僚主義，特別是反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只有從上下兩方面施以壓力，只有把重點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評，才能指望順利進行鬥爭並根絕官僚主義。

如果以爲只有領導者才有建設的經驗，那就錯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建設我國工業的千百萬工人羣衆每天都在積累豐富的建設經驗，對我們來說，這種經驗的價值絲毫不亞於領導者的經驗。我們所以需要自下而上的羣衆性的批評、自下而上的監督，也就是爲了不使千百萬羣衆的這種經驗白白地喪失，爲了考慮到這種經驗並加以採用。

因此，黨的當前任務就是：展開無情的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組織自下而上的羣衆性的批評，在制

定消滅我們缺點的實際決定中考慮到這種批評。

不能說青年團特別是『青年團真理報』沒有考慮到這個任務的重要性。這裏的缺點是：這個任務往往執行得不徹底。而要徹底執行這個任務，不僅必須考慮到批評，而且必須考慮到批評的效果，考慮到批評後所實行的改進。

### 三 青年必須掌握科學

第三個任務是關於培養新的社會主義建設幹部的問題。

同志們，在我們面前擺着改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極偉大的任務。在農業方面，我們必須為聯合的公共大經濟打下基礎。從莫洛托夫同志今天的公告(2)中你們一定會知道，蘇維埃政權提出了把分散的小農經濟聯合為集體經濟和建立新的大規模的國營穀物農場的極艱鉅的任務。不解決這些任務，就不可能真正地迅速地前進。

蘇維埃政權在工業方面所依靠的是最巨大最集中的生產，而在農業方面所依靠的却是最分散最細小的農民經濟，小農經濟是半商品經濟，雖然它的播種面積達到了戰前的標準，但是它所提供的商品糧食比戰前少得多。將來在糧食收購方面可能發生的各種困難的根源就在這裏。要擺脫這種狀況，就必須切實地在農業方面組織公共的大生產。但是要建立大經濟，就必須懂得農業科學。而要懂得，

就必須學習。在我們這裏懂得農業科學的人簡直少得不像話。因此，任務就是要造就新的、年輕的公共農業建設幹部。

在工業方面，我們的情況好得多。但是這裏新的建設幹部的缺乏也阻礙着我們前進。只要回憶一下沙赫特事件，就能了解造就新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幹部的問題是多麼迫切。當然，我們有舊的工業建設專家。但是，第一、這種專家在我們這裏很少；第二、他們不是全都願意建設新工業；第三、他們中間許多人不了解新的建設任務；第四、他們中間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已經老了，快要不中用了。因此，要把事業向前推進，就必須從工人階級、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中加迅速造就新的專家幹部。

我國無論在農業方面或工業方面願意參加建設和領導建設的人有的是，會建設和會領導的人却少得不像話。相反地，我們在這方面是非常無知的。不但如此，我們還有些人決心歌頌我們的沒有文化。如果你不識字或者常寫錯字，並以自己的落後自誇，那你就是「產業」工人，你就得到榮譽和尊敬。如果你擺脫了沒有文化的狀況，認識了字，掌握了科學，那你就不是自己人了，你「脫離了」羣衆，不再是工人了。

我認爲不消除這種野蠻和不文明的現象，不消除這種對待科學和有文化的人的野蠻態度，我們就一步也不能前進。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擺脫沒有文化的狀況，如果它不能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如果它不掌握科學，不善於根據科學的原則來管理經濟，那它就不能真正成爲國家的主人。

同志們，應當了解現在的鬥爭條件和國內戰爭時期不同。在國內戰爭時期，可以用衝擊的方法，

可以憑勇敢和大膽，可以用騎兵式的突襲方法去奪取敵人的陣地。現在，在和平經濟建設的條件下，用騎兵式的突襲方法只會把事情搞壞。現在也和從前一樣需要勇敢和大膽。但是單憑勇敢和大膽是成不了大事的。現在要打垮敵人，必須善於建設工業、農業、運輸業和商業，必須拋掉對待商業的高傲的老爺式的態度。

要建設，就必須有知識，必須掌握科學。而要有知識，就必須學習。頑強地、耐心地學習。向所有的人學習，不論向敵人或朋友都要學習，特別是向敵人學習。咬緊牙關學習，不怕敵人譏笑我們，笑我們無知，笑我們落後。

在我們面前有一座堡壘。這座堡壘就叫做科學，它包括許多部門的知識。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佔領這座堡壘。青年們如果願意成爲新生活的建設者，願意成爲老近衛軍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須佔領這座堡壘。

現在我們不能只限於培養一些各方面都會吹一點的一般共產黨員幹部，一般布爾什維克幹部。一知半解和自詡淵博現在對我們來說是桎梏。現在我們需要金屬、紡織、燃料、化學、農業、運輸、商業、會計等方面的布爾什維克專家。現在我們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萬的能够在各種知識部門中成爲行家的新的布爾什維克幹部。沒有這些幹部，就談不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飛快速度。沒有這些幹部，就談不到我們能趕上和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掌握科學，培養各種知識部門的新的布爾什維克專家幹部，學習，學習，最頑強地學習，——這

就是現在的任務。

革命青年向科學大進軍，——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熱烈鼓掌。高喊：『烏拉！』）

『好呵！』全場起立。）

載於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真理報』第一二三號

# 給『青年團真理報』

(紀念創刊三周年)

向我國工農青年的戰鬥機關報『青年團真理報』致親切的敬禮！

祝『青年團真理報』在以對工人階級的敵人作不調和的鬥爭的精神、以爭取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完全勝利的精神教育青年這一艱鉅戰綫上獲得成就！

希望『青年團真理報』成爲警鐘，喚醒沉睡的人，鼓舞疲倦的人，推動落後的人，抨擊我們各機關的官僚主義，揭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宣揚我們建設中的成就，從而有助於培養新的人材、新的社會主義建設者、能够接替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新的男女青年一代！

我們革命的力量就在於我們老一代和新一代革命者之間沒有隔閡。我們所以勝利，是因爲我們的老近衛軍和青年近衛軍走在一起，在一條戰綫上，在一個行列中反對國內和國外的敵人。

任務就是要保持和鞏固這種團結。

希望『青年團真理報』成爲布爾什維克的老近衛軍和青年近衛軍團結一致這一思想的始終不倦

的宣揚者！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載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青年團真理報』第一三三號

# 給斯維爾德洛夫大學

(紀念成立十周年)

斯維爾德洛夫大學<sup>(2)</sup>成立以來已經十年了，這是黨在爲培養列寧式的新幹部而鬥爭的戰線上  
的極大成就。

十年來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給黨供獻了成千上萬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青年工作者，他們接替了  
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

大學在成立以來的十年內，完全沒有辜負人們的期望，沒有辱沒自己的創始人——共產主義的  
先進戰士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的名字。

教會工人黨員掌握馬克思和列寧的科學方法，並把這種科學方法正確地運用到社會主義建設事  
業中去，——這就是斯維爾德洛夫大學過去，現在和將來光榮執行的任務。

值此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成立十周年之際，特向斯維爾德洛夫大學以前和現在  
的學生致敬！



向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第十周年的畢業生，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新隊伍致敬！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真理報」第一二二號

# 在糧食戰綫上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和紅色教授學院、共產主義科學院、斯維爾德洛夫夫大學學生的談話節錄）

問：我國糧食困難的根源是什麼？擺脫這些困難的出路何在？既然有這些困難，那末對於我國整個工業發展的速度，特別是從輕工業和重工業的對比來看，應該得出什麼結論？

答：初看起來，會覺得我國糧食困難是偶然的，只是由於計劃得不好，只是由於經濟平衡工作中有某些錯誤。

可是，僅僅是初看起來才有這樣的感覺。其實，困難的原因在這裏要深刻得多。計劃得不好和經濟平衡工作中有錯誤在這裏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拿計劃得不好和偶然的錯誤來解釋一切，那就是犯了極大的錯誤。輕視計劃工作的作用和意義是錯誤的。可是誇大計劃原則的作用，以爲我們已經達到能夠計劃一切和調節一切的發展階段，那就更加錯誤了。

不應當忘記，在我國國民經濟中，除了那些受我們計劃控制的成分以外，還有另一些暫時不受計劃控制的成分，最後，還有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能單單通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計劃工作

來戰勝的。

正因為如此，我認爲不能把一切都歸結爲簡單的偶然現象，歸結爲計劃工作的錯誤等等。那末，我國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何在呢？

我國糧食困難的根源就在於我國商品糧食產量比糧食需要量增長得慢。

工業在發展。工人數量在增加。城市在發展。最後，需要商品糧食的各種經濟作物（棉花、亞麻、甜菜等等）的產區也在擴大。所有這些情形使糧食需要量，商品糧食需要量迅速增長。而商品糧食產量的增長却慢得要命。

不能說我們本年度收購來的由國家支配的糧食比去年或前年少。恰恰相反，本年度我們由國家掌握的糧食比往年多得多。但是我們現在還是遇到了糧食困難。

請看幾個數字吧。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們共收購四億三千四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億二千三百萬普特，留在國內的有三億一千一百萬普特。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們共收購五億九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一億五千三百萬普特，留在國內的有四億四千三百萬普特。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們共收購五億七千六百萬普特糧食。其中輸出國外的有二千七百萬普特，留在國內的有五億四千九百萬普特。

換句話說，本年度截至四月一日，我們收購來供國內需要的糧食比去年多一億普特，比前年多二億三千萬普特。但是我們本年度在糧食戰綫上還是發生了困難。

我在一個報告中已經說過，這些困難被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首先是富農，利用來破壞蘇維埃經濟政策。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來消滅富農的反蘇維埃發動。因此，關於這一點我在這裏就不多說了。我在這裏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指的是商品糧食產量增長得慢的原因問題，指的是雖然我國播種面積和糧食總產量已經達到戰前標準，而我國商品糧食產量還是比糧食需要量增長得慢的問題。

的確，我國播種面積已經達到戰前標準，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這是事實。糧食總產量在去年已經等於戰前生產標準，就是說已經達到五十億普特，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是的，這是事實。儘管如此，我們所生產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了一半，而輸出國外的糧食比戰前少了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首先和主要是因為十月革命使我國農業的構成發生了變化，使它從生產商品糧食極多的地主大經濟和富農大經濟轉為生產商品糧食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戰前我國有一千五百萬到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國却有二千四百萬到二千五百萬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經說明現在我國農業的主要基礎是生產商品糧食極少的小農經濟。

農業中的大經濟，不管是地主經濟，富農經濟還是集體經濟，它的力量就在於它有可能採用機器，利用科學成就，使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生產的商品糧食最多。相反地，小農經濟的弱點就在於它沒有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因此，它是半消費性的、出產商品很少的經濟。

例如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來說。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佔其總產量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二。換句話說，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相對地比戰前地主經濟生產的多。而中小農戶呢？它們生產的商品糧食只等於其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一點二。可見這裏的差別是很明顯的。

從下面的數字可以看出過去戰前時期和現在十月革命以後時期糧食生產構成的情形。這些數字是中央統計局局務委員涅姆契諾夫同志提供的。涅姆契諾夫同志在說明書裏附帶聲明說，這些數字不能說完全精確，只能使人做一種大約的估計。但是從一般糧食生產的構成來看，特別是從商品糧食生產的構成來看，這些數字已經完全足以使我們明白戰前時期和十月革命以後時期的差別了。

|                         | 糧食總產量   |      | 商品糧食(農村外的) |      | 商品率  |
|-------------------------|---------|------|------------|------|------|
|                         | 單位百萬普特  | 百分比  | 單位百萬普特     | 百分比  |      |
| <b>戰前：</b>              |         |      |            |      |      |
| (一)地主                   | 六〇〇     | 一一・〇 | 二八一・六      | 二一・六 | 四七・〇 |
| (二)富農                   | 一、九〇〇   | 三八・〇 | 六五〇・〇      | 五〇・〇 | 三三・〇 |
| (三)中農和貧農                | 二、五〇〇   | 五〇・〇 | 三六九・〇      | 二八・四 | 一四・七 |
| 總計                      | 五、〇〇〇   | 一〇〇  | 一、三〇〇・六    | 一〇〇  | 二六・〇 |
| <b>戰後(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b> |         |      |            |      |      |
| (一)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            | 八〇・〇    | 一・七  | 三七・八       | 六・〇  | 四七・二 |
| (二)富農                   | 六一七・〇   | 一三・三 | 一二六・〇      | 二〇・〇 | 二〇・〇 |
| (三)中農和貧農                | 四、〇五二・〇 | 八五・三 | 四六六・二      | 七四・〇 | 一一・二 |
| 總計                      | 四、七四九・〇 | 一〇〇  | 六三〇・〇      | 一〇〇  | 一三・三 |

這個統計表說明什麼呢？

第一、它說明絕大部分的糧食生產已經從地主富農方面轉到小農中農方面。這就是說，小農中農在完全擺脫了地主壓迫並在基本上摧毀了富農勢力之後，有可能來大大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況了。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基本農民羣衆從十月革命得到的主要好處首先表現在這裏。

第二、它說明我國商品糧食的主要持有者是小農，首先是中農。這就是說，不僅從糧食總產量來看，而且從商品糧食產量來看，十月革命後蘇聯已經成爲小農經濟的國家，中農已經成爲農業中的『中心人物』。

第三、它說明在地主經濟（大經濟）已經被消滅、富農經濟（大經濟）已經縮小三分之二以上、農業已經轉爲商品率只佔百分之十一的小農經濟、糧食生產方面又還沒有比較發達的公共大經濟（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情形下，商品糧食產量必然會而且事實上已經較戰前大爲減少。雖然我們的糧食總產量已經達到戰前標準，而我們現在所持有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了一半，這是事實。

這就是我國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

正因爲如此，不能把我們在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看做簡單的偶然現象。

毫無疑問，還有一種情況也在這裏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這就是我們的商業機關承担了不必要的供應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義務，結果不能不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國家的存糧。可是沒有任何理由懷疑，我國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並不在於這種情況，而在於我國農業的商品率提高得很慢，同時商

品種食需要量却增長得很快。

出路何在呢？

有些人認爲出路在於恢復富農經濟，在於發展和擴大富農經濟。這些人不敢說要恢復地主經濟，他們大概知道，現在說這樣的話是有危險的。可是，唯其如此，他們也就更樂意說必須大力發展富農經濟，以利於……蘇維埃政權。這些人以為蘇維埃政權可以同時依靠兩個對立的階級，既依靠以剝削工人階級爲經濟原則的富農階級，又依靠以消滅一切剝削爲經濟原則的工人階級。這真是反動派才玩得出的把戲。

用不着證明，這種反動的「計劃」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列寧主義的任務，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有人說，富農「並不」比城市資本人家「壞」，富農一點也不比城市耐普曼危險，因此，我們現在不必「怕」富農，——這種說法是自由派的空話，是用來麻痹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警惕性的。不應當忘記，在工業方面我們能用產品佔工業品總產量十分之九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去和城市小資本人家對立，而在農村生產方面我們能用來和富農大生產對立的，却不過是尙未鞏固而糧食產量等於富農經濟糧食產量八分之一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不了解富農大經濟在農村中的作用，不了解富農在農村中的比重較小資本人家在城市工業中的比重大過百倍，那就是發了瘋，離開了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的敵人方面去了。

那末，出路究竟何在呢？

(一) 首先，出路在於從落後的分散的小農戶轉爲有機器供應的、用科學成就武裝起來的、能生產大量商品糧食的聯合的公共的大農莊。出路在於在農業方面由個體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經濟。

列寧從十月革命後最初幾天起就號召黨去組織集體農莊。從那時起，我們黨內就沒有停止過宣傳集體農莊的思想。可是，建立集體農莊的號召只是在最近才得到廣泛的響應。這首先是由於農村合作社的廣泛發展已經給農民情緒的有利於集體農莊的轉變準備了條件，而許多集體農莊現在每俄畝已能出產糧食一百五十至二百普特，商品率達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事實，又使貧農和下中農很想參加集體農莊。

還有一種情況也在這裏起着不小的作用，這就是國家只是在最近才有可能大力資助集體農莊運動。大家知道，今年國家用於幫助集體農莊的款項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共六千餘萬盧布）。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完全正確，它認爲羣衆性集體農莊運動的條件已經成熟，認爲加強集體農莊運動是提高我國糧食生產商品率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根據中央統計局的材料，一九二七年集體農莊的糧食總產量不下五千五百萬普特，商品率平均爲百分之三十。今年年初建立新集體農莊的巨浪和原有集體農莊的擴大，一定會使今年年底集體農莊的糧食產量大大增加。任務在於保持集體農莊運動現在的發展速度，擴大集體農莊，取消那些有名無實的集體農莊，而代之以名副其實的集體農莊，並建立一種制度，使集體農莊把全部商品糧食交給



國家的和合作社的組織，否則國家就停止給以補助金和貸款。我認爲只要遵守這些條件，大約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從集體農莊那裏得到將近一億普特的商品糧食。

人們有時候把集體農莊運動同合作社運動對立起來，大概他們認爲集體農莊是一回事，而合作社是另一回事。這當然是不對的。有些人甚至把集體農莊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對立起來。不用說，這樣對立起來是毫無道理的。其實，集體農莊是合作社的一種形式，是最明顯的生產合作社形式。有銷售合作社，有供應合作社，也有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是整個合作社運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列寧的合作社計劃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實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就是把農民從銷售合作社和供應合作社提高到生產合作社，提高到所謂集體農莊的合作社。這也就說明了，爲什麼我們的集體農莊只是在銷售合作社和供應合作社發展和加強之後才開始產生和發展起來。

(二)其次，出路在於擴大和鞏固原有的國營農場，建立和發展新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根據中央統計局的材料，現有的國營農場一九二七年糧食總產量不下四千五百萬普特，商品率爲百分之六十五。毫無疑問，在國家一定的支持下，國營農場是會大大提高糧食產量的。

但是任務並不以此爲限。蘇維埃政權已經做出決定，要在沒有農民份地的地區建立新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每個農場佔地一萬至三萬俄畝），這些農場五六年後大約能生產一億普特商品糧食。這種國營農場已經着手建立。任務就是無論如何要實現蘇維埃政權的這個決定。我認爲只要完成這些任務，大約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從新舊國營農場那裏得到八千萬至一億普特的商品糧食。

(三)最後，出路在於不斷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支持個體的富農大經濟。但是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支持中小個體農民經濟，提高它的單位面積產量，引導它走上合作社組織的軌道。這是一項老任務，早在一九二一年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時候我們就特別強調地宣佈過。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sup>(二)</sup>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又肯定了這項任務。現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使這項任務的重要性更明顯了。因此，應當堅決完成這項任務，就像堅決完成上述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兩項任務一樣。

所有的材料都說明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在幾年以內大約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現在我國所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萬部。只要把這些木犁換成鐵犁，就能使我國糧食產量大大增加。更不用說，我們還要以一定數量的肥料、精選種子和小型機器等等供給農民經濟。實行預購，同整個整的村子訂立合同，供給它們種子等等，同時從它們那裏取得相當數量的糧食，這種方法是提高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和吸引農民參加合作社的最好方法。我認爲只要在這方面認真工作，大約三四年後，我們就能從中小個體農民經濟那裏至少多得一億普特商品糧食。

總之，只要完成這一切任務，那末三四年後，我們國家就可以多掌握二億五千萬到三億普特商品糧食，就比較能夠按國內外的需要適當地機動調度了。

擺脫糧食戰綫上的困難所必須採取的措施大體上就是如此。

把這些主要措施和當前在改進農村商品供應計劃方面的措施結合起來，並使我們的商業機關不

再承擔供應許多中小城市糧食的義務，——這就是現在的任務。

除了上述措施以外，是不是還應當採取其他一些措施，比如說，採取減緩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措施（因為我國工業的發展使糧食需要量迅速增長，這種增長暫時超過了商品糧食產量的增長）？不，不應當。無論如何不應當！減緩工業發展速度，就是削弱工人階級，因為工業發展中的每個前進步驟，每個新工廠，照列寧的說法，都是工人階級在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鬥爭中、在對我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鬥爭中加強自己陣地的「新堡壘」。相反地，我們應當保持現在的工業發展速度，我們應當一有可能就加快這種速度，以便把大量商品投入農村而從農村取得更多的糧食，以便供給農業首先是供給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以機器，以便使農業工業化並使農業生產的商品率提高。

也許爲了更加「慎重」起見，應當延緩重工業的發展，把主要是供應農民市場的輕工業變成我國工業的基礎吧？無論如何不應當！這樣做就是自殺，就是破壞我國全部工業，連輕工業在內。這樣做就是離開我國工業化的口號，把我國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附庸。

我們在這裏的出發點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所指出的有名的指導性的原理（三），這些原理是我們全黨絕對必須遵循的。請聽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上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豐收還不够，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良好也還不够，我們還要有重工業。」

還有：

「我們在各方面，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都實行節約。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把它恢復起來，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而不成其為獨立的國家。」（『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八頁）

列寧的這些指示是不能忘記的。

採取上述措施對工農聯盟會有什麼影響呢？我認為採取這些措施只會促進工農聯盟的鞏固。

的確，如果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加速發展起來；如果由於得到直接幫助中小農戶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起來，而合作社又能掌握越來越廣大的農民羣衆；如果國家又多得機動調度所必需的幾億普通商品糧食；如果由於採取諸如此類的措施富農被制服和逐漸被戰勝，——那末工農聯盟內的工農矛盾因而就會日益消失，在糧食收購方面就沒有必要再採取非常措施，廣大農民羣衆就會日益轉向集體經濟形式，為戰勝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就會日益具有羣衆性和組織性，這難道還不明顯嗎？採取這些措施只會有利於工農聯盟，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只是應當注意，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並不是什麼普通的聯盟。這種聯盟是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的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其目的是：（甲）加強工人階級的陣地，（乙）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內的領導作用，（丙）消滅階級和階級社會。對工農聯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做什麼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不能叫做列寧主義。

怎樣把工農聯盟思想和列寧所說的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著名原理結合起來呢？這裏有沒有矛盾呢？這裏只在表面上看來是有矛盾的。其實這裏沒有任何矛盾。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sup>(2)</sup>中認定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而在同一個報告中他又再三論證工農聯盟的必要，說「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護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够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很明顯，列寧無論如何也沒有認為這裏有任何矛盾。

應當怎樣了解列寧所說的農民是「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這一原理呢？這是不是說農民是由資本家組成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

第一、這是說，個體農民是一個特別階級，它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因此也就和無產階級不同，因為無產階級是把經濟建築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

第二、這是說，個體農民是一個本身會分泌、產生和培養資本家、富農以及其他各種剝削分子的階級。

這種情況對於建立工農聯盟的事業是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呢？不，不是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不能認為是和全體農民的聯盟。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的聯盟。不同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作鬥爭，不同富農作鬥爭，這樣的聯盟是不能實現的。不把貧農當做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組織起來，這樣的聯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目前

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農聯盟，只有在列寧所提出的依靠貧農、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對富農的鬥爭這一有名的口號下才能實現。因為只有實行了這個口號，才能引導基本農民羣衆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

由此可見，列寧這兩個公式之間的矛盾只是虛假的、表面的。其實它們之間是沒有任何矛盾的。

載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

『真理報』第二二七號

## 給共產主義科學院黨建組組員的信

今天收到斯列普柯夫論自我批評的提綱。這個提綱原來是在你們組內討論過的。你們組的組員曾對我說，把這個提綱作為文件來散發，目的不是批評中央的路綫，而是論證中央的路綫。

否認黨員有批評中央的路綫的權利是不對的。不但如此，我認為你們組的組員甚至有權利在自已的小圈子裏提出自己特別的提綱來和中央的立場相對立。但是，斯列普柯夫的提綱所追求的目的顯然不是批評中央的路綫或者提出什麼新的東西來和中央的路綫相對立，而是解釋和論證中央的立場。大概正因為這個緣故，斯列普柯夫的提綱才在莫斯科黨組織內得到了某些傳播。

雖然如此，或者說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我有責任來說明：

(甲) 斯列普柯夫的提綱和中央在自我批評口號問題上的立場是不相符合的。

(乙) 這個提綱「修正」、「補充」中央的立場，當然也就使中央的立場變質，這正合乎我們機關和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分子的心意。

(一) 首先，斯列普柯夫的提綱所採取的方針是不正確的。斯列普柯夫的提綱僅僅在外表上像是一個論自我批評口號的提綱。實際上，這是一個論自我批評口號的危險性的提綱。不用說，任何革命

口號都有在實踐中被歪曲的某種可能性。自我批評口號當然也有這種可能性。但是把這種可能性當做問題的中心，當做論自我批評的提綱的基礎提出來，那就是本末倒置，就是破壞自我批評的革命作用，就是幫助那些鑒於自我批評有『危險性』而竭力對自我批評採取應付態度的官僚主義分子。我不懷疑，我們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分子讀了斯列普柯夫的提綱是不會不感到滿意的。

這樣的方針同中央在自我批評問題上的方針，同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關於沙赫特事件的決議，同中央六月間關於自我批評問題的公告<sup>(2)</sup>有沒有共同之處呢？

我認爲沒有。

(二) 斯列普柯夫的提綱按內容來說也是不正確的。我們組織裏的官僚主義是使自我批評成爲不可避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時也是自我批評最主要的對象之一。

不同我們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裏的官僚主義作鬥爭能夠前進嗎？

不能！

不同我們組織裏的官僚主義作堅決的鬥爭能夠組織羣衆的監督、發揮羣衆的創造性和主動性、吸引千百萬羣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嗎？

不能！

不實現自我批評口號能夠打擊、削弱、揭發官僚主義嗎？

不能！



在論述自我批評口號的提綱中，對官僚主義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消極因素，是自我批評最主要的對象之一這個問題能够不加闡明嗎？

顯然不能。

既然如此，爲什麼斯列普柯夫在自己的提綱中竟以沉默來迴避這個迫切的問題呢？在以論證中央的立場爲目的的論自我批評的提綱中，怎麼能把自我批評的極重要的任務，把反官僚主義鬥爭忘了呢？然而事實是：在斯列普柯夫的提綱中沒有一個字（真的沒有一個字！）提到我們組織裏的官僚主義，提到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分子，提到我們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工作中的官僚主義病態。

這種對待反官僚主義鬥爭這一極重要問題的非常輕率的態度，同中央在自我批評問題上的立場以及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關於沙赫特事件的決議、中央六月間關於自我批評的公告等等黨的文件能不能相容呢？

我認爲不能。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

載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九日

「青年團真理報」第九十號

# 列寧和聯合中農問題<sup>①</sup>

(答斯·同志)

斯·同志！

你說列寧在他那篇論皮梯利姆·索羅金的著名論文<sup>②</sup>中所提出的「要善於和中農成立協議，一分鐘也不放棄對富農的鬥爭，而只是穩固地依靠貧農」這一口號，似乎是「貧農委員會時期」的口號，是「所謂中立中農時期末期」的口號。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

貧農委員會是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成立的。到一九一八年十月底，我們在農村中的力量已經超過富農，中農已經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正是由於這種轉變，中央決定取消蘇維埃和貧農委員會這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改選鄉、村蘇維埃，把貧農委員會融化在新選出的蘇維埃中，也就是說取消貧農委員會。大家知道，這個決議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正式通過了。我指的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改選鄉、村蘇維埃以及把貧農委員會融化在蘇維埃中的決議。

① 本文略有刪節。斯大林

而列寧在其中宣佈了和中農成立協議的口號來代替中立中農的口號的那篇論文『皮梯利姆·索羅金的寶貴自供』是在什麼時候發表的呢？它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上述決議以後，幾乎過了兩個星期發表的。列寧在這篇論文中直截了當地說，我們採取和中農成立協議的政策，是因為中農已經轉到我們方面來了。

請看列寧的話吧：

『我們在農村中的任務就是消滅地主，粉碎剝削者和富農投機分子的反抗，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只能穩固地依靠半無產者，依靠「貧農」。但是中農並不是我們的敵人。他們過去動搖，現在仍然動搖，將來還會動搖；感化動搖分子的任務與打倒剝削者和戰勝積極敵人的任務是不同的。要善於和中農成立協議，一分鐘也不放棄對富農的鬥爭，而只是穩固地依靠貧農，——這就是當前的任務，因為正是現在，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中農必然會轉到我們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七一頁）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列寧的口號不是屬於舊時期即貧農委員會和中立中農時期的口號，而是屬於新時期即和中農成立協議時期的口號。所以，這個口號反映的不是舊時期的末期，而是新時期的

初期。

可是，你對列寧的口號所下的斷語不僅表面上不對，不僅所謂日期不對，而且實質上也是不對的。

大家知道，列寧關於和中農成立協議的口號，是作為新口號在我們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上用全黨名義宣佈的。大家知道，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正是確定我們和中農建立鞏固聯盟這一政策的原則的代表大會。大家知道，我們的黨綱，聯共（布）黨綱也是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大家知道，在這個黨綱中有幾條專門規定黨對農村各個集團即對貧農、中農、富農的態度。聯共（布）黨綱中的這些條文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以及黨對他們的態度是怎樣規定的呢？請看：

『俄國共產黨在全部農村工作中仍然依靠農村無產者階層和半無產者階層，首先把他們組織為獨立的力量，在農村中建立黨支部、貧農組織、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的特種工會等等，盡量使他們接近城市無產階級，使他們擺脫農村資產階級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響。』

俄國共產黨對富農即對農村資產階級的政策，就是堅決反對他們的剝削意圖，鎮壓他們對蘇維埃政策的反抗行為。

俄國共產黨對中農的政策，就是逐步地有計劃地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黨所提出的任務就是使中農離開富農，關心中農的需要從而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用思想感化的辦法而決不是用鎮壓的辦法來克服他們的落後性，在一切觸及中農切身利益的問題上力求

和中農成立實際協議，在確定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時要向中農讓步。」<sup>①</sup>（『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三五一頁（三））

你試找找黨綱的這些條文和列寧的口號的差別，哪怕是最小的差別，哪怕是字句上的差別！你找不出這種差別的，因為天下根本就沒有這種差別。而且毫無疑問，列寧的口號不僅和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問題的決議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是這些決議的最精確最恰當的表述。要知道，事實是這樣：聯共（布）黨綱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專門討論了中農問題的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而列寧宣佈和中農成立協議的口號的那篇反對皮梯利姆·索羅金的論文，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即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四個月在報上發表的。

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完完全全確認了，列寧在他那篇反對皮梯利姆·索羅金的論文中所宣佈的口號，認為這是目前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內黨在農村工作中必須遵循的口號，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列寧口號的妙處在哪裏呢？

列寧口號的妙處就在於它非常準確地抓住了黨在農村工作中的三位一體的任務，這個任務用一個簡短的公式表達出來就是：（甲）依靠貧農，（乙）和中農成立協議，（丙）一分鐘也不停止對富農的鬥爭。你試從這個公式中只拿一部分作為當前農村工作的基礎，而忘了其餘兩部分，你就一定會陷入

① 着重號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絕境。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現階段，不依靠貧農，不進行對富農的鬥爭，能不能和中農成立真正的鞏固的協議呢？

不能。

在目前發展條件下，不依靠貧農，不和中農成立協議，能不能順利地進行對富農的鬥爭呢？不能。

怎樣才能把黨在農村工作中的這個三位一體的任務最恰當地用一個概括的口號表達出來呢？我認為列寧的口號就是這個任務的最恰當的表述。必須承認，誰也不能比列寧說得更恰當了……

為什麼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的目前條件下，必須強調列寧口號的適當呢？

因為正是在現在，個別同志有一種趨向，要把黨在農村工作中的三位一體的任務分成幾部分，把它們彼此分隔開來。我們今年一二月間糧食收購運動的實踐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必須和中農成立協議，這是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知道的。但怎樣成立這個協議，就不是每個人都懂得的了。有些人想用放棄對富農的鬥爭或用放鬆這個鬥爭的辦法來和中農成立協議，說什麼進行對富農的鬥爭會嚇跑一部分中農，即富裕中農。

另外有些人則想用放棄組織貧農的工作或用放鬆這個工作的辦法來和中農成立協議，說什麼組織貧農會使貧農獨樹一幟，而獨樹一幟會把中農從我們方面嚇跑。

由於發生了這些離開正確路線的偏向，結果就忘記了這個馬克思主義原理：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只有堅決進行對富農的鬥爭並加強對貧農的工作，才能和中農成立鞏固的協議，否則中農就會認為富農有力量而倒向富農。

請回憶一下列寧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吧：

「必須確定對那個沒有一定的穩固立場的階級的態度。無產階級絕大多數都贊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絕大多數都反對社會主義，——要確定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是容易的。可是，當我們講到中農這樣一個階層的時候，就會看到這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一方面是私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他們是不剝削其他勞動者的。他們在數十年內受盡千辛萬苦來保持自己的地位，親身遭受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忍受一切苦痛，但同時他們又是私有者。因此，我們對待這個動搖的階級是有很大困難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三〇〇頁三三）

可是還有另外一些離開正確路線的偏向，其危險性並不亞於上述偏向。有時候，人們也進行對富農的鬥爭，可是進行得那麼笨拙，那麼粗率，以致打擊了中農和貧農。結果，富農仍舊安然無恙，而和中農的聯盟却發生了裂痕，一部分貧農暫時落入了陰謀破壞蘇維埃政策的富農的魔掌。

也有這樣的情況：人們企圖把對富農的鬥爭變為剝奪富農，把糧食收購工作變為餘糧收集制，忘

記了在我們目前條件下剝奪富農是愚蠢的，餘糧收集制並不是意味着和中農聯盟，而是意味着和中農鬥爭。

為什麼會產生這些離開黨的路綫的偏向呢？

因為不了解黨在農村工作中的三重任務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任務。因為不了解決不能把對富農鬥爭的任務同和中農協議的任務分開，決不能把這兩個任務同使貧農成為黨在農村中的支柱的任務分開。

○ 由此可見，離開正確路綫的偏向會給工農聯盟事業造成兩種危險：一種危險是有些人想把臨時的非常措施，比如說糧食收購方面的措施，變為黨的經常的或長期的方針；另一種危險是有些人想利用取消非常措施的機會來放縱富農，來宣佈貿易完全自由，使貿易不受國家機關的調節。因此，要保證正確的路綫，就必須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

我還要乘這個機會指出，我們的報刊不是一直都遵守這個規則，而是有時表現出某種片面性。比如說，揭露那些想把糧食收購方面的臨時性的非常措施變為我們政策的經常方針，從而給工農結合造成了威脅的人，那是很好的。可是不好而且不對的是，與此同時，沒有充分注意和沒有盡量揭露那些從另一方面威脅工農結合的人，沒有揭露那些屈服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要求放鬆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要求規定貿易完全自由使之不受國家調節，從而破壞工農結合的人，不揭露這種人，那是不好的，那是片面的。

還有，揭露那些認為——比如說——不可能和不宜於提高現階段仍是農業基礎的中小個體農民經濟的人，那是很好的。可是不好而且不對的是，與此同時，沒有揭露那些輕視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作用，不懂得現在還要在實踐中拿展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建設的任務來補充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經濟的任務的人。不揭露這種人，那是片面的。

要保證正確的路綫，就必須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拋棄任何片面性。



爲了我們目前農村工作的過程中不使這些任務彼此分隔開來，必須做些什麼呢？

爲此至少必須提出一個指導性的口號，這個口號要把所有這些任務概括爲一個總的公式，因而不容許把它們彼此分隔開來。

在我們黨的武庫中有沒有這樣一個公式，這樣一個口號呢？

是的，是有的。列寧提出的「要善於和中農成立協議，一分鐘也不放棄對富農的鬥爭，而只是穩固地依靠貧農」這一口號，就是這樣的公式。

因此，我認爲這個口號是最適宜的，能包括一切的口號，正是在現在，正是在農村工作的目前條件下，必須把這一口號提到第一位。

你認爲列寧的口號是「反對派的」口號，並且你在來信中間：「爲什麼……這個反對派的口號竟能於一九二八年五一前夕登載在『真理報』上……爲什麼這個口號竟出現在聯共中央的機關報『真理報』上，這只是排版錯誤，還是在中農問題上和反對派妥協了？」

不用說，話說得很厲害！可是，斯·同志，你還是在「轉彎地方」小心一點，否則你在氣頭上會做出結論說要禁止刊印我們的黨綱，因爲它完全確認了列寧的口號（這是事實！）並且它基本上是由列寧（決不是反對派！）起草，而爲我們黨（也不是反對派！）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請多尊重我們黨綱上關於農村各個社會集團的那些著名條文吧！請多尊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問題的決議吧！……

至於你說「在中農問題上和反對派妥協了」，我認爲這句話簡直不值一駁：這句話大概是你冒火的時候說出來的。

使你莫名其妙的大概是這樣一種情況：在列寧的口號中和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聯共（布）黨綱中所說的都是和中農成立協議，而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所說的却是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你大概認爲這裏有什麼類似矛盾的東西。也許你甚至喜歡這樣設想：和中農協議的政策好像是離開了和中農聯盟的政策。這是不對的，斯·同志。這是很大的錯誤。只有那些認得口號的字句而不懂得口號的意思的人才會這樣想。只有那些不知道和中農建立聯盟，和中農成立協議這個口號的歷史的人才會這樣想。會這樣想的只有這樣一種人，他們認爲列寧是自己離開了自己，因爲他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說要採取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的政策，而他在同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另一個演說中以及在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中，却又說我們現在需要實行和中農成立「協議」的政策。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列寧和黨（以第八次代表大會爲代表）並不認爲「協議」和「聯盟」這兩個概念有任何差別。原來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發表的一切演說中，處處在「聯盟」和「協議」這兩個概念之間劃上等號。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也是如此，這個決議在「協議」和「聯盟」這兩個概念之間劃上等號。正因爲列寧和黨認爲和中農成立協議的政策並不是偶然的和一時的政策，而是長期的政策，所以他們過去和現在都有一些根據把和中農成立協議的政策

稱爲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的政策，或者反過來，把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的政策稱爲和中農成立協議的政策。只要讀一讀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和同一次代表大會關於中農問題的決議，就可以深信這一點了。

請看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的一段話：

「因爲蘇維埃工作人員沒有經驗，因爲問題困難，所以原定對富農的打擊往往落到了中農頭上。我們在這裏犯了極大的錯誤。在這方面彙集起來的經驗會幫助我們今後盡量避免這種錯誤。這就是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實際上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們知道得很清楚，這個任務是困難的。我們還沒有什麼物資可以給中農，而中農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主義者，他們要求具體的物質資料，這種物質資料我們現在還拿不出來，而且國家也許還在沒有這種物質資料的情況下度過艱苦鬥爭的歲月，雖然這一鬥爭現在已經表明一定會完全勝利。可是我們在我們的行政實踐中能够做很多事情：改善我們的機關，糾正許多違法亂紀的現象。我們能够而且應當修改和糾正我們黨的那條沒有充分注意到和中農成立同盟、成立聯盟、成立協議<sup>①</sup>的路綫。」（「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二十頁（三））

可見列寧並沒有把「協議」和「聯盟」看做是有差別的。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再請看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中的一段話：

「把中農和富農混淆起來，把對付富農的辦法在某種程度上用到中農身上，那就不僅是最粗暴地違反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法令及其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暴地違反共產主義的一切基本原则；這些原則指出：在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進行堅決鬥爭的時期，無產階級和中農成立協議是無痛苦地過渡到消滅任何剝削的條件之一。」

因為農業技術比工業落後（甚至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如此，俄國更不用說了），所以經濟根柢比較牢固的中農在無產階級革命開始以後還會支持相當長的時期。因此，農村中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黨的工作人員的策略應當估計到和中農長期合作……

……這樣，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實行完全正確的政策，就能保證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和中農成立聯盟和協議……

……工農政府和共產黨的政策，今後在執行中也應當貫徹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兩者同中農成立協議的精神。」<sup>①</sup>（『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三七〇頁至第三七二頁（四））可見這個決議也沒有把「協議」和「聯盟」看做是有差別的。

不妨再指出一點，就是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這個決議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要和中農建立「鞏固

① 着重號都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聯盟」。但這不是說，決議因此就離開了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的政策呢？不，不是這個意思。這只是說，決議在「協議」、「合作」的概念和「鞏固的聯盟」的概念之間劃上等號。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不和中農成立「協議」，就不能和中農建立「聯盟」；而不和中農成立「長期的」協議與合作，和中農的聯盟就不能是「鞏固的」。

事實就是如此。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列寧和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離開了列寧關於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的聲明，或者必須拋棄這種不嚴肅的假設，而承認列寧和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沒有把「協議」和「鞏固的聯盟」這兩個概念看做是有任何差別的。

總之，誰不願意成爲空洞的咬文嚼字習氣的犧牲者，誰願意領會列寧的口號，即依靠貧農、和中農成立協議、進行對富農的鬥爭這一口號的意思，誰就不能不了解和中農成立協議的政策就是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的政策。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沒有懂得反對派的欺騙手腕，受了他們的挑撥，落入了敵人給你佈置好的圈套。反對派騙子在那裏大叫大嚷，硬說他們擁護列寧的關於和中農成立協議的口號，同時又做出挑撥性的暗示，說和中農成立「協議」是一回事，而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是另一回事。他們這樣做是想一舉兩得：第一、掩蓋自己在中農問題上的真正立場，即不是要和中農成立協議，而是要「同中農鬧翻」（見我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會議<sup>〔三〕</sup>上引證過的反對派分子斯米爾諾夫那篇大家

知道的演說；第二，用「協議」和「聯盟」間的虛構的差別來俘虜布爾什維克中的頭腦簡單的人，把他們完全弄糊塗，推着他們離開列寧。

而我們某些同志又是怎樣對待這一點的呢？他們不僅沒有摘下反對派騙子的假面具，不僅沒有揭露這些人對黨掩蓋自己真正立場的欺騙行爲，反而上了圈套，落入陷阱，讓別人推着他們離開列寧。反對派大談列寧的口號，反對派分子裝扮成列寧口號的擁護者，因此，我應當和這個口號劃清界限，使人們不致把我和反對派混在一起，否則人們會責備我『和反對派妥協』，——這些同志的邏輯就是如此！

這還不是反對派欺騙手腕的唯一例子。例如拿自我批評口號來說吧。布爾什維克不能不知道自我批評口號是我們黨的行動的基礎，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是布爾什維克的培養幹部的方法的靈魂。反對派大叫大嚷，硬說自我批評口號是他們反對派想出來的，硬說黨從他們那裏抄襲了這個口號，因而向他們投降了。反對派這樣做至少是想達到兩個目的：

第一、隱瞞並欺騙工人階級，不讓他們知道，在以破壞黨性爲目的的反對派的自我批評和以加強黨性爲目的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之間是隔着一道鴻溝的；

第二、使某些頭腦簡單的人上圈套，迫使他們和黨的自我批評口號劃清界限。

而我們某些同志又是怎樣對待這一點的呢？他們不僅沒有摘下反對派騙子的假面具，不僅沒有堅持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口號，反而落入陷阱，離開自我批評口號，聽憑反對派愚弄，並且……向

他們投降，同時又錯誤地以爲自己是和反對派對清界限的。

這樣的例子可以舉出一大堆來。

但是，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能聽憑任何人愚弄，尤其不能把反對派分子對於我們的評論作爲自己工作中的指南。我們應當走自己的路，既擯棄反對派的欺騙手腕，又消除我們某些受了反對派分子挑撥的布爾什維克的錯誤。請回憶一下馬克思的話：「一心循着自己的道路走，讓人家隨便怎樣去說吧！」<sup>〔六〕</sup>

寫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

載於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

【真理報】第一五二號

署名：約·斯大林

# 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員

(答弗魯姆金)

(關於弗魯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來信)

弗魯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來信是值得注意的。

我們就來逐點分析一下。

一、首先，弗魯姆金對蘇聯國際環境的估計是不正確的。黨內有一種公認的見解，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蘇聯對各國工人階級影響的擴大，也就是說，日益強大的蘇聯對資本主義所形成的危險是蘇聯和包圍蘇聯的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矛盾增長的原因，是各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蘇聯的原因。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也正是這樣理解問題的，在這次代表大會就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所通過的決議中說：『包圍蘇聯的各資產階級國家和因勝利發展而破壞着世界資本主義基礎的蘇聯之間的矛盾尖銳化了。蘇聯社會主義成分的增長，資產階級希望無產階級專政蛻化這一幻想的破滅，以及蘇聯在國際上的革命影響的加強，是這種尖銳化的最主要的因素。』(三三)



大家知道，黨的這種觀點不是隨便地、偶然地確定的，而是在和反對派進行激烈鬥爭中確定的；反對派曾經公開斷言，帝國主義進攻蘇聯是因為蘇聯削弱了，而蘇聯的削弱是因為蘇聯正在蛻化。

但是弗魯姆金根本不同意黨的這種觀點。相反地，弗魯姆金硬說：「資本主義世界進攻蘇聯的基本的和決定的因素，是我國力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削弱。」

一種是弗魯姆金的估計，一種是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估計，這兩種相反的估計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二、弗魯姆金對蘇聯內部狀況的估計更不正確。讀了弗魯姆金的信就會以為蘇維埃政權已經到了末日，國家已經瀕於絕境，蘇聯的滅亡即使不是幾天的事，也只是幾個月的事了。這裏只少說了一句：『布穀鳥已經叫過了。』

我們已經從反對派分子嘴裏聽慣了知識分子式的關於蘇聯『滅亡』的哀鳴。但是弗魯姆金學反對派的樣子是相稱的嗎？

當然，低估我們困難的意義是不對的。但是，誇大它們的意義，驚惶不安，張皇失措，那就更不對了。毫無疑問，富農是痛恨蘇維埃政權的；如果要求富農對蘇維埃政權採取友好態度，那就奇怪了。毫無疑問，富農在一部分貧農和中農中間是有影響的。但是，根據這一點就做出結論，說大多數

貧農和中農有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情緒，說『這種情緒已經開始滲入工人中心』，那就是失掉理智，張皇失措。難怪常言道：『疑心生暗鬼。』

如果我們現在遇到的不是目前這樣的困難，而是更加嚴重的困難，比如說，是那種使各式各樣的動搖都有廣闊的『活動場所』的戰爭，那末可以設想弗魯姆金將會怎樣。

三、弗魯姆金說：『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對農村採取的新的政治方針加劇了我國經濟狀況的惡化。』這是完全不正確的。這裏大概指的是今年年初黨所採取的改進糧食收購工作的措施。弗魯姆金認為這些措施是使我們的狀況『惡化』的有害措施。

這樣說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是不正確的，因為全會決定：

(甲)『糧食收購方面的困難是和整個國內外形勢要求無產階級國家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所形成的困難有關的，是和計劃經濟領導上的錯誤有關的』；

(乙)『市場關係（一方面是農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工業品的供應）不協調情況的加劇，是由於農村收入的增加，特別是由於農村富裕階層和富農階層收入的增加』（而不是由於黨的措施。——斯大林註）；

(丙)『困難的加深和加重，是由於農村富農和投機分子竭力利用這些困難，抬高糧價，破壞蘇維埃價格政策』（而不是由於黨的措施。——斯大林註）。

這樣說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是不正確的，因為全會在關於糧食收購

工作的決議中說：「部分地具有非常性質的上述黨的措施在加強糧食收購工作方面保證了極大的勝利。」<sup>(1)</sup>

這樣說來，弗魯姆金是正確的，而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是不正確的！

歸根到底，在這個問題上究竟誰是正確的呢？是弗魯姆金還是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呢？

我們來看事實吧。

今年一月初我們的情況怎樣呢？和去年比較，我們缺糧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

當時收購工作是怎樣進行的呢？是自流的，黨沒有採取任何非常措施，沒有積極干預收購工作。聽其自然和不施任何壓力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缺糧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

如果黨聽從弗魯姆金的勸告，當時不去干預這件事，如果不在春季以前，不在春季播種以前消滅這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的缺額，那末我們現在會有什麼結果呢？我們現在就會有這樣的結果：工人挨餓，工業中心鬧飢荒，我們的建設中斷，紅軍挨餓。

黨能不能不採取非常措施來干預這件事情呢？顯然，黨不能不這樣做。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不及時干預糧食收購工作，我國整個國民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經濟現在就會發生極嚴重的危機。

結論只有一個：弗魯姆金反對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決議並要求修改決議，是完全不正確的。

四、弗魯姆金說：「應當回到黨的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去。」這是完全不正確的。我們用不着回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去，因為黨完全全站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的立場上。但是，弗魯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不就是要把全部走過的道路一筆勾銷，要後退而不要前進嗎？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在「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中說，爲了農村中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更堅決地向富農進攻」〔二〕。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沒有提到這一點，根據當時的條件也不可能提到這一點。既然如此，弗魯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能有什麼意思呢？只能有一個意思：拋棄「更堅決地向富農進攻」的政策。

由此可見，弗魯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就是要拋棄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在「關於農村工作」的決議中說：「在目前時期，把個體小農經濟聯合並改造爲大規模集體經濟這一任務應該作爲黨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三〕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沒有提到這一點，根據當時的條件也不可能提到這一點。只是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才能提到這一點，因爲當時除了發展中小個體農民經濟這一舊的、對我們絕對必要的任務以外，在我們面前出現了

發展集體農莊這種大規模商品經濟的新的實際任務。

既然如此，弗魯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能有什麼意思呢？只能有一個意思：拋棄發展集體農莊這一新的實際任務。其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弗魯姆金拿『最大限度地幫助那些加入集體經濟的貧農』這一玄妙任務來代替發展集體經濟的實際任務。

由此可見，弗魯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就是要拋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在『關於制定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的決議中說：『目前必須用更大的力量支持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生產合作形式（農業公社、集體農莊、勞動組合、生產協作社、合作工廠等等）和那些應該提到更高階段的國營農場。』<sup>①</sup>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沒有提到這一點，根據當時的條件也不可能提到這一點。只是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時候才能提到這一點，因爲當時除了發展中小個體農民經濟和發展集體農莊這兩個任務以外，在我們面前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實際任務，即發展國營農場這種出產商品最多的單位的任務。

既然如此，弗魯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能有什麼意思呢？只能有一個意思：拋棄『把國營農場提到更高階段』的政策。其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弗魯姆金拿『不要用突擊的和超突擊的方式擴展國營農場』的消極任務來代替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發展國營農場的積極任務，雖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然弗魯姆金不會不知道，在這裏黨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什麼「超突擊」的任務，因為我們不過剛剛開始認真地對待建立新的國營農場的問題。

這又一次證明，弗魯姆金要求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就是要拋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既然如此，弗魯姆金所謂中央委員會「離開了」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的說法還有什麼價值呢？弗魯姆金的這封信完全是企圖把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一系列最重要問題的決議都化爲烏有，而這個企圖又掩飾得很不高明，——這樣說不是更正確嗎？

弗魯姆金硬說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關於糧食收購工作的決議是「不徹底的、模稜兩可的」，難道不就是這個緣故嗎？全會的決議是正確的，而由於弗魯姆金的立場的某種「不徹底性」，在他的眼中真的成了「模稜兩可的」東西，——這樣說不是更正確嗎？

弗魯姆金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在自己面前只看到一個任務，即提高個體農民經濟的任務；他認爲我們對農業的態度基本上就限於這一點。

他的錯誤就在於：他不了解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向我們提出的新東西，他不了解現在不能僅僅限於提高個體農民經濟的任務，而必須拿兩個新的實際任務即發展國營農場的任務和發展集體農莊的任務去補充這一任務。

弗魯姆金不了解，如果不把前一個任務和後兩個任務結合起來，那末無論在供給國家商品糧食方面，或者在以社會主義原則組織整個國民經濟方面，我們都不能找到出路。

這是不是說我們現在就把重心移到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上去呢？不，不是這個意思。現階段的重心仍然是進一步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經濟。但是，這是說僅僅這一個任務現在已經不夠了。這是說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在實踐中拿發展集體農莊和發展國營農場兩個新任務去補充這個任務的時候了。

五、弗魯姆金認為「宣佈富農爲非法引起了對全體農民的不法行爲」，這種意見是完全不正確的。第一、說富農已經被宣佈爲「非法」是不對的。

第二、如果弗魯姆金的這些話有什麼意思，那末這只能是弗魯姆金要求黨恢復富農的「公民權」，恢復富農的政治權利（如參加蘇維埃選舉的權利等等）。

弗魯姆金是不是認爲取消對富農的一些限制是有利於黨和蘇維埃政權的呢？怎麼能使弗魯姆金的這種「思潮」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更堅決地向富農進攻」的決議一致起來呢？

弗魯姆金是不是認爲放鬆對富農的鬥爭會鞏固我們和中農的聯盟呢？弗魯姆金是不是會想到恢復富農的權利只能便於富農挑撥中農離開我們呢？

既然如此，弗魯姆金關於和中農聯盟的這種說法還有什麼價值呢？

否認我們某些農村工作人員有違法行爲，這當然是不對的。由於我們某些工作人員不善於同富農作鬥爭，原定對富農的打擊有時落到了中農甚至貧農頭上，否認這個事實是更加不對的。毫無疑問，必須對這些歪曲黨的路綫的行爲展開最堅決的鬥爭。但是，怎麼能根據這一點就做出結論說，必

須放鬆對富農的鬥爭，取消對富農的政治權利的限制等等呢？

六、弗魯姆金斷定說，不能像我們某些地方工作人員有時候做的那樣，用剝奪富農的辦法去同富農作鬥爭，這樣說是對的。但是，如果他以為他這樣就是說出了什麼新東西，那就錯了。如果像弗魯姆金那樣責備莫洛托夫同志或庫比雅克同志有這種歪曲行爲，並且斷定說黨沒有同這類歪曲行爲作鬥爭，那是極不公道的，而且是一種令人難以容忍的粗暴行爲。

七、弗魯姆金斷定說，應當開放集市，開放糧食市場，這樣說是對的。但是，如果他以為他這樣就是說出了什麼新東西，那就錯了。第一、黨從來沒有主張封閉集市。第二、弗魯姆金不會不知道，因為某些地區封閉了集市，中央曾經立即指示地方組織立刻開放集市並制止這類歪曲行爲。大家知道，中央的這個決定早在五月底（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弗魯姆金的信出現之前兩個星期就發到了各地。弗魯姆金不會不知道這件事。既然如此，何必「多此一舉」呢？

八、弗魯姆金斷定說，應當提高糧價並對釀造私酒加緊鬥爭，這樣說是對的。但是，如果以為弗魯姆金這樣就是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那又奇怪了。同釀造私酒作鬥爭，我們從今年一月起就已經開始了。鬥爭應當加強，而且一定會加強，雖然弗魯姆金不會不知道，農村對這一點會表示不滿。至於提高糧價，那末弗魯姆金不會不知道，早在今年二月，也就是在弗魯姆金的信出現之前四個月，我們政治局就預定在新的收購年度開始時提高糧價。再說一次：在提高價格的問題上何必「多此一舉」呢？

九、初看起來，會以為弗魯姆金寫這封信的目的在於維護和中農聯盟的事業。但這不過是幌子罷



了。實際上，弗魯姆金的信是一封要求寬容富農、取消對富農的限制的申請書。誰想鞏固和中農聯盟的事業，誰就不能要求放鬆對富農的鬥爭。

保證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是我們黨的極重要的任務。但是，要保證這樣的聯盟，就必須對富農進行堅決的鬥爭，必須使貧農成爲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最後，我們還必須有決心並善於和中農成立長期協議，因爲這樣的協議能鞏固和中農的聯盟，能鞏固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的陣地。

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不應當是放鬆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鬥爭，而應當是『無產階級和中農成立協議』，『和中農長期合作』，『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和中農成立聯盟和協議』（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關於對中農的態度』的決議）<sup>(11)</sup>。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

第一次刊印

## 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自我批評口號不能看做是一種暫時的、瞬息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以革命發展的精神教育黨的幹部和整個工人階級的特殊方法，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馬克思早就說過，自我批評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方法<sup>(三)</sup>。至於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它在布爾什維主義在我國開始出現的時候，在布爾什維主義一開始成爲工人運動中一個特別的革命派別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大家知道，列寧早在一九〇四年春天，當布爾什維主義還不是一個獨立政黨，而是和孟什維克在一個社會民主黨內工作的時候，就已經號召全黨「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列寧當時在他的「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這樣寫道：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的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着自己的目的，當然會竭力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們黨內種種缺點的書中的個別地方。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經戰鬥，決不會爲這些小小的針刺所驚擾，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繼續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地揭露自己的缺點<sup>(四)</sup>，這些缺點是一定會而且必然會被工人運動的發展克服的。讓敵人先生們試把他們「黨」內真實情況的圖畫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哪怕只

是稍微有些像我們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記錄所提供的圖畫也好！」（『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一九〇頁）

因此，有些同志是完全不對的，他們認爲自我批評是一種瞬息即逝的現象，是一種時髦的東西，它很快就要過時，正像一切時髦的東西通常都要過時一樣。實際上，自我批評是布爾什維主義武庫中不可缺少和經常使用的一種武器，是同布爾什維主義的本性及其革命精神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一種武器。

有時候人們說，自我批評對於還沒有執政的黨是好東西，因爲它『無物可失』，但是對於已經執政的，周圍有許多敵對勢力的黨却是危險而有害的，因爲敵人會利用它的被揭露出來的弱點來反對它。

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正因爲布爾什維主義執掌了政權，正因爲布爾什維克可能因我們建設的成就而驕傲自大，正因爲布爾什維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點而有利於敵人，所以在現在，在取得了政權以後，尤其需要自我批評。

自我批評的目的在於揭露並消滅我們的錯誤和弱點，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自我批評只能有利於布爾什維主義同工人階級的敵人作鬥爭，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列寧估計到布爾什維克取

得政權後的情況的這些特點，他在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五月間所著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寫道：

「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持的態度，是檢驗這個黨是否嚴肅、是否真正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所負的義務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嚴肅的黨的標誌，這就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對階級以至對羣衆的教育和訓練。」（『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九頁）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三月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說得萬分正確，他說：

「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在革命過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沒有做好。過去一切滅亡了的革命政黨所以滅亡，就是因爲它們驕傲自大，不善於看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爲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能够學會克服這些弱點。」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八頁）

結論只有一個：沒有自我批評，就沒有對黨、對階級、對羣衆的正確教育；而沒有對黨、對階級、對羣衆的正確教育，就沒有布爾什維主義。

⊖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爲什麼自我批評口號正是在現在，正是在目前的歷史時刻，正是在一九二八年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呢？

因爲現在國內和國外階級關係的尖銳化暴露得比一兩年前更明顯了。

因爲現在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敵人利用我們的弱點和錯誤而對我國工人階級進行的破壞活動暴露得比一兩年前更明顯了。

因爲沙赫特事件和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對付收購工作的手腕」的教訓，以及我們計劃方面的錯誤，對於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不留痕跡地過去。

如果我們想要鞏固革命並全副武裝地迎接敵人，那就必須儘快克服沙赫特事件和糧食收購困難所揭露出來的我們的錯誤和弱點。

如果我們不想被各種「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弄得措手不及而使工人階級的敵人拍手稱快，那就必須儘快揭露我們的那些還沒有被揭露但無疑是存在的弱點和錯誤。

拖延遲緩在這裏就等於幫助我們的敵人，加深我們的弱點和錯誤。但是，如果不開展自我批評，不加強自我批評，不吸引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羣衆來揭發並消滅我們的弱點和錯誤，要做到這一切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是完全正確的，它在關於沙赫特事件的決議中說：

「保證順利地實現上述各種措施的最主要的條件，應當是切實貫徹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自我批評的口號。」<sup>①</sup>（四）

但是要開展自我批評，首先必須克服擺在黨面前的許多障礙。這些障礙就是羣衆文化的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力量的不足、我們的因循守舊、我們「共產黨員的驕誇」等等。然而我們機關裏的官僚主義是最大的障礙之一，甚至是最大的障礙。這裏指的是我們黨組織、國家組織、工會組織、合作社組織以及其他各種組織裏有官僚主義分子。這裏指的是靠我們的弱點和錯誤過日子的官僚主義分子，他們害怕羣衆的批評和羣衆的監督像害怕火一樣，他們妨礙我們開展自我批評，妨礙我們克服我們的弱點和錯誤。決不能把我們組織裏的官僚主義看做僅僅是拖拉作風和文牘主義。官僚主義是資產階級對我們組織的影響的表現。列寧說得對：

「……我們必須懂得同官僚主義作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這種鬥爭也像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作鬥爭的任務一樣複雜。官僚主義在我們國家機構中已經成爲這樣一種膿瘡，以致我們的黨綱也提到它了，這是因爲它和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及其散漫性是有聯系的。」<sup>②</sup>（『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六七頁）

如果我們真正想開展自我批評並治愈我們建設事業中的膿瘡，那就應當更堅決地進行反對我們

① 清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組織裏的官僚主義的鬥爭。

我們應當更堅決地發動千百萬工農羣衆進行自下而上的批評，進行自下而上的監督，作爲消除官僚主義的主要藥劑。

列寧說得對：

「如果我們要同官僚主義作鬥爭，那我們就應當吸收下層羣衆來參加」……因爲「除了吸收工人和農民以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可以克服官僚主義呢？」①（『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九八頁）

但是，爲了「吸收」千百萬羣衆，就必須在工人階級的一切羣衆性組織裏，首先在黨內發揚無產階級的民主。缺少這個條件，自我批評就等於零，就等於空談，就等於廢話。

我們需要的不是任何自我批評。我們需要的是能夠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發揚他們的戰鬥精神、鞏固他們的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力量並幫助他們成爲國家的真正主人的自我批評。

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就不需要勞動紀律，就可以丟開工作，光來胡扯亂談。這不是自我批評，而是對工人階級的嘲弄。我們需要自我批評不是爲了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了鞏固勞動紀律，爲了使勞動紀律成爲能夠抵制小資產階級鬆懈現象的自覺的紀律。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另外一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就不再需要領導，就可以離開船舵，一切「聽其自然」。這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恥辱。我們需要自我批評不是爲了削弱領導，而是爲了加強領導，爲了使它從紙上的和威信不高的領導變成有生命力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領導。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自我批評」，它會破壞黨性，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威信，削弱我們的建設工作，腐蝕經濟工作幹部，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產生關於蜕化的空談。托洛茨基反對派昨天叫我們進行的正是這種「自我批評」。不用說，黨和這種「自我批評」是毫不相干的。不用說，黨將用一切力量，用一切辦法來反對這種「自我批評」。

必須把這種與我們背道而馳的、具有破壞性的反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和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嚴格地區別開來。我們的自我批評的目的是增強黨性，鞏固蘇維埃政權，改進我們的建設工作，加強我們的經濟工作幹部，武裝工人階級。

加強自我批評的運動我們才開始了幾個月。我們還沒有給這個運動做初步總結所必需的材料。但是現在已經可以說，這個運動已經開始產生良好的結果。

不能否認，自我批評的浪潮已經開始增長並擴大，日益擴展到工人階級的更廣大的階層並把他們捲入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只要拿生產會議和臨時監察委員會已經活躍起來的事實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固然，還有人企圖把生產會議和臨時監察委員會的有根據的和審查過的指示束之高閣，我們必



須對這種企圖進行最堅決的鬥爭，因為這種企圖的目的是要打消工人對自我批評的熱情。但是，幾乎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類的官僚主義企圖，將被日益增長的自我批評浪潮沖得乾乾淨淨。

也不能否認，由於自我批評，我們的經濟工作幹部已經開始振作起來，更加警惕起來，開始更嚴肅地對待領導經濟工作的問題，而我們黨、蘇維埃、工會以及其他一切組織的幹部對羣衆的要求也更加敏感，更加關心了。

固然，不能認爲在工人階級的羣衆性組織裏已經充分實行黨內民主和一般的工人民主。但是，沒有理由懷疑，這項工作將隨着運動的繼續展開而向前推進。

同樣不能否認，由於自我批評，我們的報刊更加活躍和有生氣了，而我們的報刊工作者的隊伍，如工農通訊員組織，已經開始成爲一支極重要的政治力量。

固然，我們的報刊有時還限於表面，還沒有學會從零碎的批評意見轉到較深刻的批評，從深刻的批評進而概括批評的效果，進而報道我們的建設方面因批評而獲得的成績。但是，幾乎用不着懷疑，這項工作將在運動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向前推進。

然而，除了這些優點以外，還必須指出我們運動中的一些缺點。這裏指的是現在在運動初期就已經發生的歪曲自我批評口號的現象，這種現象如果不立刻予以反對，就會造成把自我批評庸俗化的危險。

(一) 首先必須指出：有些報刊表現出一種趨向，把運動從切實批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缺點轉

到以廣告式的叫喊來反對個人生活中的極端現象。這也許令人難以相信，但可惜這是事實。

例如拿伊爾庫茨克州委員會和州執行委員會機關報「勞動權力報」（第一二八號）來說。你們會看到報上整版登滿了廣告式的「口號」：「性生活的放縱是資產階級的習氣」，「喝了一杯又一杯」，「有了房子又要牛」，「雙人牀上的強盜」，「沒有打響的槍」，如此等等。試問，這些只有「交易所報」才做得出的「批評的」叫喊和旨在改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很可能，這些廣告式的短文的作者是共產黨員。他可能對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敵人」深惡痛絕。但是，他在這裏離開了正確的道路，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說的不是我們階級的話，——這是毫無疑問的。

（二）其次必須指出：甚至那些一般說來還不是不善於正確地進行批評的報刊，有時也犯了為批評而批評的錯誤，把批評變成一種聳動視聽的競技。例如拿「青年團真理報」來說。大家都知道「青年團真理報」在開展自我批評方面的功績。但是，請你們看看該報最近幾號對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領導者的「批評」，看看那一連串以此為題材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諷刺畫。試問，誰需要這種「批評」？它除了糟蹋自我批評口號以外，還能給我們什麼呢？當然，如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着想，而不是為散佈廉價的聳人聽聞的消息來博得庸人一笑，那末要這種「批評」有什麼用處呢？當然，進行自我批評需要各種武器，其中也包括「輕騎隊」。但是，難道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說，輕騎隊應當成為輕舉妄動的騎兵隊嗎？

(三) 最後必須指出：我們許多組織有一種明顯的傾向，把自我批評變成對我們經濟工作人員的攻擊，使他們在工人階級面前威信掃地。烏克蘭和俄羅斯中部的某些地方組織向我們優秀的經濟工作人員發動直接攻擊，這是事實；而他們的全部罪狀是他們沒有保證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錯誤。否則應如何理解這些地方組織關於撤銷這些經濟工作人員的職務的決定，這些沒有絲毫約束力但分明是想破壞他們的威信的決定呢？否則應如何理解只管自己批評而不讓經濟工作人員答覆批評呢？從什麼時候起我們這裏開始把『舍米雅卡審判』<sup>①</sup>冒充為自我批評了呢？

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批評百分之百的正確。如果批評是來自下面的，那末即使這種批評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是正確的；我們也不應當忽視。這都是對的。但是，難道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要求經濟工作人員保證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錯誤嗎？難道世界上有保證自己百分之百地不犯錯誤的人嗎？培養經濟工作幹部需要很多年，我們應當以最愛護最關心的態度對待經濟工作人員，這難道很難了解嗎？我們需要自我批評不是為了攻擊經濟工作幹部，而是為了加強和提高他們，這難道很難了解嗎？

請批評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但是不要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不要把它變成玩弄『雙人牀上的強盜』、『沒有打響的槍』等等題目的廣告式的把戲的工具。

請批評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但是不要糟蹋自我批評口號，不要把它變成製造廉價的聳人聽聞的消息的廚房。

請批評我們建設中的缺點吧，但是不要歪曲自我批評口號，不要把它變成攻擊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員的工具。

而主要的是：不要用上面的『批評的』叫喊代替下面的羣衆性的批評，讓工人階級羣衆投入這個運動，並在糾正我們的缺點方面，在改進我們的建設方面表現出他們的創造主動性。

載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真理報』第一四六號

署名：約·斯大林

① 「舍米雅卡審判」是俄國古代諷刺小說，描寫審判官舍米雅卡誤以爲被告會給他賄賂，做出偏袒被告的荒謬判決。

後來「舍米雅卡審判」成了不公正審判的通稱。——譯者註



聯共(布)中央全會

卷一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



## 論共產國際綱領

(一九二八年七月五日的演說)

同志們，首先應當討論一下共產國際綱領草案(三)的篇幅問題。

有人說綱領草案太長太累贅，要求把它縮短一半或三分之二，要求在綱領中提出一些一般性的公式，並以此爲限，就把這些公式叫做綱領。

我認爲這些要求是沒有根據的。要求把綱領縮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那些人沒有了解擺在綱領草案起草人面前的任務。問題在於共產國際綱領不能只是某一個國家的黨的綱領，或者，比如說，只是幾個「文明」國家的綱領。共產國際綱領必須包括世界各國共產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既要包括白種人又要包括黑種人。這就是綱領草案基本的和最突出的特點。但是把綱領縮短一半或三分之一，怎麼能包括共產國際東方和西方所有支部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工作路線呢？請同志們試試解決這個無法解決的任務吧。因此，我認爲把綱領縮短一半或三分之二就等於把綱領變爲一張對共產國際各支部毫無用處的空洞的抽象公式表。

在綱領起草人面前擺着雙重的任務：一方面要包括世界各國共產黨主要的和基本的東西，另一



方面又要做到使綱領的各項條文不致成爲空洞的公式，而能給各個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各個不同國家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提供實際的指導原則。你們一定會同意，在一個簡短的綱領草案中要解決這個雙重的任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

最可笑的是那些建議把綱領縮短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同志竟又提出了這樣一些建議，這些建議有把現在的綱領草案加長一倍甚至兩倍的趨向。的確，如果在綱領草案中對工會、合作社、文化、歐洲的少數民族等等問題都加以詳細的論述，那末綱領就決不可能縮短，這難道還不明顯嗎？而現在的綱領草案就不得不加長一倍甚至兩倍了。

關於另外一些同志也應當這樣說，他們或者要求綱領成爲各團共產黨的具體指示，或者要求綱領解釋所有一切，以至解釋它的各項條文。第一、不能說綱領只應當是指示，或者主要是指示。這是不對的。決不能對綱領提出這樣的要求，更不用說，滿足這種要求就會把綱領的篇幅增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第二、綱領不可能解釋所有一切，以至解釋它的各項宣言性的或理論性的條文。起這種作用的是對綱領的說明。決不能把綱領和說明混爲一談。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綱領的結構和綱領草案中各章的排列次序問題。

有些同志要求把關於運動的最終目的即關於共產主義的一章移到綱領的最後去。我認爲這種要求也是沒有根據的。在綱領草案中，關於資本主義危機的一章和關於過渡時期的一章之間列有關於共產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一章。這樣排列是否正確呢？我認爲完全正確。如果不首先說

明綱領所提出的要過渡到那裏去的那種經濟制度，即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就無從談到過渡時期。人們在談論過渡時期，在談論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另一種經濟制度。但是向哪裏過渡，究竟過渡到哪一種制度去，這就是在論述過渡時期以前首先應該說明的問題。綱領必須使人從不知道到知道，從知道得少到知道得多。談了資本主義危機接着就談過渡時期，而不首先說明應當過渡到哪一種制度去，這就會把讀者弄糊塗，並且違反了教育學的起碼要求，這種要求同時也是制定綱領的要求。綱領應當幫助讀者從知道得少到知道得多，而不是給讀者添麻煩。

另外一些同志認為，不應當把關於社會民主黨的一段列入綱領草案的論述無產階級革命第一階段和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第二章。他們認為他們這樣提是提的綱領的結構問題。同志們，這是不對的。事實上，這裏的問題是政治問題。把關於社會民主黨的一段從第二章中刪去，這就是在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原因這個基本問題上犯了政治上的錯誤。這裏的問題不在於綱領的結構，而在於對局部穩定時期政治形勢的估計，在於對作為這次穩定因素之一的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作用的估計。這些同志不會不知道，我們在關於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一章中不能沒有關於社會民主黨的一段，因為不把作為穩定最主要因素之一的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加以說明，就無法解釋這種穩定本身。否則，也就必須從這一章中刪去關於法西斯主義的一段，而把這一段和關於社會民主黨的一段都放到關於黨的一章中去。但是，把關於法西斯主義的一段和關於社會民主黨的一段都從論述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一章中刪去，就等於解除自己的武裝，取消對資本主義穩定加以解釋的任何可能性。顯然，我們不能

這樣做。

關於新經濟政策和戰時共產主義的問題。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策，其目的在於利用市場，通過市場，而不是以直接的產品交換，不要市場，在市場以外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並建立社會主義經濟。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其中最發達的國家，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不能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呢？我認爲不能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及其市場關係和對這種市場關係的利用，在這種或那種程度上對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都是絕對必要的。

我們有些同志否認這個原理。但是否認這個原理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認爲無產階級一取得政權，在我國城鄉之間、工業和小生產之間就立刻有了百分之百現成的分配和供應機構，這些機構提供了不要市場、不要商品流轉、不要貨幣經濟而立即建立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可能。只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就能了解這種想法是多麼荒謬。

第二、這就是認爲無產階級革命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就應當走上剝奪中小資產階級的遺路，肩負起替千百萬人工造成的新的失業者安排工作和保證生活資料的非常沉重的担子。只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就能了解無產階級專政採取這種政策是多麼不明智和愚蠢。新經濟政策的好處之一也就在於它使無產階級專政避免諸如此類的困難。

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新經濟政策是一切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必經的階段。

關於戰時共產主義能不能也這樣說呢？能不能說戰時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必經的階段呢？

不，不能這樣說。戰時共產主義是戰爭環境和武裝干涉迫使無產階級專政採取的一種政策，這種政策主要是採用經濟以外的、帶有某種軍事性的手段，不是通過市場，而是在市場以外來建立城鄉之間直接的產品交換，這種政策的目的是組織產品分配以保證對前綫革命軍隊和後方工人的供應。顯然，假如沒有戰爭環境和武裝干涉，也就不會有戰時共產主義。因此不能斷定說，戰時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在經濟上必經的發展階段。

如果以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工作是從戰時共產主義開始的，那就不對了。有些同志傾向於這種觀點。但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恰恰相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建設工作不是從戰時共產主義開始的，而是從宣佈所謂新經濟政策的原則開始的。大家都知道一九一八年初出版的列寧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sup>(一)</sup>一書，列寧在這本書中第一次論證了新經濟政策的原則。固然，這個政策曾經被武裝干涉暫時打斷，只是過了三年，在戰爭和武裝干涉消滅以後，才得以重新實行。但是，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必須重新實行還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宣佈了的新經濟政策的原則，這種情況明顯地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在革命後的第二天應當從哪裏開始自己的建設工作，應當把建設工作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當然，這只是從經濟方面來考慮的。

人們有時把戰時共產主義和國內戰爭混淆起來，把前者和後者混為一談。這當然是不正確的。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無疑是一種國內戰爭的形式。但是，如果說我國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就開始實行戰時共產主義，那就不對了。不採取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不放棄新經濟政策的原

則而進行國內戰爭是完全可以設想的，一九一八年初，在武裝干涉以前，我國的情況就是這樣。

有人說，無產階級革命將在孤立的情況下進行，因此，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避免武裝干涉，也就是說，不能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在蘇聯蘇維埃政權已經鞏固，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日益壯大，共產國際已經加强的情況下，已經不可能有而且不應富有孤立的無產階級革命了。決不能把世界資本主義日益尖銳化的危機，蘇聯的存在和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等因素撇開不談。（喊聲：『但是匈牙利的革命却是孤立的。』）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sup>(25)</sup>，而現在已經是一九二八年了。只要回顧下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革命<sup>(26)</sup>（當時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曾經準備直接援助德國革命），就會了解某些同志的論據完全是相對的和有條件的。（喊聲：『德國革命是孤立的，法國和德國之間彼此是隔絕的。』）你把地理上的距離和政治上的孤立混淆起來了。當然，地理上的距離是起作用的。但是終究不能把它和政治上的孤立混為一談。

拿干涉者本國的工人來說，你們是不是認為在發生干涉的時候，比如說在干涉德國革命的時候，他們會默不作聲，不打擊干涉者的後方呢？

拿蘇聯和蘇聯的無產階級來說，你們是不是認為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會對干涉者的胡作非為置之不理呢？

要損傷干涉者，完全不一定要和革命的國家有地理上的聯系。要做到這一點，只要在干涉者本國要害的地方打他們一下，使干涉者感覺到危險並認識到無產階級團結的實際力量就夠了。假定說，我

們在列寧格勒地區使資產階級的英國吃了虧，使它遭到了嚴重的損失。是否由此就應當得出結論說，英國必定要在列寧格勒報復我們呢？不，不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英國可以在任何地方報復我們，比如說，在巴士姆、敖德薩、巴庫或者海參崴。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幫助和支援某一國家（比如說歐洲某一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來反對帝國主義干涉者的形式也必須這樣說。

雖然不能認為武裝干涉因而也不能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是各國必然的現象，但是總可以而且必須認為這多少是或然的現象。因此，我不同意這些同志的論據，而同意他們的結論，也就是說在綱領草案中可以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在一定的國際環境下有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改為關於武裝干涉和戰時共產主義或多或少有實現的或然性的公式。

關於土地國有化的問題。我不同意有些同志的意見，他們建議修改關於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實行土地國有化的公式，並要求在這些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天就宣佈全部土地國有化。

我也不同意另外一些同志的意見，他們建議根本不提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實行全部土地國有化的問題。我認為最好像綱領草案那樣，說將來要實行全部土地國有化，另外再加上保障中小農民有土地使用權這樣一句話。

有些同志認為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實行全部土地國有化就容易，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恰恰相反，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實行全部土地國有化就愈困難，因為在那裏土地私有的傳統也就愈深，所以同這種傳統作鬥爭也就愈困難。

你們讀一讀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提綱(四)，你們就會了解這些同志的論斷是完全不正確的。在這個提綱中，列寧直截了當地警告說不要在這方面採取輕率和魯莽的措施。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裏，土地私有制已經存在了數百年，而對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國家就不能這樣說了，在這些國家中，土地私有制的原則在農民的頭腦中還不是根深蒂固的。在我們俄國，農民有一個時候甚至說土地不是任何人的，土地是上帝的。其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列寧早在一九〇六年，當他預計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到來的時候，就在我國提出了在保障中小農民有土地使用權的條件下實行全部土地國有化的口號，並且認爲農民一定會明白並同意這種措施。

難道不值得注意；也正是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經警告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的共產黨不要立即提出全部土地國有化的口號，因爲這些國家滲透了私有觀念的農民不能馬上領會這個口號。我們能不能不考慮到這種差別，不注意列寧的指示呢？顯然不能。

關於綱領草案的內容問題。原來有些同志認爲綱領草案就內容來說不完全是國際性的，因爲照他們說來，它帶有「過多的俄國的」性質。我在這裏沒有聽到類似的反對意見。但是在共產國際周圍某些人中原來是有這種反對意見的。

這種反對意見的根據何在呢？

也許是因爲綱領草案中有專門論述蘇聯的一章？但是這有什麼不好呢？難道我國革命按性質來說是一國的革命，僅僅是一國的革命，而主要不是國際的革命嗎？如果是這樣，那末爲什麼我們把我

國革命叫做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世界各國革命發展的槓桿、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呢？

我們這裏曾經有過這樣一些人，例如我們的反對派分子，他們認為蘇聯革命完全是或主要是一國的革命。他們曾經在這個問題上碰得頭破血流。奇怪的是，原來共產國際周圍也有人準備反對派分子的反動。

也許我國革命按類型來說是一國的革命，而且僅僅是一國的革命？但是，我國革命是蘇維埃革命，而無產階級國家的蘇維埃形式或多或少是其他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採取的形式。無怪乎列寧說，蘇聯革命在發展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蘇維埃的紀元。由此難道不應當得出結論說，我國革命不僅在它的性質上而且在革命類型上也主要是國際的革命，是給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基本輪廓的革命嗎？

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國際性質使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對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羣衆承擔了一定的義務。列寧說，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意義在於它盡一切可能使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發展並取得勝利，他說這句話就是從這一點出發的。但是由此應當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至少應當得出結論說，我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運動的根據地和工具。

同樣毫無疑問，不僅蘇聯革命對各國無產者負有義務並正在履行自己的義務，而且各國無產者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也負有一些相當重大的義務。這些義務就是：支援蘇聯無產階級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反對旨在扼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戰爭，鼓吹帝國主義軍隊在進攻蘇聯的時候直接轉到蘇



聯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由此難道不應當得出結論說，蘇聯革命和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是分不開的，蘇聯革命的勝利就是全世界革命的勝利嗎？

既然如此，難道還能把蘇聯革命說成僅僅是一國的、孤立的、和全世界革命運動沒有聯系的革命嗎？

反過來說，既然如此，如果不和蘇聯無產階級革命聯系起來，難道還能理解世界革命運動中的任何事件嗎？

如果論述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國際綱領對於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和任務、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對各國無產者的義務、各國無產者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義務等基本問題避而不談，那末這個綱領還有什麼價值呢？

正因為如此，我認爲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帶有「俄國性質」這種反對意見會給人一種印象，說得客氣一些……一種不好的、令人不愉快的印象。

現在來談談個別的意見。

有些同志建議把綱領草案第五十五頁上關於「跟着無產階級專政走的」農村勞動階層的一句話加以修改，我認爲這種意見是正確的。這句話顯然是一種誤解，也許是校對上的錯誤，應當加以修改。

但是，這些同志建議把列寧所下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定義都加進綱領草案中去，（笑聲）這就完全不對了。在第五十二頁上有如下一個基本上是從列寧那裏引來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

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在新條件下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對舊社會勢力及其傳統、對國外資本主義敵人、對國內剝削階級殘餘、對在還沒有消滅的商品生產基礎上產生的新資產階級的萌芽進行頑強的鬥爭，進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sup>(1)</sup>

綱領草案中還有其他一些關於專政的定義，這些定義是針對着無產階級專政在無產階級革命不同階段上的這些或那些任務而規定的。我想這已經很够了。（喊聲：『漏掉了列寧的一個定義。』）列寧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篇幅很多。如果把所有的都加進綱領草案中去，那末它的篇幅恐怕至少要增加兩倍。

有些同志對中立中農這一論點所提出的反對意見也是不正確的。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提綱中直截了當地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在奪取政權的前夕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初階段，共產黨至多只能指望中農中立。列寧直截了當地說，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之後，共產黨才能指望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顯然，我們在制定綱領草案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到列寧的這個指示，更不用說，這個指示完全符合我國革命的經驗。

有些同志對於民族問題的意見也是不正確的。這些同志斷言綱領草案沒有考慮到革命運動的民族因素，那是沒有根據的。殖民地問題基本上是民族問題。綱領草案中已經相當突出地說到了帝國

主義的壓迫、殖民地所受的壓迫、民族自決、民族和殖民地的分離權等等。

如果這些同志指的是中歐的少數民族，那末在綱領草案中是可以提到這一點的，但是我反對在綱領草案中對中歐的民族問題做專門的論述。

最後談談某些同志對於波蘭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第二種類型的國家的意見。這些同志認為把國家分成三種類型；分成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美國、德國、英國）、資本主義中等發達的國家（波蘭、二月革命前的俄國等等）和殖民地國家是不正確的。他們斷定說，波蘭應當列入第一種類型的國家，國家只能有兩種類型，即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除了那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在革命勝利後立刻就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以外，還有一些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有封建殘餘、有特殊的反封建類型的土地問題的國家（波蘭、羅馬尼亞等等），這些國家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在革命爆發的時候一定會起重大的作用，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後爲了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可能而且一定要經過某些過渡階段，比如說，經過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階段。

我們這裏也有過像托洛茨基那樣的人，他們在二月革命以前說，農民起不了重大的作用，當前的口號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你們知道，列寧曾經堅決和這個口號劃清界限，反對低估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的作用和比重。當時我們有些人認爲沙皇制度推翻以後，無產階級立刻就會取得統治地位。而實際情況怎樣呢？實際情況是：二月革命以後，舞台上立刻出現了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羣

衆，他們使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佔了優勢。本來微不足道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突然」變成了國家的統治力量。因為什麼呢？因為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羣衆最初是支持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

這也就說明了，爲什麼我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當迅速地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以後才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

幾乎沒有理由懷疑，波蘭和羅馬尼亞是屬於這樣的國家，它們在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將要相當迅速地經過某些過渡階段。

正因爲如此，我認爲這些同志否認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運動有三種類型是不對的。波蘭和羅馬尼亞是第二種類型。

同志們，我對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問題的意見就是如此。

至於綱領草案的文字或個別地方的措詞，那我不能斷定說綱領草案在這方面是盡善盡美的。應當認爲在這方面還必須加以改善，必須表達得更確切，也許在文字上還要更簡練等等。但這是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sup>〔三〕</sup>綱領起草委員會的事情。

## 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的演說)

同志們！在談到我們糧食戰綫上的困難這個具體問題之前，請允許我先談談在全會討論中出現的具有理論意義的幾個一般性的問題。

首先是關於我國工業發展的主要泉源，關於保證目前工業化速度的途徑這個一般性的問題。

奧新斯基以及後來索柯里尼柯夫都已經觸及這個問題，也許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個問題是頭等重要的問題。

我認爲我們有兩個滋養我國工業的主要泉源：第一個是工人階級，第二個是農民。

資本主義國家實現工業化，通常主要是靠掠奪其他國家，靠掠奪殖民地和戰敗國，或者靠借多少帶有奴役性的巨額外債。

你們知道，英國用了幾百年的時間從各個殖民地，從世界各洲搜刮資本，這樣就給本國工業提供了追加投資。這是英國一度成爲『世界工場』的原因之一。

你們也知道，德國能使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也就是靠普法戰爭後從法國取得的五十億法郎的賠款。

我們的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之一就在於它不能而且不應當掠奪殖民地，它根本不能而且不應當掠奪其他國家。所以，這條路對我們來說是行不通的。

我們的國家也沒有借而且不願意借奴役性的外債。因此，這條路對我們來說也是行不通的。

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辦法呢？只有一個辦法：靠內部積累來發展工業，使國家工業化。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我國工業、運輸業等通常都是靠外債來發展的。不論拿建立新工廠或者改建舊工廠來說，不論拿建築新鐵路或者建立大發電站來說，這樣的企業沒有一個不是依靠外債的。但是，這些外債都是奴役性的。

在蘇維埃制度下，我們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我們正在建築的長達一千四百俄里的土爾克斯坦鐵路需要好幾億盧布。我們正在建設的德涅泊水電站也需要好幾億。在這裏我們借過什麼奴役性的外債嗎？沒有，沒有借過。這一切都是靠我們內部的積累來進行的。

但是，這種積累的主要泉源何在呢？這就是我已經說過的兩個泉源：第一個是創造價值並把工業向前推進的工人階級，第二個是農民。

在這方面，我國農民的情況是這樣：農民不僅向國家繳納一般的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而且他們在購買工業品時還要因為價格較高而多付一些錢，這是第一；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多少要少得一些錢，這是第二。

這是爲了發展爲全國（包括農民在內）服務的工業而向農民徵收的一種額外稅。這是一種類似

『貢稅』的東西，是一種類似超額稅的東西；爲了保持並加快工業發展的現有速度，保證工業滿足全國的需要，繼續提高農村物質生活水平，然後完全取消這種額外稅，消除城鄉間的『剪刀差』，我們不得不暫時徵收這種稅。

不用說，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們抹殺這個事實，如果我們閉眼不看當前的情況，即我們的工業和我們的國家可惜暫時不能不向農民徵收這種額外稅，那我們就不成其爲布爾什維克了。

爲什麼我要說到這一點呢？因爲有些同志看來還不了解這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他們的論點是：農民購買商品付的錢多了（這是千真萬確的），農民出賣農產品得的錢少了（這也是確實的）。他們究竟要求什麼呢？他們要求調整糧價，要求立刻消除這種『剪刀差』，消除這種少得多付的現象。但是，比如說要在今年或明年就消除『剪刀差』，這意味着什麼呢？這意味着阻礙國家工業化，也阻礙農業的工業化，破壞我們還不鞏固的年輕工業，因而也就是打擊整個國民經濟。我們能不能這樣做呢？顯然不能。應不應當消除城鄉間的『剪刀差』，消除所有這些少得多付的現象呢？是的，無疑是應當消除的。我們能不能立刻就消除這些現象，而又不致削弱我國工業，因而也不致削弱我們的國民經濟呢？不，不能。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政策應當是什麼呢？我們的政策應當是逐漸縮小這種『剪刀差』，使它一年一年地接近起來，不斷降低工業品價格，提高農業技術，這樣就一定會使糧食生產的成本降低，從

而在幾年以後完全取消對農民的這種額外稅。

農民能不能忍受這種負擔呢？當然能，因為：第一、這種負擔將一年一年地減輕，第二、這種額外稅不是在農民羣衆註定要遭受貧困和剝削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下徵收的，而是在蘇維埃制度的條件下徵收的，在蘇維埃制度下，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剝削農民的，而且這種額外稅是在農民物質生活狀況不斷改善的條件下繳納的。

關於我國目前工業化發展的主要泉源問題就是如此。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和中農結合的問題，關於這一結合的目的和方法的問題。

在某些同志看來，城鄉的結合、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結合只限於紡織品方面，只限於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方面。這對不對呢？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當然，在紡織品方面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在新的情況下就是從這方面開始和農民建立結合的。但是，根據這一點就說，在紡織品方面的結合就是問題的全部，在滿足農民個人需要方面的結合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經濟聯盟的全部或主要基礎，這就是犯了極嚴重的錯誤。其實，城鄉的結合，不僅表現在滿足農民的個人需要方面，不僅表現在紡織品方面，而且表現在滿足農民這個農產品生產者的經濟需要方面。

我們不僅供給農民花布，我們還供給他們各種機器、種子、鐵犁、肥料等等，這些東西在提高農民經濟和對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具有極大的意義。

因此，結合的基礎不僅是紡織品，而且是金屬製品。否則，和農民的結合是不鞏固的。



紡織品方面的結合和金屬製品方面的結合有什麼區別呢？區別首先在於：紡織品方面的結合主要關係到農民的個人需要，沒有觸及或較少觸及農民經濟的生產方面；而金屬製品方面的結合則主要關係到農民經濟的生產方面，能改善農民經濟，使它機械化，使它贏利更多，並為分散的小農經濟聯合成公共大經濟打下基礎。

如果以為結合的目的是要保存階級，比如說保存農民階級，那就錯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結合的目的完全不在這裏。結合的目的是要使農民和我國全部發展事業的領導者——工人階級接近，鞏固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力量的工農聯盟，以集體主義精神逐漸改造農民，改造他們的心理，改造他們的生產，從而為消滅階級準備條件。

結合的目的不是要保存階級，而是要消滅階級。紡織品方面的結合很少觸及農民經濟的生產方面，所以一般說來，它不可能以集體主義精神改造農民和消滅階級；而金屬製品方面的結合則恰恰相反，它首先關係到農民經濟的生產方面，關係到農民經濟的機械化和集體化，正因為如此，它一定能逐漸改造農民，逐漸消滅階級，其中包括農民階級。

一般說來，怎樣才能改造農民，改造他們的心理，改造他們的生產，使之接近工人階級的心理並適應社會主義的生產原則呢？為此需要做些什麼呢？

為此首先需要在農民羣衆中進行極廣泛的集體主義的宣傳。

第二、需要發展合作社運動，需要由我們的供銷合作社日益廣泛地掌握千百萬農戶。毫無疑問，

不廣泛地發展我們的合作社，農民對集體農莊運動就不會有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那種轉變，因為在我們的情況下，發展供銷合作社就是為農民過渡到集體制做準備。

但是，所有這些對改造農民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以社會主義精神來改造農民的主要力量是新的農業技術、農業機械化、農民集證勞動和國家電氣化。

有人在這裏引證列寧的話，引證列寧著作中關於和農民經濟結合的一段著名的話。但是片斷地援引列寧的話而不願意完整地援引他的話，這就是曲解列寧。列寧完全了解，在紡織品方面和農民結合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並不以此為限，因為他還堅決主張在金屬製品方面和農民結合，在供給農民機器方面，在實現國家電氣化方面，也就是說，在有利於以集體主義精神改造農民經濟的一切方面和農民結合。

例如，不妨聽一聽列寧的下面一段話：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只有物質基礎，只有技術，只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只有大規模地實行電氣化，才能解決這個和小農有關的問題，才能使他們的整個心理健全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農。』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頁）

問題很清楚：如果紡織品方面的結合不以金屬製品方面的結合來補充，那末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就不能鞏固和持久，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結合就不能鞏固和持久，這種結合就不能達到逐漸改造

農民，使農民接近工人階級，使農民走上集體制軌道的目的。

這就是列寧同志對結合的看法。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新經濟政策和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問題。

首先必須肯定，我們黨提出新經濟政策的原則不是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後，像某些同志有時斷定的那樣，而是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前，還在一九一八年初，當我們第一次獲得可能開始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時候。我可以引證一九一八年初出版的伊里奇的著名小冊子『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這本小冊子闡明了新經濟政策的原則。黨在武裝干涉結束以後施行這個政策時把它叫做新經濟政策，是因為這個政策曾被武裝干涉打斷，只是在武裝干涉結束以後，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後，我們才有了可能來實行它；而新經濟政策和戰時共產主義比較起來確實是一種新的經濟政策。爲了證明這一點，我認爲必須引證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大家知道的決議，那裏清清楚楚地說，新經濟政策的原則早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前就闡明了。在『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初步總結』這個決議中說：

『所謂新經濟政策，它的基本原則早在一九一八年春季第一個喘息時機<sup>○</sup>就已經確切地規定了，它是以對蘇維埃俄國經濟力量的精確估計爲基礎的。這一政策曾被俄國地主、資產階級和歐洲帝國主義等反革命勢力對工農國家的聯合進攻打斷，只是到一九二一年初，在軍事上消

○ 着重就是我加的。——斯大林

滅了反革命企圖以後，才有實現的可能。」（見『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彙編』第十六頁（四））

因此，你們可以看出，某些同志硬說，只是在戰時共產主義以後，黨才意識到必須在市場和貨幣經濟存在的條件下，即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多麼錯誤。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

首先得出的結論是：不能認為新經濟政策僅僅是退却。

其次得出的結論是：新經濟政策預計到社會主義要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實行勝利的和有步驟的進攻。

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反對派認為，既然施行了新經濟政策，那我們就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不斷地「擴大」新經濟政策，放棄陣地，像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初期那樣一步一步退却。托洛茨基的下面這個論斷也是以這種對新經濟政策的錯誤理解為基礎的。他斷定說，黨在農村中容許租佃土地和僱傭勞動就是「擴大了」新經濟政策，離開了列寧的立場。不妨聽一聽托洛茨基的話：

「什麼是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最近措施——容許租佃土地和僱傭勞動，——所有這些我們稱為在農村中擴大新經濟政策的措施……然而能不能不在農村中擴大新經濟政策呢？不能，因為不這樣農民經濟就會衰退，市場就會縮小，工業就會停頓。」（托洛茨基『八年』第十六頁至第十七頁）

可見，如果固執地堅持不正確的想法，認為新經濟政策是退却而且僅僅是退却，那就會說出多麼糊塗的話來。

不能斷言黨在農村中容許僱傭勞動和租佃土地就是「擴大了」新經濟政策，「離開了」列寧的立場等等呢？當然不能！堅持這種謬論的人同列寧和列寧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我可以在這裏引證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給奧斯斯基的一封信，列寧在信中直截了當地說，必須在農村中實行僱傭勞動和租佃土地。這是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快要結束時的事情，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代表們廣泛地討論了農村工作問題和新經濟政策及其後果問題。

這封信給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提供了決議草案，下面就是其中的一段：

「關於在農業方面實行僱傭勞動和租佃土地的條件問題，黨代表大會建議有關部門的一切工作人員不要用不必要的手續去限制這兩種現象，而只限於執行最近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並研究一下究竟用什麼樣的實際措施可以最適當地限制這方面的極端現象和有害的誇張。」

（見『列寧文集』第四卷第三九六頁<sup>（四三）</sup>）

你們可以看出，關於在農村中實行租佃土地和僱傭勞動就是「擴大」新經濟政策，「離開」列寧的立場等等的說法是多麼愚蠢和無聊。

爲什麼我要說到這一點呢？

因爲那些空談「擴大」新經濟政策的人想利用這種謬論來爲他們在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面前的退

却辯護。

因爲在我們黨內和黨的周圍出現了一些人，他們認爲「擴大」新經濟政策就是「拯救」工農結合，他們看到非常措施已經取消，就要求取消對富農的限制，要求解除對農村資本主義分子的束縛……以利於結合。

因爲必須用全部力量，用一切手段來保證黨不受這種反無產階級情緒的影響。

爲了不說得太遠，我引證一個同志的信來談談，這個同志是「貧農報」的工作人員奧西普·切爾諾夫。他在信上要求實行一系列的措施以寬容富農，這些措施不是別的，而是真正地、不加掩飾地「擴大」新經濟政策。我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還是非黨人士。這位擁護蘇維埃政權和工農聯盟的奧西普·切爾諾夫同志在農民問題上竟糊塗到這種地步，以致很難把他和農村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區別開來。他認爲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發生困難的原因在哪裏呢？他說：「第一個原因無疑是累進所得稅制……第二個原因是選舉細則有法律上的變更，細則中沒有明確規定什麼人算是富農。」

爲了排除這些困難，應當做些什麼呢？他說：「首先必須廢除累進所得稅制即目前實行的這種稅制，而改用土地稅制，並對耕畜和大農具收輕微的稅……第二個同樣重要的措施，就是修改選舉細則，把剝削性的富農經濟的界限劃分得更明確些。」

這才是「擴大」新經濟政策。可見托洛茨基的種子並沒有白撒。對新經濟政策的錯誤理解產生了「擴大」新經濟政策的謬論，而「擴大」新經濟政策的謬論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意見、論文、書信和建

議，要求給富農自由，解除對富農的限制，並使他們有可能自由發財。

在這方面，在新經濟政策和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問題方面，我還要指出一個事實。我指的是一個同志所說的話：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階級鬥爭在糧食收購進程中只有很小的意義，階級鬥爭對於我們糧食收購的困難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稍微重大的意義。

同志們，我必須說，我決不能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爲我國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一件稍微重大的政治或經濟事件不反映出城市中或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存在。難道新經濟政策把無產階級專政廢除了嗎？當然沒有！相反地，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表現和工具。而無產階級專政難道不是階級鬥爭的繼續嗎？（喊聲：「對！」）既然如此，怎麼還能說，在糧食收購時期富農起來反對蘇維埃政策以及在糧食收購運動中蘇維埃政權對富農和投機分子採取對策並舉行進攻等如此重大的政治和經濟事件中，階級鬥爭只有很小的意義呢？

在發生了糧食收購危機的時候，我們遭到了農村資本主義分子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所發動的第一次反對蘇維埃政策的嚴重進攻，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在農村中難道不再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嗎？

列寧提出的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反對富農的口號是日前條件下我們農村工作的基本口號，這難道不對嗎？這個口號不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反映又是什麼呢？

當然，決不能把我們的政策看做挑起階級鬥爭的政策。爲什麼呢？因爲挑起階級鬥爭會導致內

戰。因為既然我們掌握着政權，既然我們鞏固了這個政權並且把一切經濟命脈集中在工人階級手裏，我們就不希望階級鬥爭採取內戰的形式。但是這決不是說，階級鬥爭因而被取消了，階級鬥爭就不會尖銳化了。這更不是說，階級鬥爭好像不是推動我們前進的決定力量了。不，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時常說，我們在商業方面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形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是把成千上萬的中小商人從商業中排擠出去。能不能認為這些被排擠出流轉領域的商人會默不作聲地坐着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呢？顯然不能。

我們時常說，我們在工業方面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形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由於我們向社會主義邁進，也許我們自己覺察不到就把成千上萬的中小工業資本家排擠出去並使他們破產。能不能認為這些破產的人會默不作聲地坐着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呢？當然不能。

我們時常說，必須在農村中限制富農的剝削意圖，必須向富農徵收重稅，必須限制租佃的權利，不讓富農享有參加蘇維埃選舉的權利，如此等等。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壓制並逐漸排擠農村資本主義分子，有時把他們弄到破產的地步。能不能設想富農會因此感謝我們，並且不會企圖組織一部分貧農或中農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呢？當然不能。

我們所有的進展，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每一個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們國內階級鬥爭的表現和結果，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隨着我們的進展，資本主義分子的反抗將加強起來，階級鬥爭將更加尖



銳，而日益強大的蘇維埃政權將執行孤立這些分子的政策、瓦解工人階級的敵人的政策以及鎮壓剝削分子反抗的政策，爲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

不能認爲事情會這樣：社會主義的形式將發展起來，排擠工人階級的敵人，而敵人會一聲不響地退却，爲我們的前進讓開道路，然後我們再向前邁進，而敵人再向後退却，最後，『出乎意料地』，所有一切社會集團毫無例外，無論是富農或貧農，無論是工人或資本人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覺地』、沒有鬥爭和波折就投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懷抱。這種神話一般說來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

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垂死的階級自願放棄自己的陣地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在階級社會中，工人階級不經過鬥爭和波折就能向社會主義前進。恰恰相反，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不能不引起剝削分子對這種前進的反抗，而剝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的必然的尖銳化。

這就是不能用階級鬥爭只有次要作用的說法來麻痹工人階級的原因。

第四個問題是對付富農和投機分子的非常措施問題。

決不能把非常措施看做一種絕對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在一定的、非常的情況下，當我們沒有其他措施可以機動運用的時候，非常措施是必要的和適當的。但在另外的情況下，當我們有了其他靈活措施可以在市場上機動運用的時候，非常措施就成爲不必要的和有害的了。認爲非常措施在任何

情況下都是不好的。那些人是對的。對這種人必須進行不斷的鬥爭。但是，認爲非常措施永遠都是必要和適當的那些人也是不對的。對這種人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

在發生了糧食收購危機的情況下採取非常措施不是一種錯誤呢？現在大家都承認：這不是一種錯誤，相反地，非常措施救了我們國家，使整個經濟沒有發生危機。是什麼迫使我們採取這種措施呢？就是去年年底缺糧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的情況；我們必須在泥濘時期以前補足這個缺額，並使糧食收購工作的速度正常起來。在我們沒有一億普特左右的糧食後備可以待機投入市場來降低糧價的情況下，在我們沒有足夠的外匯後備可以從國外輸入大批糧食的情況下，我們能夠不採取非常措施嗎？顯然不能。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補足這個缺額那會怎樣呢？那末現在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就會發生極嚴重的危機，城市就會鬧飢荒，軍隊就會挨餓。

如果我們有一億普特左右的糧食後備，以便待機投入市場降低糧價，制服富農，那我們當然就不會採取非常措施了。但是，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沒有這種後備。

如果我們那時有一億到一億五千萬盧布的外匯後備，以便從國外輸入糧食，那我們也許就不會採取非常措施了。但是，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沒有這種後備。

這是不是說，我們今後還應當沒有後備而再度求助於非常措施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恰恰相反，我們一定要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來積蓄後備並排除採取任何非常措施的必要性。那些想把非常措施變爲我們黨的經常方針或長期方針的人是危險人物，因爲他們是在玩火，是在給工農結合製造

威脅。

由此能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應當永遠不再採取非常措施呢？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沒有根據斷定說，要求採取非常措施的非常情況永遠不會再發生了。做這樣的斷定就是巫師說鬼話。

列寧論證了新經濟政策，但是他認為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在一定的條件和一定的情況下，甚至貧農委員會的辦法也不能發誓不採用。我們更不能發誓永遠不採取非常措施，因為這些非常措施還不能和貧農委員會這種對付富農的激烈辦法相提並論。

在這裏回憶一下在我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一件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也許不是多餘的。大家知道，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他的關於農村工作的提綱中企圖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一勞永逸地」拋棄以貧農委員會的辦法來對付富農的政策。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他的提綱中寫道：「實行不要這個階層（富農和富裕農民）並以一九一八年貧農委員會的辦法對這個階層進行粗暴的經濟以外的壓制這一政策，是極爲有害的錯誤。」（第二節）

大家知道，列寧是用下面的一段話來回答他的：

「第二節的第二句話（反對『貧農委員會的辦法』）是有害的，不正確的，因為，比如說，戰爭就會迫使我們採取貧農委員會的辦法。關於這一點，應該完全是另一種說法，比如這樣說：由於發展農業和增加農產品的極度重要，目前<sup>①</sup>無產階級對富農和富裕農民的政策主要應該是限制他們的剝削趨向等等。我們國家應該怎樣限制和能夠怎樣限制這種趨向，應該怎樣保護和能

够怎樣保護貧農，全部實質就在於此。這是必須研究的，也是必須要人們在實踐中去研究的，而一般的談論都是毫無意義的。」（見『列寧文集』第四卷第三九一頁〔註五〕）

顯然，必須辯證地來看非常措施，因為一切都以時間、地點為轉移。

同志們，在討論中出現的一般性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請允許我來談談穀物問題以及我國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問題。

我認為許多同志犯的錯誤就是把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發生困難的種種原因攪在一起，把臨時性的、暫時的（特殊的）原因和長期性的、基本的原因混淆起來了。糧食困難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長期性的、基本的原因，這種原因要好多年才能消除；另一種是特殊的、暫時的原因，這種原因只要採取並實行一些必要的措施就可以立刻消除。把所有這些原因攪在一起，就是把整個問題弄得糊里糊塗。

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主要意義和主要作用何在呢？就在於這些困難在我們面前全面地提出了糧食問題，糧食生產問題，整個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生產問題。

一般說來，我們的穀物問題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呢？無疑是的。只有瞎子才會懷疑穀物問題是蘇維埃社會目前極突出的問題。我們不能像茨岡人那樣過日子，沒有糧食後備，沒有一定的後備以防歉收，沒有後備以調節市場，沒有後備以供戰時之用，也沒有某些後備以供輸出。連一個經濟十分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貧困的小農也不能沒有後備，不能沒有一些存糧。一個佔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國不能沒有對內和對外所必需的糧食後備，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假如我們烏克蘭的秋播作物沒有遭災，而我們「湊合」度過了這個糧食收購年度，能不能認為這對我們已經够了呢？不，不能。往後我們不能再「湊合」過日子。如果想守住蘇維埃政權對內和對外兩方面的陣地，我們就必須擁有一定限度的後備。

第一、我們不能保證不受到軍事進攻。你們是否認為沒有任何糧食後備來供應軍隊也可以保衛國家呢？有些同志的發言完全正確，他們說，現在的農民已經不是六年前的農民了，那時他們怕土地落入地主手中。現在的農民已經把地主忘了。現在他們要求有新的更好的生活條件。我們不能在敵人進攻的時候，一面在前綫同外來的敵人作戰，一面爲了很快地獲得糧食來供應軍隊而又在後方同農夫作戰呢？不，不能而且不應當。要保衛國家，我們就必須有一定的存糧來供應軍隊，即使只有够最初六個月用的存糧也好。需要這六個月的喘息時機是爲了什麼呢？爲了使農民清醒過來，體會到戰爭的危險，了解事變的真相，並爲保衛國家的共同事業而動員起來。如果我們滿足於「湊合」過日子，那我們就永遠不會有供戰時之用的任何後備。

第二、我們不能保證糧食市場上不發生混亂。爲了干預糧食市場，爲了執行我們的價格政策，我們絕對需要有一定的後備。因爲我們不能而且不應該每次都採取非常措施。但是，如果我們每次都沿着懸崖走，而以有可能「湊合」度過收購年度爲滿足，那我們就永遠不會有這樣的後備。

第三、我們不能保證不發生歉收。爲了在歉收時供應災區，即使是一定程度、一定時期內的供應，我們絕對需要有一定的糧食後備。但是，如果我們不增加商品糧食的生產，不堅決徹底地拋棄不存糧食的舊習慣，那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後備。

最後，我們絕對需要有出口的糧食後備。我們需要輸入工業設備。我們需要輸入農業機器、拖拉機和這些機器的零件。可是不輸出糧食，不靠輸出糧食來積蓄一定的外匯後備，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在戰前，每年輸出五億至六億普特的糧食。能够輸出這麼多糧食是因爲沒有讓自己吃飽。這是事實。但是應該了解，我們戰前的商品糧食總歸比現在多一倍。正因爲我們現在的商品糧食少了一半，所以現在才沒有糧食出口了。而沒有糧食出口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們失去了那種過去藉以輸入、現在也必須藉以輸入工業設備、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泉源。我們能不能不積蓄出口的糧食後備，繼續這樣過日子呢？不，不能。

可見我們糧食後備方面的情况是如何沒有保障和不穩定。

更不用說，我們不僅在這四方面都沒有糧食後備，而且我們也缺少平穩地從一個收購年度進入另一個收購年度、並在青黃不接的六七月間不間斷地供應城市所必需的一定限度的存糧。

既然如此，還能否認穀物問題的迫切性和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嚴重性嗎？

但是由於糧食方面的困難，我們也發生了政治性的困難。同志們，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的。我指的是我們這裏有一部分農民，即一部分貧農和一部分中農產生了不滿情緒，這種情緒給結合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

當然，像弗魯姆金在他的信中所說的那樣說我們的結合已經破裂，這是完全不對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結合破裂是嚴重的問題。結合破裂等於內戰的開始，甚至等於內戰。不應當拿『可怕的』字眼來嚇唬自己。不應當張皇失措。這不是布爾什維克所應有的。結合破裂等於農民和蘇維埃政權破裂。但是，如果農民真的已經和農民糧食的主要收購者蘇維埃政權破裂，那末他們就不會給你們擴大播種面積了。可是我們看到，今年所有產糧區的春季播種面積毫無例外地都擴大了。這叫什麼？結合破裂呢？難道可以像弗魯姆金那樣把這種情況說成農民經濟『沒有前途』嗎？這叫什麼『沒有前途』呢？

我們在糧食方面的困難的根源，如果是指困難的長期的、基本的、原因，而不是指臨時性的、暫時的原因，那末根源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在糧食方面的困難的根源就是農業的日益分散和零碎化。農業特別是穀物業日益分散，贏利愈來愈少，出產的商品愈來愈少，這是事實。革命前我國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農戶，而現在則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並且這種分散過程還有繼續加強的趨勢。

我們現在的播種面積比戰前只少一點，糧食總產量比戰前總共只少百分之五左右，這是事實。然而糟糕的是，儘管如此，我們的商品糧食的生產却比戰前少了一半，也就是少了百分之五十左右。這就是問題的根源所在。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小經濟比大經濟贏利少，出產的商品少並且不如大經濟穩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小生產不如大生產有利這個著名原理，在農業上也是完全適用的。因此，在同樣大小的一塊土地上，小農經濟比大經濟出產的商品糧食就要少得多。

出路何在呢？

正如政治局決議中所說的，我們的出路有三條。

一、出路在於：盡量提高中小農民經濟的生產率，用鐵犁代替木犁，供給小型和中型機器，供給肥料，供給種子，給以農學方面的幫助，使農民合作化，和整個整個的村子訂立預購合同，貸給它們優良種子，從而保證集體農貸的發放，並通過農具租賃站租給它們大型機器。

有些同志的看法是不對的，他們斷言小農經濟已經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所以也就不值得再去幫助它了。這是完全不對的。個體農民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還不小。只是應當善於幫助它實現這種可能性。

『紅色報』<sup>(2)</sup>的看法也是不對的，它斷言使個體農戶在供銷方面合作化的政策已經證明是不正確的。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在供銷方面合作化的政策已經完全證明是正確的，它為農民轉向集體農莊運動打下了實際的基礎。毫無疑問，不發展供銷合作社，農民對集體農莊的態度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轉變，這種轉變幫助了我們向前推進集體農莊的建設。

二、其次，出路在於：幫助貧農和中農把他們分散的小經濟逐步聯合為建立在新的技術和集體勞



動的基礎上的利益更大、出產商品更多的大規模集體經濟。我指的是把小經濟聯合爲公共大經濟的一切形式，從簡單的協作社到勞動組合，它們的商品率和生產率比分散的小經濟要高出很多。

這就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有些同志提倡集體農莊，同時責備我們爲小農經濟『辯護』，這是不對的。他們大概認爲對個體農民經濟的態度應當是鬥爭和消滅，而不應當是幫助和把它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個體農民經濟根本不需要『辯護』。它的贏利少，這是事實。但這還不是說它是完全無利的。如果我們離開了列寧的由集體農莊經常幫助和支持個體農民經濟的立場，而採取了鬥爭和消滅個體農民經濟的觀點，那我們就是破壞了結合。

有些同志讚揚集體農莊，同時把個體農民經濟宣佈爲『可詛咒的東西』，這就更不對了。這裏已經含有同農民經濟直接開火的味道。這種想法是從哪裏來的呢？如果農民經濟是『可詛咒的東西』，那末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盟又怎樣解釋呢？工人階級和『可詛咒的東西』聯盟，——難道世界上會有這樣離奇古怪的事情嗎？既然宣傳結合，怎麼同時又能說出這種話呢？人們常常提到列寧所說的我們必須逐漸從農民的瘦馬跨上工業的鋼馬那句話。這是很好的。但是，難道是這樣從一匹馬跨上另一匹馬嗎？還沒有建立起密佈的集體農莊網這樣廣泛而強大的基礎，就宣佈農民經濟是『可詛咒的東西』，這豈不是弄得沒有任何馬，沒有任何基礎了嗎？（喊聲：『對呀，對呀！』）這些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把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經濟對立起來。但我們不是要把這兩種經濟形式互相對立起

來，而是要使它們互相結合，使集體農莊在這種結合中幫助個體農民，幫助他們逐漸走上集體制的軌道。是的，我們要使農民不把集體農莊看做自己的敵人，而把它看做自己的朋友，看做正在幫助他們而且一定會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朋友。（喊聲：『對！』）既然這是對的，那就不應當說爲個體農民經濟『辯護』，也不應當說農民經濟對我們說來是『可詛咒的東西』。

應當這樣說：小農經濟和大規模集體經濟比較起來利益較小，甚至最小，但是它還不是沒有一定的相當大的利益的。而你們的結論是：小農經濟根本是無利的，也許甚至是有害的。

列寧對於小農經濟不是這樣看的。他在『論糧食稅』那篇演說中對於這一點是這樣說的：

『如果農民經濟能發展下去，那就必須穩固地保證它能進一步過渡，而進一步過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後的、細小的、孤立的農民經濟逐漸聯合起來，組織成公共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對於這一切，社會主義者一向都是這樣設想的。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看的。』（『列寧全集』

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六四頁）

由此可見，個體農民經濟還是有一定利益的。

一種情況是：高級的經濟形式即大經濟對低級的經濟形式作鬥爭，使它遭受破壞並把它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情況就是這樣。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則是：高級的經濟形式不是破壞低級的經濟形式，而是幫助它提高，幫助它走上集體制的軌道。蘇維埃制度下的情況就是這樣。

列寧關於集體農莊和個體農民經濟的相互關係是這樣說的：

『特別應當做到切實執行並徹底執行蘇維埃政權的法律（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法律——斯大林註），這個法律要求國營農場、農業公社和一切類似的聯合對周圍的中農給予最迅速的和全面的幫助。只有在這種給予實際幫助的基礎上，和中農的協議才能實現。只有這樣才能够並且一定會取得中農的信任。』（『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九五頁）

由此可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應當幫助的農民經濟正是個體農民經濟。最後，再引證列寧的一段話：

『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能够的事實上向農民指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的時候，只有當它能够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的時候，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才能牢靠地和實在地把千百萬農民羣衆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四頁）

可見列寧對於集體農莊運動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的意義的評價是很高的。

有些同志在他們的長篇演說中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個體農民經濟的問題上，而對於我們黨的迫切的、具有決定意義的任務即發展集體農莊的任務却隻字不提，真的隻字不提，這是非常奇怪的。

三、最後，出路在於：鞏固原有的國營農場並發展新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因為它們是贏利最

多，出產商品最多的經濟單位。

這就是三個基本任務，完成了這些任務，我們就能解決穀物問題，從而剷除我們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

目前時期的特點是：第一個任務，即提高個體農民經濟的任務，雖然仍是我們工作的主要任務，但是對解決穀物問題來說已經不夠了。

目前時期的特點是：要在實踐中拿發展集體農莊和發展國營農場這兩個新任務去補充第一個任務。

不把這些任務結合起來，不在這三方面進行頑強的工作，就不能解決穀物問題，也就是說，既不能供應國家商品糧食，也不能以社會主義原則改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

列寧對於這一點是怎樣看的呢？我們這裏有一個大家知道的文件可以證明，政治局提請全會審核的決議和列寧在這個文件中所擬定的發展農業的實際計劃是完全一致的。我指的是列寧親自起草的「勞動國防委員會的指令」。這個指令是一九二一年五月頒佈的。列寧在這個文件中分析了三類實際問題：第一類是關於商品流轉和工業的問題，第二類是關於發展農業的問題，第三類是關於各種經濟會議<sup>(四)</sup>和各區域經濟調整會議的問題。

在這個文件中關於農業說了些什麼呢？下面就是「勞動國防委員會的指令」中的一段：

『第二類問題。發展農業：(甲)農民經濟，(乙)國營農場，(丙)農業公社，(丁)勞動組合，

(戊)協作社，(己)其他形式的公共經濟。」(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六八頁)

你們可以看出，政治局關於解決糧食問題和整個農業問題的決議的實際結論是和一九二一年列寧在『勞動國防委員會的指令』中所陳述的計劃完全一致的。

很值得指出的是，列寧這個能够移山倒海的巨人，每當聽到關於建立起一兩個集體農莊或者給某個國營農場派去拖拉機的消息的時候，總流露出純粹是少年的喜悅。例如他在給『技術援助蘇俄協會』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的報紙上登出了一些非常可喜的消息，報道了貴會會員在唐波夫省基爾薩諾夫縣和在敖德薩省米梯諾車站附近各國營農場工作的情況，以及頓巴斯一批礦工的工作情況……我要提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授予最卓越的農場以模範的稱號，並給予它們爲順利開展工作所必需的特別的和異常的幫助。我再一次代表我們共和國向你們深深致謝，並請你們記住，你們幫助我們用拖拉機耕地對我們是特別適時和重要的。我有機會在你們準備組織二百個農業公社的時候向你們致賀，感到特別滿意。』(『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四四頁)

列寧又在給美國『蘇俄之友協會』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我剛才特地向皮爾姆省執行委員會詢問並查對了我們報紙上發表的關於以哈羅德·威爾爲首的貴會會員率領皮爾姆省拖拉機隊在「托依基諾」國營農場工作情況的非

常可喜的消息……我要提請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授予這個國營農場以模範的稱號，並在建築工程方面以及供給汽油、金屬和建立修理廠所必需的其他材料方面給予特別的和異常的幫助。我再一次代表我們共和國向你們深深致謝，並請你們記住，對我們來說，沒有一種幫助能像你們給予我們的幫助那樣適時，那樣重要。」（『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四三頁）

可見列寧聽到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發展的每一個小消息都是非常高興的。

讓那些想欺騙歷史並認為在我國勝利建設社會主義可以不要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人以此作為教訓吧！

同志們，我就要講完了。我認為糧食方面的困難對於我們不會沒有作用。我們黨是在克服困難和克服各種危機中取得教訓而向前邁進的。我認為目前的困難會鍛鍊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隊伍，並促使他們切實地去解決糧食問題。而解決了這個問題就等於掃除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造道路上的一個最大的障礙。

○ 着重號是我加的。 斯大林

## 論工農結合和國營農場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的演說節錄)

有些同志在他們關於國營農場的發言中又回到昨天討論糧食收購問題時發生的爭論上去了。既然如此，我們就回頭談談昨天的爭論。

我們昨天所爭論的是什麼呢？首先是關於城鄉間的「剪刀差」問題。是談到農民購買工業品仍然要多付一些錢，而出賣農產品仍然要少得一些錢。是談到這些多付少得的錢就是向農民徵收的一種類似「貢稅」的超額稅，即爲了工業化而徵收的額外稅；我們一定要取消這種額外稅，但是，如果我們不想破壞我國工業，不想減低爲整個國家從事生產並把我國國民經濟推向社會主義的我國工業的一定發展速度，那末我們是不能立刻取消這種額外稅的。

有人不喜歡聽這種話。看來，這些同志怕承認真相。那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口味問題。有些人認爲在中央全會上不應當說出全部真相。而我認爲我們在自己黨的中央全會上必須說出全部真相。不應當忘記，決不能把中央全會看做羣衆大會。當然，「超額稅」、「額外稅」這些字眼是令人不愉快的，因爲它們很刺耳。但是，第一、問題不在於字眼；第二、這些字眼完全符合現實；第三、用這些令人不

愉快的字眼正是爲了使人感到刺耳，正是爲了促使布爾什維克極認真地來取消這種「超額稅」，來消滅「剪刀差」。

怎樣才能消滅這些令人不愉快的東西呢？那就要不斷地使我們的工業合理化並降低工業品價格；不斷地提高農業技術和單位面積產量，逐步地降低農產品成本；不斷地使我們的商業機關和收購機關合理化，如此等等。

當然，這一切不是在一兩年內就能做到的。但是，如果我們想擺脫各種各樣令人不愉快的東西和討厭的現象，那我們就一定要在幾年內做到這一切。

昨天有一部分同志把消滅「剪刀差」的方針歪曲成立刻消滅「剪刀差」，並且實質上是要求調整農產品的價格。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表示反對，指出這個要求在目前是違反國家工業化的利益的，因而也是違反我們國家的利益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昨天所爭論的。

今天這些同志承認他們已經放棄調整價格的政策。那好極了。可見昨天的批評對這些同志不是沒有作用的。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問題。我在自己的演說中曾經指出：一部分同志在他們的發言中談到與糧食收購有關的發展農業的辦法時，對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樣重要的措施竟隻字不提，這是一種反常的和奇怪的現象。怎麼能把在農業方面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樣重



要的任務「忘掉」呢？難道不知道，發展個體農民經濟的任務在目前雖然很重要，但是已經不夠了，如果我們在實踐中不拿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新任務去補充這個任務，那末我們就不能解決穀物業問題，並且無論在對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也包括農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或者在保證國家有一定的商品糧食後備方面，我們都不能擺脫困難。

既然如此，怎麼能把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問題「忘掉」和撇開不談呢？

現在來談談大規模國營農場的問題。有些同志斷言美國北部沒有大規模的穀物農場，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事實上，在美國北部和美國南部都有這樣的農場。我可以引證屠萊柯夫教授這樣一位見證人的話，他曾經在「伏爾加下游」雜誌（第）第九期上發表過考察美國農業的結果。

讓我來引證屠萊柯夫文章中的幾段話：

「在蒙大拿有一個小麥農場，屬於「坎伯爾農業公司」。該農場面積九萬五千英畝，約合三萬二千俄畝。農場的田地是一整塊，爲了便於耕作而分成四部分，每一部分相當於我國的一個獨立農莊，每一部分由一個人掌管，而整個農場則由該公司經理托馬斯·坎伯爾一人掌管。

根據報上的消息（當然是來自該農場的消息），今年種植農作物的土地約佔該農場總面積的一半，預計可收小麥約四十一萬蒲式爾（約八十萬普特），燕麥二萬蒲式爾，亞麻子七萬蒲式爾。該企業的總收入預計爲五十萬美元。

在這個農場中，馬和騾子幾乎全被拖拉機、卡車和汽車代替了。耕地、播種以及全部田間工

作，特別是收割莊稼，都是日夜進行的；而且夜間，機器在探照燈照耀下在田裏工作。大塊播種面積使機器能一直走很遠而不必轉彎。例如，如果莊稼情況許可，二十四英尺寬的收割脫穀機可以一直走二十英里，合三十俄里多些。以前做這種工作需要四十四馬和四十個男工。一台拖拉機可以同時拖四個割捆機，它們一趨能把寬四十英尺、長二十八英里（約等於四十二俄里）一塊土地上的莊稼捆好。在收割的時候，如果莊稼還不够乾，還不能同時打穀，那就使用割捆機。這時就要把割捆機上的捆束裝置卸下，用特殊的傳送帶把割下的莊稼排列成行。莊稼這樣鋪開以後，經過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就乾了，和莊稼同時割下的雜草的種子就落在地上。然後使用收割脫穀機，把機上的割刀取下，換上自動運送機，這種自動運送機把晒乾的莊稼從地上直接送到脫穀機的圓筒裏去。這時在機器上工作的只有一個拖拉機手和一個管脫穀機的人。在機器上再也沒有別人了。穀物從脫穀機直接倒入載重六噸的四輪車廂，然後，由每次拖十個車廂的拖拉機運到糧食倉庫。消息中說，這樣工作，每天能脫穀一萬六千到二萬蒲式爾。」（見一九二七年九月『伏爾加下游』雜誌第九期第三十八頁至第三十九頁）

這就是關於一個資本主義類型的大規模的小麥農場的描述。在美國北部和美國南部都有這種大農場。

有些同志在這裏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發展這種大農場的條件並不總是有利，或者不完全有利，因此，這種農場有時就分成一些規模較小的、佔地一千至五千俄畝的單位。這是完全對的。

根據這一點，這些同志就認為大規模的穀物農場在蘇維埃的條件下也是沒有前途的。這就完全不對了。

看來，這些同志不了解或者看不見資本主義制度和蘇維埃制度在條件上的差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因而也就有絕對地租，這就使農業生產的成本提高，給農業生產的巨大進步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礙。而在蘇維埃制度下，既沒有土地私有制，也沒有絕對地租，這就不能不使農產品的生產成本降低，因而也就不能不促使大規模的農業在技術方面和其他各方面不斷進步。

其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大規模穀物農場的目的是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或者至少是使資本獲得相當於所謂平均利潤率的利潤，一般說來，不這樣它們就不能維持和存在。這種情況不能不使生產成本提高，因而在發展大規模穀物農場的道路上造成極為嚴重的障礙。而在蘇維埃制度下，大規模穀物農場同時又是國營農場，它們爲了自己的發展根本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潤或平均利潤，可以只限於最低限度的利潤（有時暫時沒有任何利潤也可以）。這種情況再加上沒有絕對地租，就給大規模穀物農場的發展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大規模的穀物農場無論在信貸上或稅收上都沒有優待，而在旨在全力支持社會主義經濟的蘇維埃制度下，現在和將來都有這種優待。

在蘇維埃制度下（和資本主義制度不同），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條件，都爲促進國營農場這種大規模穀物農場的進一步發展造成了必要的極爲有利的環境。

最後，談談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是鞏固結合並保證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據點的問題。我們需要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不僅是爲了保證實現我們將來的對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我們需要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而且是爲了現在就在農村中建立爲鞏固結合並保證工人階級在結合中的領導作用所必需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據點。我們不能現在就指望建立並發展這種據點呢？我不懷疑我們能够而且應當指望這一點。據糧食總社<sup>(註)</sup>說，它跟集體農莊、勞動組合和協作社訂立了合同，根據合同它能從它們那裏大約得到四千萬至五千萬普特糧食。至於國營農場，材料說明：我們的新舊國營農場今年大約也能提供兩千五百萬至三千萬普特商品糧食。

如果再加上農業合作社按照預購合同應當從個體農戶那裏取得的三千萬至三千五百萬普特糧食，那末我們就完全有把握得到一億普特以上的糧食，這些糧食至少在國內市場上可以用來作爲一定的後備。這多少總算是一點東西。

這就是我們在農村中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據點的初步成績。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有些同志的看法是不對的，他們認爲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無力守住自己的社會主義陣地，它似乎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無止境地退却，不斷地把自己的陣地讓給資本主義分子。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工人階級在農村中並不像那些膚淺的觀察家所想像的那樣軟弱無力。這種悲傷的哲學和布爾什維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工人階級在農村中有許多經濟據點，即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和供銷合作社，依靠它們，工人階級就能够加強和農村的結合，孤立富

農並保證自己的領導。最後，工人階級在農村中還有許多政治據點，即蘇維埃、有組織的貧農等等，依靠他們，工人階級就能鞏固自己在農村中的陣地。

黨和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依靠這些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所掌握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政治經濟命脈等等），就能夠滿懷信心地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逐步鞏固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逐步鞏固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

同時應當特別注意貧農工作。必須承認這個規律：我們對貧農的工作做得愈好，愈有成績，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的威信就愈高；相反地，我們對貧農的工作做得愈壞，蘇維埃政權的威信也就愈低。

我們常常談到和中農聯盟。但是要在我們今天的條件下鞏固這種聯盟，就必須同富農即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因此，我們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加緊向富農進攻的口號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不加強貧農工作，不發動貧農反對富農，不經常幫助貧農，不能同富農進行勝利的鬥爭呢？顯然不能！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如果我們對貧農的工作做得不好，如果貧農還沒有成爲蘇維埃政權的有組織的支柱，那末富農就會感到自己有力，中農就會倒向富農一邊。相反地，如果我們對貧農的工作做得好，如果貧農成爲蘇維埃政權的有組織的支柱，那末富農就會感到自己已被包圍了，中農就會倒向工人階級一邊。

因此，我認爲加強貧農工作，經常幫助貧農，並使貧農成爲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有組織的支柱，是我們黨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 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總結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聯共（布）列寧格勒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剛剛結束的中央全會研究了兩類問題。

第一類是關於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即將召開而提出的共產國際的基本問題。

第二類是關於我們蘇聯建設事業中農業方面的問題（糧食問題和糧食收購問題）以及保證我國工業有技術知識分子，有工人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幹部的問題。

我們就從第一類問題談起吧。

## 一 共產國際的問題

### 一、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基本問題

目前擺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面前的基本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看一看第五次代表大會到第六次代表大會所經過的這個階段，那末首先應該注意的是這時期帝國主義陣營中已經成熟的那些矛盾。

這些什麼矛盾呢？

在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前，我們這裏還很少說英美矛盾是主要矛盾。當時甚至都談英美同盟。但是大家更喜歡談的是英法之間、美日之間、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的矛盾。目前這一時期和那個時期之間的差別是：在資本家陣營現有的各種矛盾中，美國資本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爲主要矛盾了。不論是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建設和對於戰爭都有決定意義的石油問題，或者是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都有極大意義的商品銷售市場問題（因爲生產商品而沒有可靠的銷路是不行的）；不論是作爲帝國主義階段極突出的特徵的資本輸出的市場問題，或者是通往銷售市場或原料市場的道路問題，——所有這些主要問題都歸結爲英美爭奪世界霸權這一基本問題。美國這個資本主義飛速發展的國家不管插足到什麼地方，到中國還是到殖民地，到南美洲還是到非洲，到處都要碰到英國早先已經鞏固下來的陣地這些巨大的障礙。

當然，資本主義陣營中的其他矛盾，如美日之間、英法之間、法意之間、德法之間等等的矛盾並不是因此就消除了。這只是說，這些矛盾同沒落的資本主義英國和上升的資本主義美國之間的主要矛盾是有某種聯系的。

這個主要矛盾蘊藏着什麼呢？很可能蘊藏着戰爭。當兩個巨人碰着的時候，當他們感到地球太

擠的時候，他們就很想比一比力量，用戰爭來解決世界霸權問題的爭端。

這是必須注意的第一點。

第二個矛盾是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在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前就已經有了這個矛盾。但它只是現在才尖銳化了。當時中國革命運動還不像一年前和現在這樣猛烈發展，中國千百萬工農羣衆還不像一年前和現在這樣受到強烈的震動。不僅如此，在召開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前，印度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鬥爭也還不像現在這樣蓬勃展開。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問題尖銳地提出來了。

這個矛盾的增長蘊藏着什麼呢？蘊藏着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干涉。這種情況也是應當注意的。

最後，第三個矛盾是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不是在減弱，而是在加深。在召開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之前，兩個世界之間，兩個對立的世界之間，蘇維埃世界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可以說形成了某種固然是不穩固的但多少是持久的均勢，而現在我們有一切根據斷定說，這種均勢快要告終了。

不用說，這個矛盾的增長不能不蘊藏着軍事干涉的危險。

可以設想，第六次代表大會也會考慮到這種情況。

這樣看來，所有這些矛盾必然會引起一個基本的危險——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干涉的危險。



因此，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干涉的危險是當前的基本問題。

目前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及其國際聯盟、「和平」的宣傳、「制止」戰爭的叫嚷、「廢除軍備」的空談等等，就是麻醉工人階級並使他們脫離反戰爭危險的鬥爭的最流行的形式。

許多人認爲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是和平的工具。這是根本不對的。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是準備戰爭的工具，是用虛偽的和平詞句來掩蓋備戰的工具。沒有這種和平主義及其工具國際聯盟，在目前情況下要準備戰爭是不可能的。

有些天真的人認爲，既然有了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那就不會發生戰爭了。這是完全不對的。恰相反，誰要得到真理，誰就應該反過來說：正因爲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及其國際聯盟甚囂塵上，所以一定會發生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干涉。

這裏最重要的是：社會民主黨是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主要傳播者，也就是說，在準備新戰爭和干涉方面，它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主要支柱。

但是，要準備新戰爭，單靠和平主義是不夠的，即使這種和平主義有社會民主黨這樣一個強大力量的支持。要準備新戰爭，還必須採取一些手段去鎮壓帝國主義中心的羣衆。不鞏固帝國主義的後方，帝國主義就不能作戰。不鎮壓工人，就不能鞏固帝國主義的後方。法西斯主義也就是爲此而存在的。

因此，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就日益尖銳化了。

一方面，通過社會民主黨鼓吹和平主義，以便更順利地準備新戰爭；另一方面，採取法西斯手段鎮壓後方的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以便在將來更順利地進行戰爭和干涉，——準備新戰爭的途徑就是如此。

因此，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是：

第一、要在各方面，無論在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同社會民主主義不斷進行鬥爭，要揭露資產階級和平主義，以便把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

第二、要建立先進國家工人和殖民地勞動羣衆的統一戰綫，以便防止戰爭危險，或者在戰爭發生時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消滅法西斯主義，推翻資本主義，建立蘇維埃政權，解放被奴役的殖民地，組織全力保衛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

這就是擺在第六次代表大會面前的基本問題和任務。

只要看一看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議程，就不難相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已經考慮到這些問題和任務了。

## 二、共產國際綱領

共產國際綱領的問題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基本問題是有密切聯系的。

共產國際綱領最重大的意義是：它科學地規定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任務，指出了解決這些任

務的基本途徑，因而使共產國際各支部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方法，沒有這種明確的目標和方法，要滿懷信心地前進是不可能的。

現在略為談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綱領起草委員會所提出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的特點。至少可以指出七個特點：

(一) 這個草案不是為某些個別國家的共產黨而是為所有一切共產黨提供綱領的，它把所有一切共產黨共同的和基本的問題都包括進去了。因此，它有原則性和理論性。

(二) 以前通常都是為「文明」民族提供綱領的。這個綱領草案與此不同，它照顧到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照顧到白種人和黑種人，照顧到宗主國和殖民地。因此，它有無所不包的性質，有深刻的國際性。

(三) 草案的出發點不是世界上某一國家的或某一洲的某種資本主義，而是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並且它把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立起來。因此，它不同於以前所有的一切綱領。

(四) 草案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做出了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取得勝利的結論，指出了形成兩個平行的吸引中心——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和世界社會主義中心的前途。

(五) 代替歐洲聯邦口號，草案提出了已經脫離和正在脫離帝國主義體系的各先進國和殖民地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口號，這個聯邦在爭取世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是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立的。

(六) 草案着重提出了反對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主要支柱和共產主義的主要敵人社會民主黨，它認爲工人階級中的其他一切派別（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公會社會主義<sup>(5)</sup>等等）實際上都是變相的社會民主主義。

(七) 草案把鞏固西方和東方各國共產黨的任務提到首位，認爲這是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和以後保證無產階級專政的先決條件。

中央全會基本上同意共產國際綱領草案，並責成對草案有個別修正意見的同志把這些意見提交第六次代表大會綱領起草委員會。

關於共產國際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談談我們國內建設的問題吧。

## 二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 一、關於糧食收購政策的問題

請允許我提供一點歷史材料。

去年年底我們的情況怎樣呢？你們從黨的文件中已經知道，去年年底和前年年底比較，我們缺糧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我不來詳細說明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因爲這些原因在報刊上公佈的一些

黨的文件中已經說明了。現在對我們重要的是當時我們缺糧一億二千八百萬普特。而且當時離泥濘時期只有兩三個月。因此，我們必須有所選擇：或者彌補虧空並規定今後糧食收購的正常速度；或者使我們整個國民經濟不可避免地面臨嚴重危機。

要彌補虧空必須採取什麼辦法呢？首先，必須打擊那些抬高糧價、使國家遭受飢餓威脅的富農和投機分子。其次，必須把最大數量的商品運到產糧區去。最後，必須發動我們所有的黨組織，扭轉我們整個糧食收購工作的現狀，根除實踐中的自流現象。因此，我們不得不採取非常措施。這些措施已經生效，到三月底為止，我們收購了兩億七千五百萬普特糧食。我們不僅彌補了虧空，不僅防止了整個經濟發生危機，不僅趕上了上年度的糧食收購速度，而且，如果在後來的幾個月內（四月、五月、六月）保持比較正常的收購速度，我們還有一切可能無痛苦地擺脫收購危機。

但是由於烏克蘭南部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區秋播作物遭災，整個烏克蘭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區不能供應糧食，這就使共和國喪失了兩三千萬普特糧食。這種情況加上我們在糧食方面的超支，使我們不得不加強其他地區的糧食收購工作，因而觸動了農民的防荒糧，這就不能不使情況惡化起來。

我們從一月到三月收購了將近三億普特糧食，當時收購的是農民的機動糧；從四月到六月我們連一億普特也沒有收購到，因為那時我們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壞還看不清楚的情況下觸動農民的防荒糧。但糧食還是必須收購的。於是重新採取了非常措施，產生了強迫命令、破壞革命法制、挨戶巡視、非法搜查等等現象，這就使國家的政治狀況惡化，給結合造成了威脅。

這是不是結合破裂呢？不，這不是破裂。也許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吧？不，這不是小事。這是對工農結合的威脅。其實這也就說明爲什麼我們黨的某些工作人員不夠鎮靜和堅定，不能清醒地、毫不誇大地估計當時的情況。

後來收成看好，非常措施部分取消，這才使情況安定，形勢好轉。

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實質是什麼？這些困難的根源在哪裏？現在我們的穀物播種面積幾乎和戰前一樣（只少百分之五），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現在我們出產的糧食也幾乎和戰前一樣（約五十億普特，只少兩三億普特），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儘管如此，我們出產的商品糧食却比戰前少了一半，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因爲我們的農業是分散的。戰前我們約有一千六百萬農戶，現在至少有兩千四百萬農戶，而且農戶和農田的分散還有繼續下去的趨勢。小農經濟是什麼呢？是出產商品最少、贏利最小、自給自足的程度最高的消費經濟，它的產品的商品率只佔百分之十二到十五。然而，我們的城市和工業正在全力成長，建設正在日益發展，對商品糧食的需求正在飛速增長。這就是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

關於這一點，列寧在他的『論糧食稅』的演說中說道：

『如果農民經濟能發展下去，那就必須穩固地保證它能進一步過渡，而進一步過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後的、細小的、孤立的農民經濟逐漸聯合起來，組織成公共的大規模的農業經

濟。對於這一切，社會主義者一向都是這樣設想的。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看的。」（『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六四頁）

原來，我們在糧食戰綫上的困難的根源就在這裏。

出路何在呢？

第一、出路在於提高中小農民經濟，用一切方法幫助它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提高生產率。用鐵犁代替木犁，供給純種種子，供給肥料和小型機器，和整個整個的村子訂立合同（預購合同），把個體農戶吸收到廣大的合作社網中來，——任務就是如此。農業合作社和整個整個的村子訂立合同，這種方法的目的在於供給農民種子，藉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保證農民及時向國家交糧，發給農民獎金（即在公議價格上補加一點）以獎勵及時交糧，並在國家和農民間建立穩固的相互關係。經驗證明，這個方法是有顯著效果的。

有些人認為個體農民經濟已經完全沒有發展的可能，不值得去支持它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種人和我們黨的路綫毫無共同之處。

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為個體農民經濟就是整個農業的始末。這也是不對的。而且這種人公然違反列寧主義的原理。

我們既不需要個體農民經濟的詛咒者，也不需要它的歌頌者。我們需要的是善於使個體農民經濟最大限度地發揮它所能發揮的力量，同時善於把個體經濟逐漸引上集體制軌道的清醒的政治家。

第二、出路在於把孤立的中小農民經濟逐漸聯合爲完全自願聯合的、在新技術基礎上即在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的基礎上進行工作的大規模的集體經濟和協作社。

集體農莊比小經濟優越的地方在哪裏呢？在於集體農莊是大經濟，因而有可能利用科學和技術的一切成就；在於集體農莊更能贏利，更爲穩國，有更高的生產率，能出產更多的商品。不應當忘記：集體農莊的產品的商品率是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而且每一俄畝的收穫量有時達到二百普特或二百普特以上。

最後，出路在於改進原有的國營農場和建立新的大規模的國營農場。應當記住：國營農場是出產商品最多的經濟單位。我們有些國營農場的產品的商品率不下於百分之六十。

任務在於把這三個任務正確地結合起來並加強這三方面的工作。

目前時期的特點是：完成第一個任務，即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經濟的任務（它依然是我們農業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務），對解決整個總的任務來說已經不夠了。

目前時期的特點是：要拿發展集體農莊和改進國營農場這兩個新的實際任務去補充第一個任務。除了這些基本原因以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臨時性的原因，使得我們的收購困難變成了收購危機。這是些什麼原因呢？中央全會的決議指出了這樣幾個原因：

（甲）由於連年豐收，農村收入增加，特別是農村富裕階層和富農階層的收入增加，農民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長超過了工業品供應的增長；於是市場的平衡遭到破壞，而且這種趨勢還在加劇；



(乙)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比價不合理，因而減弱了對於出售餘糧的刺激；但是，黨在今年春季還不能改變這種狀況，因為這樣做會損害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的利益；

(丙)計劃領導方面有錯誤，主要表现在商品運送不及時，對農村有產階層收稅低，糧食消費不得當；

(丁)收購機關、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有缺點（沒有統一戰綫，缺乏積極性，聽其自流）；

(戊)破壞革命法制，實行強迫命令，挨戶巡視，封閉一部分地方市場等等；

(己)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富農、投機分子）利用這一切缺點來破壞糧食收購工作並使國內政治狀況惡化。

一般性的原因需要好多年才能消除，而特殊的、臨時性的原因完全可以立刻消除，以防止可能重新發生的糧食收購危機。

要消除這些特殊的原因必須做些什麼呢？

爲此必須：

(甲)立刻制止挨戶巡視、非法搜查以及任何破壞革命法制的行爲；

(乙)立刻制止各種各樣重新實行餘糧收集制的行爲和任何封閉集市的企圖，同時保證由國家靈活地調節商業；

(丙)根據不同的地區和穀物種類，酌量把糧價提高一些；

(丁) 對糧食收購區組織合理的商品運送；

(戊) 合理地組織糧食供應工作，不准超支；

(己) 一定要建立國家的糧食後備。

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條件下，如果能夠老老實實地有步驟地實行這些措施，那就會造成一種情況，使在即將開始的糧食收購運動中不必採取任何非常措施。

黨的當前任務就是要注視這些措施的切實執行。

由於糧食方面的困難，我們面前就出現了結合問題，工農聯盟今後的命運問題，以及鞏固這個聯盟的方法問題。有人說，我們已經沒有結合了，破裂已經代替了結合。這當然是只有張皇失措的分子才說得出的蠢話。如果沒有結合，農民就會對明天喪失信心，只顧自己，不再相信農民糧食的主要收購者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性，就會開始縮小播種面積，至少不敢擴大播種面積，生怕又來挨戶巡視、搜查等等，並且拿走他們的糧食。

然而我們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所有的地區都擴大了春季播種面積。主要產糧區的農民已經把春季播種面積擴大百分之二到十五甚至二十，這是事實。農民並不相信非常措施是永久性的，他們有一切根據預計糧價會提高，這難道還不明顯嗎？這算什麼結合破裂呢？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這裏沒有或者不會有過對結合的威脅。但是從這裏做出結合破裂的結論，那就是失掉理智，做了自發勢力的奴隸。

有些同志認為，要鞏固結合，就必須把重心從重工業移到輕工業（紡織工業），以為紡織工業就是基本的和唯一的「結合的」工業。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

當然，紡織工業對於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間的商品流轉是有莫大意義的。但是根據這一點就認為紡織品是結合的唯一的基礎，那就是犯了極大的錯誤。實際上，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不僅靠農民個人消費所必需的花布，而且靠農民這個糧食生產者所必需的金屬製品、種子、肥料和各種農業機器。更不必說，沒有重工業和機器製造業的發展，紡織工業本身就不能發展和存在。

我們需要結合並不是為了保存階級和使階級永久存在。我們需要結合是為了使農民接近工人階級，改造農民，改造他們的個人主義心理，以集體主義的精神改造他們，從而準備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取消階級，消滅階級。誰不懂得或不願意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誰就不是列寧主義者，而是向後看不向前看的「農民哲學家」。

究竟怎樣改造農民呢？首先和主要的是：只有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在集體勞動的基礎上才能改造他們。

列寧關於這一點說道：

『改造小農，改造他們的整個心理和習慣，是需要經過幾代的事情。只有物質基礎，只有技術，只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使用拖拉機和機器，只有大規模地實行電氣化，才能解決這個和小農有關的問題，才能使他們的整個心理健全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農。』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四頁）

問題很清楚：誰認為只靠紡織品就能保證結合，而忘記了那些在集體勞動的基礎上改造農民經濟的金屬製品和機器，誰就是要使階級永久存在，誰就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是『農民哲學家』。列寧在另一個地方這樣說：

『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只有當它能够在事實上向農民指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制的優越性的時候，只有當它能够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的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是正確的，才能牢靠地和實在地把千百萬農民羣衆真正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一七三頁至第一七四頁）

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真正地牢靠地把千百萬農民羣衆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吸引到社會主義方面來。

有時人們說，要保證結合，我們只有一種後備，就是向農民讓步。從這一點出發，有時就創造出不斷讓步的理論，認為工人階級能够用不斷讓步的辦法加強自己。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樣的理論只能使整個事業毀滅。這是絕望的理論。

要鞏固結合，除了讓步這種後備以外，還必須有一系列其他的後備，如農村中的經濟據點（發展了的合作社、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政治據點（加強了的貧農工作、有保證的貧農的支持）。

中農是一個動搖的階級。如果我們沒有貧農的支持，如果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軟弱無力，那末中

農就會倒向富農一邊。反之，如果貧農的支持有了保證，那末可以確有把握地說，中農就會倒向蘇維埃政權一邊。因此，有系統地進行貧農工作，保證貧農得到種子和廉價的糧食，就是黨的當前任務。

## 二、關於造就工業建設幹部的問題

現在來談談保證我國工業有新的技術知識分子幹部的問題。

這裏談的是我們工業方面的困難，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出來的困難。

從改進工業的觀點來看，沙赫特事件的實質是什麼呢？沙赫特事件的實質和意義就是：在保證我國工業有一定數量的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的專家方面我們幾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後，落後得不像樣子。從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訓就是：要加速從工人階級中培養出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並能在技術上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新的技術知識分子。

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拋棄那些不按蘇維埃方式思想或不是共產黨員而同意和蘇維埃政權合作的專家。不，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今後還將用一切辦法，盡一切力量去吸收那些在建設我國工業方面願意和蘇維埃政權攜手並進的非黨專家，非黨技術人員。我們決不要求他們立刻拋棄或立刻改變他們的社會政治觀點。我們只要求一點：既然他們自願地同意和蘇維埃政權合作，那他們就要老老實實地合作。

但是問題在於這些願意和蘇維埃政權攜手並進的舊專家是相對地愈來愈少了。問題在於以新的

一代年輕專家來替換他們是絕對必要的。所以黨認為，如果我們不願意遭到新的意外，那就應當加速造就新的一代專家，並且必須從工人階級中，從勞動人民中造就這種人材。這也就是說，要造就能够滿足我國工業需要的新的技術知識分子。

事實表明，教育人民委員部担负不起這個重要的任務。我們沒有理由推斷，消極保守、自行其是，並且很少和生產聯系的教育人民委員部在最近的將來担负得起這個任務。因此，黨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必須使教育人民委員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交通人民委員部這三個機關分担加速培養新的技術知識分子的工作。黨認為這是能够保證這一重要工作有必要的速度的最適當的辦法。因此，把幾所高等技術學校移交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交通人民委員部。

當然這不是說，加速培養新的技術知識分子幹部的任務只限於把那些高等技術學校移交出去。毫無疑問，物質上給學生以保證，在這裏應當起極重要的作用。因此，蘇維埃政權決定培養新幹部的費用按其比重來說應相當於工業的基本建設費，並決定每年補撥這方面的經費四千多萬盧布。

### 三 結 論

同志們，應當承認，我們總是從我們的困難和錯誤中學習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情形是這樣：歷史是用困難，用這種或那種危機，用我們的這種或那種錯誤來教育我們並鍛鍊我們黨的。

一九一八年的情形就是這樣的，當時由於東方戰綫的困難，由於同高爾察克鬥爭的失利，我們終於懂得了建立正規步兵的必要性，並且真的把它建立起來了。

一九一九年的情形也是這樣的，當時由於鄧尼金戰綫上的困難，由於馬蒙托夫襲擊我軍後方，我們終於懂得了建立強大的正規騎兵的必要性，並且真的把它建立起來了。

我認爲我們現在的情形大體上也是這樣。糧食困難對我們不會沒有作用。這些困難會推動布爾什維克，促使他們切實地着手發展農業，特別是發展穀物業。如果沒有這些困難，布爾什維克未必會認真地着手解決穀物問題。

關於沙赫特事件以及和它有關的困難也必須這樣說。沙赫特事件的教訓對我們黨不會而且不能沒有作用。我認爲這些教訓會促使我們尖銳地提出關於造就能夠爲我國社會主義工業服務的新的技術知識分子的問題。

你們知道，我們在解決造就新的技術知識分子這一問題上已經採取了第一個重大的步驟。我們希望這不會是最後一個步驟。（熱烈鼓掌多時）

攝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四日

【列寧格勒真理報】第一六一二號

# 給列寧格勒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協會

(三)

鞏固蘇維埃國家國防的事業是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業。

列寧格勒無產者曾經站在國內戰爭的戰鬥的前列。

列寧格勒無產者現在也應該在保衛蘇聯抵禦工人階級的敵人的準備工作中做出組織性、紀律性和團結性的榜樣。

我不懷疑，列寧格勒無產者的羣衆性組織列寧格勒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協會一定能履行它對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義務。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

「紅色報」(列寧格勒)第一六三號



# 給古比雪夫同志的信

古比雪夫同志，你好！

庫帕今天來了。明天將和他談話。看看他對美國人的計劃說些什麼。

庫帕關於德涅泊水電站建築工程的第六封報告信我已經讀過。當然也要聽聽另一方面的意見。我仍然覺得（我最初的印象就是這樣）庫帕是對的，而文特爾是不對的。庫帕的圍堰式樣（文特爾反對這種式樣）是唯一合適的式樣，這一公認的事實就已說明一定要傾聽庫帕的意見。最好有關方面討論一下庫帕的第六封信並且基本上採納他的意見。

你的情況怎樣？聽說托姆斯基有意和你爲難。他是個惡毒的人，不是一向都很老實的。我覺得他是不對的。你的關於合理化的報告我已經讀過。報告是恰當的。托姆斯基對你還有什麼要求？

察里津拖拉機製造廠和彼得堡拖拉機修理廠的情況怎樣？有成功的希望嗎？

握手。

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刊印

# 悼念伊·伊·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 同志

死神從我們的隊伍中奪去了一位剛毅堅定的列寧主義者，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同志。

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同志在我們的隊伍中戰鬥了幾十年，經受了職業革命家生活中的一切苦難。成千上萬的同志都知道他是最老的、最有聲望的馬克思主義者著作家之一，知道他是十月革命的最積極的參加者，還知道他是爲黨的列寧式的統一和鋼鐵般的團結而鬥爭的最忠誠的戰士。

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同志把自己光輝而勤勞的一生獻給了無產階級專政勝利的事業。

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同志永遠活在工人階級的心裏。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

《真理報》第二三五號

##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  
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認爲首先必須撇開小事情，撇開個人因素等等，以便解決我們所關心的右傾問題。在我們黨內是否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否存在着有利於這種危險的客觀條件，怎樣對這種危險作鬥爭，——這就是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但是，我們如果不撇開蒙蔽這個問題並妨礙我們了解問題實質的一切小事情和次要成分，就不能解決這個右傾問題。

查波里斯基認爲右傾問題是一個偶然的問題，這是不對的。他硬說，這裏全部問題不在於右傾，而在於意氣鬥爭、個人傾軋等等。姑且假定這裏也和在任何鬥爭中一樣，意氣鬥爭和個人傾軋有幾分作用。可是拿意氣鬥爭來解釋一切，看不見隱藏在意氣鬥爭後面的問題的實質，這就是離開了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像莫斯科組織這樣一個毫無疑問是老練而團結一致的大組織，是不會因爲幾個愛鬧意氣的人或

愛傾軋的人的積極活動而弄得上下下都震動起來的。不，同志們，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怪事。更不用說，莫斯科組織的力量和能力是不能這樣輕視的。顯然，在這裏起作用的是一些更加深刻的、和意氣鬥爭或個人傾軋毫不相干的原因。

弗命托夫雖然承認有右傾危險存在，但是不認為這種危險值得嚴肅的實事求是的人去認真過問，這也是不對的。在他看來，右傾問題是空談家的研究對象，而不是實事求是的人的研究對象。我完全了解弗命托夫，他埋頭於日常的實際工作，以致沒有工夫來考慮我們的發展前途。但是，這還不是說我們應當把某些黨的工作人員的狹隘的、事務性的實際主義變為我們建設工作的教條。健康的事務主義本來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它在工作中失掉了前途，不自己的工作服從黨的基本路線，那它就變成壞東西了。可是不難明白：右傾問題是關於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的問題，是關於我們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發展前途是否正確的問題。

有些同志在討論右傾問題時把問題着重在代表右傾的人的身上，這也是不對的。他們說，請給我們指出右傾分子或調和分子，請說出他們的姓名，好讓我們來懲辦他們。這樣提問題是不正確的。人當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這裏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產生黨內右傾危險的條件和環境。儘管可以把人清除，但這還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把我們黨內右傾危險的根抵剷除了。所以人的問題雖然無疑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沒有決定的意義。

說到這裏，不能不想起一九一九年底和一九二〇年初在敖德薩發生的一件事情，那時我們的軍

隊已經把鄧尼金軍隊趕出烏克蘭，正在敖德薩一帶消滅鄧尼金軍隊的殘部。那時有一部分紅軍戰士怒氣沖沖地在敖德薩搜尋協約國，他們相信只要一拿獲協約國，戰爭就會結束。（大笑）可以設想，紅軍戰士當時在敖德薩能够拿獲協約國的某個代表。但是協約國問題當然不會因而得到解決，因為當時敖德薩雖然是鄧尼金軍隊的最後一塊地盤，但是協約國的根柢不在敖德薩，而在世界資本主義中。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他們在右傾問題上把問題着重在代表右傾的人的身上，而忘記了產生這種傾向的條件。

因此，我們在這裏首先應當闡明離開列寧路綫的右傾和「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產生的條件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共產主義中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綫而走向社會民主黨方面去的趨向或傾向，這種傾向固然沒有正式形成，也許還沒有被意識到，但畢竟是一種傾向。既然某一部分共產黨員否認競選中「階級反對階級」這個口號的適當性（法國），或反對共產黨單獨提出候選人（英國），或不願強調對「左派」社會民主黨鬥爭的問題（德國），如此等等，——那就是說在共產黨內有些人力圖使共產主義去遷就社會民主主義。

如果右傾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獲得勝利，那就意味着共產黨在思想上被粉碎，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而社會民主主義大大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資本主義的加強和鞏固，因為社會民主黨是資本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主要支柱。

總之，右傾在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內獲得勝利，就會使保存資本主義所必需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但是資本主義根柢還沒有挖除的蘇維埃發展條件下，共產主義中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我們黨的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趨向或傾向，這種傾向固然沒有正式形成，也許還沒有被意識到，但畢竟是一種傾向。既然我們的某一部分共產黨員企圖拉着黨離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後退，否認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縮我國工業，認為目前我國工業的迅速发展會使國家遭到滅亡；或否認資助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適當性，認為這種資助是浪費金錢；或否認在自我批評基礎上進行反官僚主義鬥爭的適當性，認為自我批評會動搖我們的機關；或要求放鬆對外貿易壟斷，如此等等，——那就是說在我們黨的隊伍裏有些人企圖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去遷就（也許他們自己還沒有覺察到）「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那就意味着我國資本主義成分大大加強。而我國資本主義成分加強又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削弱和資本主義恢復的機會的增多。

總之，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使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所必需的條件增長起來。

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有沒有使資本主義恢復（復辟）成爲可能的條件呢？是的，是有的。同志們，這看起來也許是很奇怪的，但這是事實。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正在加速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並使農民經濟和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結合起來。但是，我們還沒有挖除資

本主義的根柢。這些根柢到底藏在什麼地方呢？它們藏在商品生產裏，藏在城市小生產特別是農村小生產裏。

資本主義的力量，正如列寧所說，在於「小生產的力量。因為小生產在世界上可惜還保留着很多，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並大量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頁至第八頁）。

很明顯，既然小生產在我國很普遍，甚至佔優勢，既然它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經常地大量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那末我國就有使資本主義恢復成爲可能的條件。

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有沒有爲消滅和剷除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性所必需的手段和力量呢？是的，是有的。列寧關於蘇聯有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論點所以正確，就因爲它是這一點爲基礎的。爲此就必須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加強工農聯盟，從國家工業化着眼來發展我們的經濟命脈，迅速發展工業，使國家電氣化，把整個國民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使農民普遍合作化，提高農民經濟的單位面積產量，把個體農民經濟逐漸聯合爲公共的集體經濟，發展國營農場，限制並戰勝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如此等等。

列寧關於這一點是這樣說的：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這是必須記住的。凡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過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挖

除資本主義的根柢，還沒有摧毀國內敵人的根基和基礎。國內敵人是依靠小經濟的，我們要摧毀這個敵人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包括農業在內的全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去。只有電氣才是這樣的基礎。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否則國家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這是我們必須明確地意識到的。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國內也比資本主義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而且我們一定會使經濟基礎從小農經濟轉到大工業經濟。只有國家實現了電氣化，只有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化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頁至第四八四頁）

第一、由此可見，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當我們還沒有挖除資本主義根柢的時候，資本主義比共產主義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有時候人們把樹砍倒了，却沒有把樹根挖掉，因為力量不夠。由此就產生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可能性。

第二、由此可見，除了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性以外，在我國還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因為如果我們努力實現國家電氣化，如果我們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化大工業的技術基礎，我們就能够消滅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性，能够挖除資本主義的根柢並在我國達到最後戰勝資本主義的目的。由此就產生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可能性。

最後，由此可見，不能僅僅在工業方面建設社會主義，而聽憑農業去自發地發展，以為農村「自



然會跟着」城市走。城市裏社會主義工業的存在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因素。但是這還不是說有了這個因素就完全够了。要使社會主義的城市能够把農民的鄉村引導到底，就必須像列寧所說的那樣，「把包括農業在內的全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去」。

列寧的這一句話和他的另一句話即「新經濟政策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是不是矛盾呢？不，不矛盾。恰恰相反，這兩句話是完全相符的。列寧決不是說新經濟政策的基礎是我們現成的社會主義。列寧只是說新經濟政策保證我們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社會主義可能建成和社會主義實際建成是大有差別的。決不可以把可能性和現實混爲一談。正是爲了把這種可能性變爲現實，列寧才主張實現國家電氣化，主張爲工業、農業和運輸業建立起現代化大工業的技術基礎，作爲社會主義在我國最後勝利的條件。

可是要在一兩年內實現這個建成社會主義的條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一兩年內使國家工業化，建立強大的工業，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爲農業建立起新的技術基礎，把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爲大規模集體經濟，發展國營農場，限制並戰勝城鄉資本主義分子。爲此就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多年緊張的建設工作。當這一點還沒有做到的時候（而這一點並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們就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在這裏，小生產經常地並大量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在這裏，資本主義恢復的

危險還是存在。

因為我國無產階級並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複雜的最實際最現實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產基礎上生長起來的資產階級分子，就『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來從各方面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內部經常引起小資產階級的無氣節、散漫性、個人主義、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復發的現象』（『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頁），從而把某種猶豫心理、某種動搖情緒散播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我們黨的隊伍裏各種動搖和各種離開列寧路綫的傾向，其根源和基礎就在這裏。

正因為如此，不能認為我們黨內的右傾或『左』傾問題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問題。

我們黨內的右傾危險，即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的危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它過低估計我們敵人的力量，資本主義的力量，看不見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不了解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鬥爭的訣竅，因而很輕易地向資本主義讓步，要求降低我國工業的發展速度，要求寬容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要求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問題推到後面去，要求放鬆對外貿易壟斷，如此等等。

毫無疑問，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放縱資本主義勢力，破壞無產階級的革命陣地，增多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機會。

我們黨內的『左』傾（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危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它過高估計我們敵人的力量，資本主義的力量，只看見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性，而看不見我國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的

可能性，陷於悲觀失望，只好用我們黨正在特米多兩化的胡說來安慰自己。

列寧說，「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根據列寧這句話，「左」傾就做出不正確的結論脫；在蘇聯根本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對農民是毫無辦法的；工農聯盟的思想是已經過時的思想；如果沒有西方勝利了的革命的及時援助，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定會垮台或蛻化；如果不採納那種幻想的、不惜以和農民決裂為代價來實行的超工業化計劃，那就必須認為社會主義事業在蘇聯已經毀滅了。

由此就有「左」傾政策中的冒險主義。由此就有政策中的「超人的」跳躍。

毫無疑問，如果「左」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自己的農民基礎，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脫離其餘的工人羣衆，因而就會使無產階級遭受失敗，使資本主義恢復的條件容易形成。

可見，這兩種危險，無論是「左」傾危險或右傾危險，這兩種離開列寧路線的傾向，無論是右傾或「左」傾，雖然從不同的兩端出發，但引起的後果是一樣的。

這兩種危險哪一種壞些呢？我認為兩種都壞。

從對這兩種傾向順利進行鬥爭的觀點來說，它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左」傾危險現在在黨看來比右傾危險更爲明顯。我們對「左」傾已經進行了幾年緊張的鬥爭，這個情況對於黨當然不會沒有作用。很明顯，在對「左」傾即托洛茨基主義傾向進行鬥爭的幾年中，黨學會了許多東西，要用「左的」詞句來欺騙黨已經不是容易的了。

至於右傾危險，它過去就已經存在，現在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加強（和上年度收購危機有關）而更加突出地顯露出來了；我認爲這種危險在我們黨內某一部分黨員看來還不十分明顯。因此任務就是；除了絲毫不放鬆對「左」傾危險即托洛茨基主義危險的鬥爭以外，還要着重反右傾的鬥爭，並竭力設法使右傾危險在黨看來也和托洛茨基主義危險一樣明顯。

右傾問題如果不是和我們發展中的困難問題有聯系，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但是問題也就在於右傾的存在使我們發展中的困難複雜化，並阻礙我們克服這些困難。正因為右傾危險阻礙我們進行克服困難的鬥爭，所以克服右傾危險的問題對於我們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現在稍微談談我們的困難的性質。應該注意到，我們的困難決不能認爲是停滯或衰落中的困難。有經濟衰落或經濟停滯中的困難，在發生這種困難的時候，人們就竭力使經濟停滯現象的害處減輕一些；或者使經濟衰落的程度減輕一些。我們的困難和這種困難毫無共同之處。我們的困難的特點就在於它們是高漲中的困難，是發展中的困難。當我們講到困難的時候，通常指的是要把工業提高百分之幾，把播種面積擴大百分之幾，把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多少普特，如此等等。正因為我們的困難是高漲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或停滯中的困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也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危險。

但是困難終究是困難。要克服困難就必須竭盡一切力量；必須有剛毅性和堅韌性，而剛毅性和堅韌性又不是每個人都充分具備的，也許因爲有人覺得累了，疲勞了，或者因爲有人寧願過比較安靜的，沒有鬥爭和波折的生活，——所以，這裏就發生猶豫和動搖，轉到阻力最小的方面去，說什麼要

降低工業的發展速度，寬容資本主義分子，否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並否認一切超出平常的、安靜的日常工作範圍的事物。

可是，我們不克服我們面前的困難就不能前進。而要克服困難，首先必須戰勝右傾危險，首先必須克服右傾，因為右傾阻礙我們和困難作鬥爭，並企圖摧毀我們黨為克服困難而鬥爭的意志。

這裏所指的當然是對右傾進行真正的鬥爭，而不是口頭上的紙上的鬥爭。我們黨內有些人爲了良心上過得去，也就不反對宣佈對右傾危險作鬥爭，好像神甫有時念着『阿勒盧亞，阿勒盧亞』一樣，可是不採取（決不採取）任何實際辦法來爲反右傾鬥爭奠定鞏固的基礎，並在事實上克服這種右傾。這樣的派別在我們這裏就叫做對右的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調和的派別。不難了解：對這種調和派的鬥爭就是對右傾，對右傾危險的總鬥爭的組成部分。因爲不同這種庇護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派進行有系統的鬥爭，就不能克服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關於右傾分子的問題無疑是值得注意的，雖然它沒有決定的意義。在上年度發生糧食收購危機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在我們黨的下層組織裏碰到右傾危險分子，當時在鄉裏和村裏有許多共產黨員反對黨的政策，弄到和富農分子結合起來的地步。你們知道，這種分子在今年春季已經被清除出黨，這一點已經在今年二月我們黨中央的一個大家知道的文件中特別提到了。

可是，如果說我們黨內再沒有這種分子，那就不對了。如果往上面去看看縣的和省的黨組織，並好好地觀察一下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那你們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在這裏找到右傾危險分子以及

對右傾危險採取調和態度的人。大家知道，在我們黨機關和蘇維埃機關好些工作人員所寄來的「信」、  
「聲明」和其他文件中，右傾趨向是表現得十分明顯的。你們知道，在中央七月全會速記記錄中提到  
了這些信和文件。

如果再往上面去看看，提出關於中央委員的問題，那就必須承認，在中央的成員中也有一些對  
右傾危險採取調和態度的因素，固然這些因素是極少的。中央七月全會速記記錄就是這一點的直接  
證明。

而在政治局內又是怎樣呢？在政治局內有沒有什麼傾向呢？在我們政治局內既沒有右傾分子，  
又沒有「左」傾分子，也沒有對他們採取調和態度的分子。這是必須在這裏十分肯定地說明的。對黨  
不懷好意的分子和各種反對派分子散佈謠言，說我們中央政治局內有右傾或對右傾的調和態度——  
已經到了拋棄這種謠言的時候了。

在莫斯科組織裏或它的上層機關莫斯科委員會內是不是有過猶豫和動搖呢？是的，是有過的。  
如果現在硬說那裏沒有發生過猶豫和動搖，那是愚蠢的。彭柯夫的誠懇坦白的發言就是這一點的直  
接證明。彭柯夫在莫斯科組織和莫斯科委員會裏並不是居於末位的人。你們已經聽見，他坦白地公  
開地承認了他在我們黨的政策的許多極重要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這當然不是說，整個莫斯科委員  
會都發生過動搖。不，不是這個意思。像今年十月莫斯科委員會告莫斯科組織全體黨員書這樣的文  
件，就毫無疑問地證明莫斯科委員會已經克服了它的某些委員的動搖。我不懷疑，莫斯科委員會的領

導核心是一定能徹底糾正這種情況的。

各區組織干涉了這件事，提出了必須剷除莫斯科組織裏某些領導人的錯誤和動搖的問題，有些同志對此表示不滿。我不知道這種不滿能有什麼理由。莫斯科組織裏各區積極分子會議發出了自己的呼聲，要求剷除錯誤和動搖，這有什麼不好呢？難道我們的工作不是在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評的標誌下進行的嗎？自我批評可以提高黨的和整個無產階級的下層羣衆的積極性，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如果各區積極分子會議真正發揮了自己的作用，那又有什麼不好或危險呢？

中央干涉這件事情是不是做得對呢？我認爲中央是做得對的。別爾津認爲中央提出撤換一個爲區組織所反對的區領導人的問題是做得太嚴厲了。這是完全不對的。我請別爾津回想一下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〇年發生的一些事情，當時有些中央委員在黨的路綫方面犯了一些在我看來並不是很嚴重的錯誤，但是按照列寧的提議對這些人進行了處分以警效尤，其中有一個人被派到土爾克斯坦，另一個人幾乎被取消了中央委員資格。

列寧當時這樣處理是不是對呢？我認爲他是完全對的。當時中央的情形並不像現在這樣。當時有一半中央委員是跟着托洛茨基走的，而中央本身的情形是不穩固的。現在中央這樣處理是寬大得無可比擬了。爲什麼呢？也許因爲我們想比列寧慈善些？不，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現在中央的情形已經比當時穩固了，所以中央現在已經有可能處理得比較寬大。

薩哈羅夫硬說中央干涉得太遲，這也是不對的。所以不對，是因爲他大概不知道中央的干涉其實

是從今年二月就開始的。薩哈羅夫如果願意，是可以確信這一點的。固然，中央的干涉並沒有立刻收到良好的效果。可是，如果拿這一點去責備中央，那就奇怪了。

結論：

(一) 右傾危險是我們黨內的嚴重危險，因為它是生根於我國社會經濟環境的；

(二) 右傾危險因有各種困難而加深，不克服右傾和對右傾的調和態度，就不能克服這些困難；

(三) 在莫斯科組織裏有過猶豫和動搖，有過不穩固的因素；

(四) 莫斯科委員會的核心在中央和各區積極分子會議的幫助下已經採取一切辦法去剷除這種動搖；

(五) 毫無疑問，莫斯科委員會一定能克服已經發現的錯誤；

(六) 任務就在於消除內部鬥爭，使莫斯科組織團結一致，在開展自我批評的基礎上順利地進行支部的改選。(鼓掌)

載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頁

「真理報」第二四七號



## 答什·同志

什·同志！

你的信收到了，必須說，我決不能同意你的意見。

(一)從列寧的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只要我們還是一個小農國家，我國就還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你說列寧的這種看法「不能應用於蘇聯目前的時期」。試問，爲什麼呢？難道我們不仍然是一個小農國家嗎？

當然，因爲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正在發展，集體的經濟形式開始在農村中培植起來，所以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正在減少。這是事實。但這是不是說我們已經不再是小農國家了呢？這是不是說我國的社會主義形式已經發展到不能再把蘇聯看做小農國家了呢？顯然不是這個意思。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由此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我國還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怎麼能反駁這一明顯的事實呢？

(二)你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從你對右傾和「左」傾的意見中，人們會以爲我們同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只是在工業化的速度問題上有分歧。至於農民問題，你在評論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時只

是稍微提了一下。這一點使人們對你的演說產生了很不好的解釋。」

人們對我的演說<sup>①</sup>完全可能進行不同的解釋。這是口味問題。但是你信中的意思和事實不符，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我在演說中直截了當地說，右傾在我國『過低估計資本主義的力量』，『看不見資本主義恢復的危險』，『不了解階級鬥爭的訣竅』，『因而很輕易地向資本主義讓步』。我在演說中直截了當地說，『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增多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機會』。你當然會了解，這裏說的不單單是工業化的速度。

關於右傾還需要說些什麼才能使你滿意呢？

關於『左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傾向，我在演說中直截了當地說，它否認在我國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否認工農聯盟的思想，並決心以和農民決裂為代價來實行其幻想的工業化計劃。我在演說中說（如果你讀過這篇演說）：『如果『左』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使工人階級脫離自己的農民基礎，使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脫離其餘的工人羣衆，因而就會使無產階級遭受失敗，使資本主義恢復的條件容易形成。』你當然會了解，這裏說的不單單是工業化的速度。

我認爲我們一般所說的關於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切主要的東西在這裏都已經說到了。

當然，在我的演說中關於『左』傾談得比右傾少。但這是因爲我的演說的題目是關於右傾的問

① 見本卷第一九二頁至第二〇五頁。——編者註

題，這一點我在演說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說明，而且這是完全符合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議程的。雖然如此，有一點還是不能否認的：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以及和右傾的一切主要差別，在我的演說中都已经說到了。

在論右傾的演說中關於托洛茨基主義還需要說些什麼才能使你滿意呢？

（三）我聲明在我們政治局內既沒有右傾，又沒有「左」傾，也沒有對這兩者的調和態度，你對我的聲明表示不滿。我做這種聲明是否有根據呢？是的，是有根據的。爲什麼呢？因爲在政治局通過中央委員會告莫斯科組織黨員書的時候，政治局全體到會委員沒有一個人投票反對。這種情況是好還是不好呢？我認爲是好的。在說明一九二八年十月政治局的特徵的時候，能不能撇開這個事實呢？顯然不能。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次刊印

# 致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

(慶祝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十周年的賀電)

值此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十周年紀念日，謹向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致敬！

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過去是現在還是我國革命的年輕後備軍。工農年輕一代的千百萬優秀代表在青年團的隊伍裏受到了教育，經過了革命的鍛鍊，並進入了我們的黨，我們的蘇維埃，我們的工會，我們的紅軍，我們的紅海軍，我們的合作社，我們的文化機關，來接替布爾什維克的老近衛軍。

青年團所以能夠完成這一艱鉅的任務，是因為它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自己的工作，它善於在自己的活動中把一般的學習特別是列寧主義的學習和日常的實際工作結合起來，它善於以國際主義的精神教育男女工人和男女農民的年輕一代，它善於使老年列寧主義者和青年列寧主義者、老近衛軍和青年近衛軍取得相互了解，它善於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從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利益。

正因為如此，青年團才能高舉列寧的旗幟。

希望青年團今後還能負起自己對我國無產階級和國際無產階級的責任。

向我們黨的二百萬後備軍，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致敬！  
青年團的一代萬歲！

約·斯大林

殺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二五二號

# 紀念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十周年

(五)

向女工和城鄉全體勞動婦女致兄弟的敬禮！

祝她們在爭取消滅剝削、壓迫、不平等、愚昧和沒有文化等現象的鬥爭中獲得勝利！

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和全體勞動人民結成統一戰綫，爲消滅資本主義，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爲建成社會主義的新社會前進！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真理報」第二六七號

# 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聯共（布）中央全會<sup>（一）</sup>上的演說）

同志們，我要講的是政治局提綱中所提出的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國家工業化以及在保證以儘快的速度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的條件下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工業化的主導因素的問題。

其次一個問題，是我國農業的發展速度過分落後於工業的發展速度，因而我們國內政策方面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問題，也就是如何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提高並改造農業的問題。

最後，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離開黨的路綫的各種傾向、兩條戰綫的鬥爭以及目前我們主要的危險是右傾危險，是右傾的問題。

## 一 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

迅速發展整個工業特別是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和關鍵，是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改造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基礎和關鍵。這個原理是我們提綱的出發點。

迅速發展工業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盡量增加工業的基本投資。但是這樣做會使我們的一切計劃（無論預算內的或預算外的）都很緊。而事實也是這樣，最近三年來，在改造時期中，我們的控制數字的特点是：這些數字的制定和實現都是很緊的。無論是看一看我們的控制數字，或者是翻一翻我們的預算草案，或者是和我們黨內的同志（無論是在黨組織方面工作的同志，或者是領導我們蘇維埃建設、經濟建設和合作社建設的同志）談一談，——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我們的計劃很緊。

這裏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般地說，我們需不需要把計劃定得這樣緊呢？不緊不行嗎？難道不能在比較『平靜』的情況下用比較緩慢的速度進行工作嗎？我們採取迅速發展工業的方針，是不是由於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們性情急躁呢？

當然不是！在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裏工作的都是一些清醒而冷靜的人。如果撇開內部和外部的環境抽象地來講，我們當然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進行工作。但是問題在於：第一、不能撇開內部和外部的環境；第二、如果從我們周圍的環境出發，那就不能不承認，正是這個環境促使我們迅速發展我國工業。

現在請允許我來分析一下這個環境，分析一下促使我們迅速發展工業的這些內部和外部的條件。



外部條件。我們是在一個技術非常落後的國家內取得了政權的。除了少數大工業單位多少有些新的技術基礎以外，我們千百個工廠的技術是根本不能拿現代技術成就來衡量的。可是，我們周圍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它們擁有比我國發達得多的和現代化的工業技術。你們看一看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看到那裏的技術不僅是在前進，而且簡直是在突飛猛進，超過了舊式的工業技術。由此可見，一方面，我國有最先進的蘇維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進的政權即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面，應當作為社會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基礎的我國工業技術却過分落後。你們是否以為，在存在着這種矛盾的情況下可以在我國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呢？

要克服這種矛盾必須做些什麼呢？爲此必須趕上並超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我們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蘇維埃制度方面已經趕上並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很好的。但是這還不夠。爲了在我國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還必須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這些國家。或者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或者我們被壓倒。

不僅從建成社會主義方面來看這是對的。從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保衛我國的獨立來看這也是對的。不爲國防建立足夠的工業基礎，就不能保衛住我們國家的獨立。不使工業具有高度的技術，就不能建立這樣的工業基礎。

就是爲了這一點，我們必須迅速發展工業，就是這一點促使我們迅速發展工業。

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落後並不是我們臆造出來的。這種落後是歷來就有的，是我國的全部歷史遺

留給我們的。這種落後，無論是在從前，在革命以前的時期；或是在後來，在革命以後的時期，人們都覺得是一種禍害。彼得大帝接觸了西方較發達的國家以後，就狂熱地建立工廠來供應軍隊和加強國防，這也就是想跳出落後圈子的一種獨特的嘗試。但是十分明顯，任何一個舊的階級，無論是封建貴族或是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消滅我國落後性的任務。而且這些階級不僅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甚至不能以多少令人滿意的形式提出這個任務。只有在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才能消滅我國歷來的落後性。而且只有建立了自己的專政並掌握着對國家的領導的無產階級，才能消滅這種落後性。

如果以為我國的落後並不是我們臆造出來的，而是我國的全部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所以我們不能而且不應該對此負責，——如果這樣來安慰自己，那就愚蠢了。同志們，這是不對的。既然我們取得了政權並坦負起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國家的任務，我們就對一切負責而且應當對一切負責，既對好的負責也對壞的負責。正因為我們對一切負責，我們就應當消滅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如果我們真正想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就一定要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只有我們布爾什維克才能做到。正是爲了實現這個任務，我們就應當不斷地使我國工業迅速發展。我們已經在使我國工業迅速發展，這是現在大家都看到的。

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對於我們布爾什維克來說並不是什麼新的或突如其來的問題。這個問題早在一九一七年，在十月革命爆發前的時期我們就提出來了。早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列寧在他的『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一書中就提出這個問題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革命所已經做到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來說，在幾個月以內就趕上先進國家了。可是這還不够。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各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向前猛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三八頁）

列寧就是這樣尖銳地提出了消滅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的問題。

這段話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夜，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前的時期寫的，當時布爾什維克還沒有政權，還沒有社會主義化的工業，還沒有廣泛發展的包括千百萬農民的合作社網，還沒有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現在，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够根本消滅我國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的一些重要東西的時候，我們可以吧列寧的話大體上這樣變動一下：

『我們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在政治方面趕上並超過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是這還不够。我們應當利用無產階級專政，利用我們的社會主義化的工業、運輸業、信用系統等等，利用合作社、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等等，以便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假如我們的工業和技術像德國那樣發達，假如我國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像德國那樣

大，那末迅速發展工業的問題在我們這裏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迫切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發展工業，不必耽心落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後面，我們知道我們一下子就會超過它們。而那時我們也就不會有現在這樣嚴重的技術和經濟的落後性了。但是問題正在於：我們在這方面是落後於德國的，我們在技術和經濟方面還沒有趕上德國。

假如我們不是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之一，假如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其他比較先進的國家，比如說在德國和法國，也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那末迅速發展工業的問題就不會這樣迫切了。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包圍對於我們就不會有現在這樣嚴重的危險，我國的經濟獨立問題自然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們就可以加入較發達的無產階級國家的體系，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國家得到機器來發展我國的工業和農業，而供應這些國家原料和糧食，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用比較緩慢的速度發展我國的工業。但是，你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還沒有這種條件，我們還是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技術和經濟方面遠遠地走在我們的前面。

正因爲如此，列寧才把在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的問題當做我國發展的生死存亡問題提出來。

促使我們迅速發展我國工業的外部條件就是如此。

內部條件。除了外部條件以外，還有促使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腦即我國工業迅速發展的內部

條件。我指的是我國農業、農業技術和農業文化過分落後。我指的是小商品生產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後的生產在我國還佔絕對優勢，和這種生產比較起來，我國社會主義大工業就像大海中的孤島，雖然這個島的基礎在一天天擴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的孤島。

我們通常說，工業是包括農業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腦，工業是一把鑰匙，用這把鑰匙就能在集體制的基礎上改造落後的分散的農業。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一分鐘也不應當拋棄這種看法。但是也要記住：如果說工業是主腦，那末農業就是工業發展的基礎，因為農業是吸收工業品的市場，是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者，是為輸入設備以滿足國民經濟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資後備的來源。如果讓農業仍然處在技術十分落後的狀態中，如果不保證工業有農業基礎，不改造農業，不使農業跟上工業，那末能不能把工業向前推進呢？不，不能。

因此，任務就在於最大限度地保證農業有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加速並推進自己的改造事業所必需的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但是，要實現這個任務，就必須迅速發展我國工業。比起改造聯合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來，改造分散的零星的農業當然是一件困難得多的工作。但是這個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就必須把它解決。而解決這個任務非在迅速發展工業的基礎上不可。

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決不能無止境地即過於長期地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立在規模最大的聯合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後的小商品農民經濟的基礎上。必須逐步而又不斷地、堅定不移地把農業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大生產的基礎上去，使它跟上社會主義工

業。或者我們解決這個任務，那末我國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就有了保證；或者我們放棄這個任務，不解決這個任務，那末回到資本主義去就成爲不可避免的。

列寧關於這一點是這樣說的：

「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這是必須記住的。凡細心考察過農村生活，而把它和城市生活做過比較的人，都知道我們還沒有挖除資本主義的根柢，還沒有摧毀國內敵人的根柢和基礎。國內敵人是依靠小經濟的，我們要摧毀這個敵人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包括農業在內的全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去。只有電氣才是這樣的基礎。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三頁至第四八四頁）

可見列寧所理解的全國電氣化並不是孤立地建造個別的發電站，而是逐步地『把包括農業在內的全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去』，這種大生產是這樣或那樣地、直接或間接地和電氣化專業聯系着的。

這個演說是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的前夕，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論證所謂電氣化計劃即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的計劃時發表的。有些同志根據這一點說：這段話

○ 前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裏所說的原理對目前的實際情況已經不適用了。試問，爲什麼呢？據說是因爲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這當然是事實。我們現在擁有發達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擁有已經成爲普遍現象的集體農莊，我們擁有舊的和新的國營農場，我們擁有稠密的發達的合作社網，我們擁有爲農民經濟服務的農具租賃站，我們現在採用預購的方法作爲結合的新形式，我們可以運用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槓桿來逐步地把農業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這一切都是事實。可是，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是一個小生產佔優勢的小農國家，這也是事實。而這一點却是主要的。只要這個主要之點還存在，列寧關於「當我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的時候，資本主義在俄國比共產主義有更穩固的經濟基礎」，因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非空話這一論點就還是有效的。

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施行以後，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四月間所寫的「論糧食稅」一書的綱要中也說過同樣的但是更加尖銳的話：

「如果經過一二十年的電氣化，小農的個人主義和他們在地方流轉中的自由貿易就一點也不可怕了。如果沒有電氣化，回到資本主義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

又說：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發展着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況下），否則就會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難。」

（『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頁至第三〇三頁）

列寧就是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或者電氣化，即『把包括農業在內的全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去』，或者回到資本主義去。

列寧對於『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的問題就是這樣了解的。

這裏問題不在於對農民表示愛撫，並把這看做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的方針，因為靠愛撫是做出大事來的；問題在於幫助農民把他們的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轉到現代化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去』，因為這是使農民擺脫貧困的基本道路。

可是，不迅速發展我國工業，首先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把全國經濟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去是不可能的。

促使我們迅速發展工業的內部條件就是如此。

使我國國民經濟控制數字定得很緊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就是如此。

我們的經濟計劃（無論預算內的或預算外的）所以很緊，並規定向基本建設大量投資以保持工業的迅速發展，其根源就在這裏。

有人會問：提綱中什麼地方，提綱中哪一部分談到了這一點呢？（喊聲：『是呀，什麼地方談到了這一點呢？』）提綱中規定的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工業基本投資額就說明了這一點。要知道，我們把提綱叫做控制數字提綱。同志們，好像是這樣的吧？（喊聲：『是的。』）那末，在這個提綱中是這樣說的：我們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投入工業基本建設的資金為十六億五千萬盧布。換句話說，



我們本年度投入工業的資金比上年度多三億三千萬盧布。

由此可見，我們不僅保持了工業的發展速度，而且還向前推進了一步，使工業投資比上年度多，也就是說，使工業中的基本建設工程絕對地和相對地都增加了。

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提綱的主要點就在這裏。可是有些同志看不到大象。他們只是對控制數字提綱的細節亂加批評，而最重要的東西却沒有看見。

## 二 穀物問題

我在上面所講的是提綱中的第一個基本問題——工業發展的速度問題。現在來談談第二個基本問題——穀物問題。提綱的特點是：它着重地提到整個農業特別是穀物業的發展問題。提綱的這種方針是否正確呢？我認為是正確的。早在七月全會上就已經說過，整個農業特別是穀物業的過分落後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最大弱點。

有人一講到我們的農業落後於工業，就抱怨這種情況，這當然是不嚴肅的。農業一向落後於工業，並且將來還會落後於工業。在我國工業高度集中而農業高度分散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當然，聯合的工業要比分散的農業發展得快。由此也就產生了工業對農業的領導作用。因此，農業一般落後於工業，還不能作為提出穀物問題的理由。

只有當農業的一般落後於工業變爲農業的發展速度過分落後的時候，才出現農業問題，特別是穀物業問題。目前國民經濟狀況的特點是：在不斷發展的城市和工業區對商品糧食的需求大大增長的情況下，我們面前的事實是穀物業的發展速度過分落後於工業的發展速度。在這種情況下，任務不在於把工業的發展速度降低到穀物業的發展水平（這樣會使一切混亂起來，會使發展變成倒退），而在於使穀物業的發展跟上工業的發展速度，並把穀物業的發展速度提高，到能夠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無論工業或農業）迅速前進的水平。

或者我們解決這個任務，那末穀物問題也就會得到解決；或者我們不解決這個任務，那末社會主義的城市和小農的鄉村之間的分裂就不可避免。

同志們，我們這裏的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穀物問題的實質就是這樣的。

這是不是說我們穀物業的發展現在處於『停滯狀態』，或者甚至『退化』了呢？弗魯姆金在他的第二封信裏正是這樣提出問題的。我們根據他的要求，今天已經把這封信分發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各位委員了。他在這封信裏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的農業正處於『停滯狀態』。他說：『我們不能而且不應當在報刊上談到退化，但是我們在黨內不應當掩蓋，這種落後等於退化。』

弗魯姆金的這個論斷是否正確呢？當然不正確！我們政治局委員完全不同意這個論斷，而政治局的提綱和這種對穀物業狀況問題的說明是根本不同的。

那末，退化是什麼？它在農業中應當表現於什麼地方？顯然，它應當表現於農業的後退和下降，

表現於從新的經營方式倒退到舊的中世紀的經營方式。它應當表現於農民比如說由實行三圃制改爲實行休耕制，由使用鐵犁和機器改爲使用木犁，由使用精選種子和純種種子改爲使用非精選種子和不良種子，由現代的農業文化改爲低級的農業文化，如此等等。但是，難道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諸如此類的事實嗎？每年都有幾萬幾十萬戶農民由實行三圃制改爲實行四圃和多圃制，由使用不良種子改爲使用純種種子，由使用木犁改爲使用鐵犁和機器，由低級的農業文化改爲高級的農業文化，這難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嗎？這算什麼退化呢？

弗魯姆金總是喜歡抓住某些政治局委員的片言隻字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十分可能，他這次將竭力抓住布哈林的片言隻字，以便證明布哈林在他的『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一文中『也是這樣』說的。但布哈林遠不是『也是這樣』說的。布哈林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是退化的可能性或危險性這一抽象的理論問題。抽象地說，這樣提出問題是完全可能的和合乎情理的。而弗魯姆金做的是什麼呢？他把退化的可能性這一抽象問題說成農業退化的事實了。這就是他所謂對穀物業狀況的分析！同志們，這不是很可笑嗎？

如果蘇維埃政權在它建立的第十一年竟使農業退化了，那還了得！這樣的政權應該趕走，不應該支持。如果這個政權真的使農業退化了，那末工人們早就把它趕走了。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專家向我們叫嚷退化，他們甚至睡覺都夢見農業退化。有一個時候托洛茨基向我們叫嚷過退化。我沒有料到弗魯姆金也會走上這條可疑的道路。

弗魯姆金關於退化的斷言的根據是什麼呢？首先是今年我們的穀物播種面積比去年小了些。爲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呢？也許是因爲蘇維埃政權的政策？當然不是。這是因爲烏克蘭草原地帶和北高加索部分地區의 秋播作物遭災，烏克蘭的同一地區今夏又遭了旱災。假如沒有這些完全能左右農業的不利的氣候條件，我們今年的穀物播種面積至少要比去年多一百萬俄畝。

其次，他的斷言的根據是我們今年的穀物總產量僅僅比去年稍微多一點（多七千萬普特），而小麥和黑麥比去年少了兩億普特左右。爲什麼會產生這一切情況呢？這也是因爲遭了旱災和秋播作物遭了霜災。如果沒有這些不利的氣候條件，我們今年的糧食總產量就會比去年多三億普特左右。怎麼能把旱災、霜災等等對某些地區的收成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撇開不談呢？

現在我們提出的任務是：擴大播種面積百分之七，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百分之三，增加穀物總產量約百分之十。毫無疑問，我們將採取一切辦法來完成這些任務。但是，儘管我們採取各種措施，某些地區還是有可能又突然遭到霜災或旱災，發生局部的歉收，而且這種情況可能使穀物總產量比我們計劃的數字，或者甚至比今年的總產量有一定程度的減少。這是不是說農業『正在退化』，而這種『退化』應歸咎於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呢？這是不是說我們使農民『失去了』經濟刺激，我們『剝奪了』農民的經濟前途呢？

幾年以前托洛茨基就犯過這種錯誤，硬說『下雨』對農業沒有作用。李可夫在絕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下駁斥了他。現在弗魯姆金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撇開對農業起決定作用的氣候條件，力圖把一

切都歸咎於我們黨的政策。

要提高整個農業特別是穀物業的發展速度，必須採取哪些途徑和方法呢？

必須採取的途徑或方法有三個：

(甲) 提高個體貧農、中農農戶的單位面積產量並擴大他們的播種面積；

(乙) 繼續發展集體農莊；

(丙) 擴大原有的國營農場並發展新的國營農場。

關於這些，早在七月全會的決議中就已經說過了。提綱把七月全會上說過的重複了一遍，但是把問題提得更具體，提出了這方面一定的投資數字。弗魯姆金在這裏又找到藉口來吹毛求疵了。他認為，既然把個體經濟放在第一位，而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那末這無非是表明他的觀點勝利了。同志們，這是可笑的。當然，如果從某些農業形式的比重來看問題，那就應當把個體經濟放在第一位，因為個體經濟出產的商品糧食比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幾乎多五倍。但是，如果從經濟類型，從哪一種經濟形式最接近我們來看問題，那就應當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放在第一位，因為和個體農民經濟比較起來，它們是農業的高級類型。這兩種看法對我們來說都是可以採用的，這難道還要證明嗎？

怎樣才能使我們的工作在這三方面進行，使農業首先是穀物業的發展速度在實際上提高呢？

為此首先必須使我們黨的幹部的注意力轉到農業方面來，使他們特別注意穀物問題中的具體問

題。應當拋棄關於一般農業的泛論和空談，而轉為按照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制定提高穀物業的實際措施。已經到了從言論轉為行動並研究具體問題的時候了，要研究怎樣提高個體貧農、中農農戶的單位面積產量並擴大他們的播種面積，怎樣改進並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怎樣組織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供給農民優良種子和良種牲畜方面幫助農民，怎樣通過農具租賃站用機器和其他農具幫助農民，怎樣擴大並改進預購的工作和一般農業合作社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喊聲：『這是實際主義。』）這種實際主義是我們絕對需要的，因為沒有它，我們就有把解決穀物問題這一極重要的工作淹沒在關於一般農業的空談中的危險。

中央已經決定組織我們的主要產糧區的負責工作人員在人民委員會和政治局做一些關於農業發展問題的具體報告。在這次全會上，你們將要聽到安得列也夫同志關於解決北高加索穀物問題的方法的報告。我想，以後我們還要陸續聽取烏克蘭、中央黑土地帶、伏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等地區的類似的報告。為了把黨的注意力轉到穀物問題方面來，並使我們黨的幹部轉上具體地提出和穀物問題有關的問題的軌道，這樣做是絕對必要的。

第二、必須使我們黨的農村工作人員在其實際工作中把中農和富農嚴格地區別開來，不要把他們攙在一起，不要在應該打擊富農的時候打到中農身上。現在總該是消滅這些所謂錯誤的時候了。例如拿個別稅的問題來說吧。我們的政治局的決議和有關的法令規定，個別稅的徵收面不得超過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就是說，只向最富裕的一部分富農徵收。但實際上是怎樣做的呢？有

許多地區徵收面擴大到百分之十或十二，甚至更多，因此觸犯了中農。現在還不到結束這種罪行的時候嗎？

可是我們親愛的『批評家們』不去擬定消滅諸如此類的惡劣現象的具體辦法，而去考究字眼，提議把『最富裕的一部分富農』改爲『最有實力的一部分富農』或『最上層的一部分富農』。好像這些並不是一個意思！已經證實：在我國富農約佔百分之五。已經證實：按照法令應該繳納個別稅的農戶只佔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即最富裕的一部分富農。已經證實：在實踐中許多地區違反了這個法令。而『批評家們』不去擬定消滅這些現象的具體辦法，却在字眼上進行無謂的批評，不願意了解這樣做是絲毫無濟於事的。十足的書獃子！（喊聲：『有人提議向所有的富農徵收個別稅。』）那末，這就是說應當要求廢除只向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農戶徵收個別稅的法令。可是，我倒沒有聽到有誰要求廢除關於個別稅的法令。有人說，隨意擴大個別稅徵收面的目的是爲了補充地方預算。但是，補充地方預算是不能用違反法令、違反黨的指示的方法的。我們黨還存在，它還沒有被消滅。蘇維埃政權還存在，它還沒有被消滅。如果地方預算的經費不夠，就應該提出地方預算的問題，而不應該違反法令，不應該取消黨的指示。

其次，必須繼續加強對個體貧農、中農農戶的刺激。毫無疑問，糧價的提高，革命法制的實際執行，用預購的方式給予貧農、中農農戶的實際幫助等等，將大大地增進對農民的經濟刺激。弗魯姆金認爲我們扼殺了或幾乎扼殺了這種刺激，剝奪了農民的經濟前途。這當然是胡說。如果真是這樣，那

就令人不能理解：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結合，他們的聯盟究竟依靠什麼？不能認爲這種聯盟是精神上的聯盟。終究必須了解，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打算盤的聯盟，是兩個階級的利益的聯盟，是工人和基本農民羣衆以互利爲目的的階級聯盟。很明顯，如果我們扼殺了或幾乎扼殺了對農民的經濟刺激，剝奪了農民的經濟前途，那末我們就不會有結合，就不會有工農聯盟。顯然，這裏所指的不能是「創造」或「挑起」對貧農、中農羣衆的經濟刺激，而只能是增進這種刺激，繼續加強這種刺激，使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相互有利。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提綱所指的正是這一點。

最後，必須加強對農村的商品供應。我指的一方面是消費性的商品，另一方面特別是能够提高農產品生產的具有生產性的商品（機器、肥料等等）。不能說我們在這方面一切都很好了。你們知道，商品缺乏的現象還遠沒有消除，而且大概不會很快消除。我們黨內某些人有一種錯覺，以爲我們立刻就消除商品缺乏的現象。可惜這是不對的。要知道，商品缺乏的現象，第一、是和工農生活水平的提高、對商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巨大增長有聯系的，商品的生產雖然逐年增加，但是還不能滿足全部需求；第二、是和目前的工業改造時期有聯系的。

工業的改造意味着把資金從消費資料的生產方面轉到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去。不這樣做，就沒有而且不可能有重大的工業改造，尤其在我們蘇維埃的條件下。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錢投入新企業的建設，城市和新的消費者的數量不斷地增加，而這些新企業只有在三四年以後才能出產大批新商品。不難了解，這種情況是不會有助於消除商品缺乏現象的。



這是不是說，在商品缺乏的現象面前我們只好束手待斃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問題在於我們能夠而且應當採取具體辦法來減少商品缺乏的現象。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們立即應當做到的。爲此必須竭力加強那些和提高農業生產直接有關的工業部門（斯大林格勒拖拉機製造廠、羅斯托夫農業機器製造廠、沃龍涅什選種筒製造廠以及其他等等）。其次，爲此必須盡可能地加強那些和增加稀缺商品（呢絨、玻璃、釘子等等）有關的工業部門。如此等等……

庫比雅克說，從國民經濟的控制數字看來，本年度用於個體農民經濟的款項比上年度少。我認爲這是不正確的。庫比雅克大概沒有把我們本年度用預購的方式給農民的約三億盧布的貸款（比上年度幾乎多一億盧布）計算在內。如果估計到這個情況（而這個情況是不能不估計到的），那末可以看出，我們本年度用於發展個體農民經濟的款項比上年度多。至於新舊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這方面本年度投入的資金將近三億盧布（比上年度多一億五千萬盧布左右）。

應當特別注意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預購的方法。不能把這些東西看做僅僅是擴大我們商品糧食資源的手段。它們同時還是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結合的新形式。

關於預購的方法我們已經講得很多，這一點我就不多說了。誰都明白，普遍採用預購的方法會使個體農戶所做的努力容易聯合起來，使國家和農民的相互關係固定起來，從而使城鄉結合鞏固起來。

我希望你們注意集體農莊，特別是注意國營農場，把它們看做是在新的技術基礎上促進農業改造的槓桿，是在農民的頭腦中引起革命並幫助他們擺脫因循習氣，擺脫守舊思想的槓桿。拖拉機、大

型農業機器和拖拉機隊在我們產糧區出現，對於周圍的農民經濟不會沒有作用。用種子、機器、拖拉機幫助周圍的農民，無疑會被農民評價爲並且看做是竭力引導他們走上農業大大提高的康莊大道的蘇維埃國家力量和威力的標誌。這個情況我們過去沒有估計到，現在大概也還估計不足。但是，我認爲這是目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解決穀物問題和鞏固新的結合形式方面所起的和所能起的最主要的作用。

我們在解決穀物問題方面的工作應當採取的途徑和方法大體上就是如此。

### 三 關於反對各種傾向和對這些傾向的調和態度的鬥爭

現在來談談我們提綱中的第三個基本問題——關於離開列寧路線的各種傾向問題。

各種傾向的社會基礎是：小生產在我國佔優勢，從小生產中不斷生長出資本主義分子，我們黨受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包圍以及我們黨的某些環節爲這種自發勢力所侵蝕。

各種傾向的社會基礎基本上就是如此。

所有這些傾向都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性質。

這裏指的主要是右傾。右傾究竟是什麼呢？它的趨向是什麼呢？它的趨向是遷就資產階級思想，是使我們的政策遷就「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口味和要求。

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那對我們會有什麼危險呢？就會使我們黨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資本主義分子放肆起來，使資本主義復辟或像列寧所說的『回到資本主義去』的機會增多。

右傾的趨向主要潛伏在什麼地方呢？潛伏在我們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合作社機關和工會機關中，也潛伏在黨的機關特別是黨的農村下層環節中。

我們黨員中間有沒有表現右傾的人呢？無疑是有的。李可夫舉出反對建設德涅泊水電站的沙屠諾夫斯基爲例。毫無疑問，沙屠諾夫斯基犯了右傾即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但是，我還是認爲沙屠諾夫斯基不能作爲典型來說明右傾的特徵，說明右傾的面目。我認爲在這方面第一把交椅應當讓弗魯姆金去坐。（笑聲）我指的是他的第一封信（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及在這裏已經分發給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各位委員的他的第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現在把這兩封信分析一下。我們先看第一封信的『基本論點』。

（一）『農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貧農，都有反對我們的情緒。』這是不是事實呢？顯然不是事實。如果這是事實，那末我們的結合就連一點影子都沒有了。要知道，從六月（信是在六月寫的）到現在已經快半年了，只要不是瞎子，誰都會看到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結合仍然存在並且益鞏固。弗魯姆金寫這種和事實不符的東西是爲了什麼呢？爲了恐嚇黨，使黨向右傾讓步。

（二）『最近採取的方針使中農基本羣衆感到沒有希望，沒有前途。』這是不是事實呢？完全不是事實。很明顯，如果今年春季我們已經使中農基本羣衆感到在經濟上沒有希望，沒有前途，那末所有

主要產糧區的中農就不會擴大春季播種面積了。我國春季播種是在四五月間進行的。而弗魯姆金的信是在六月寫的。在我國，在蘇維埃政權下，誰是糧食的主要收購者呢？是國家以及和國家相聯系的合作社。很明顯，如果中農羣衆苦於經濟上沒有前途，如果他們處於和蘇維埃政權「破裂」的狀態，那他們就不會按照國家這個糧食主要收購者的願望去擴大春季播種面積了。弗魯姆金的話顯然和事實不符。弗魯姆金在這裏也竭力想以沒有前途這種「恐怖」景象來恐嚇黨，使黨向他弗魯姆金的觀點讓步。

(三)『應當回到第十四次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去。』在這裏講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牛頭不對馬嘴，這是無庸置疑的。這句話的重點不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而在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的口號。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放棄『加緊向富農進攻』（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責罵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我這樣說，是因為弗魯姆金以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的口號來否認黨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到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前進的一步，而否認這前進的一步就是把黨拉向後退。中央七月全會對這個問題已經做了結論。全會在決議中直截了當地指出，企圖避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繼續向富農展開進攻』這一決定的人就是『資產階級傾向在我國的表現』。我現在直截了當地告訴弗魯姆金，政治局在七月全會的決議中所說的這一點就是指的弗魯姆金和他的第一封信。

(四)『最大限度地幫助那些加入集體經濟的貧農。』我們從來就是盡力和盡可能地給予那些加入或甚至沒有加入集體經濟的貧農以最大限度的幫助的。這裏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和第十四次代表

大會比較起來，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決議中的新東西並不是這一點，而是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全力發展集體農莊運動作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弗魯姆金嘴裏說最大限度地幫助那些加入集體經濟的貧農，實質上是對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全力發展集體農莊運動這一黨的任務敷衍推諉。弗魯姆金實質上是反對展開從集體農莊方面來加強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工作。

(五)『不要用突擊的和超突擊的方式擴展國營農場。』弗魯姆金不會不知道，我們不過剛剛開始認真地進行擴大原有的國營農場和建立新的國營農場這一工作。弗魯姆金不會不知道，如果我們有一筆用於這個事業的後備資金，那末我們在這方面所應拿出的錢要比我們現在拿出的多得多。『用突擊的和超突擊的方式』這樣的字眼，在這裏是用來引起人們的『恐怖』，並以此掩飾自己不願意稍微認真地發展國營農場。弗魯姆金實質上是在這裏反對從國營農場方面來加強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成分。

你們現在把弗魯姆金的所有這些論點彙集起來，就會得到說明右傾的一個總的概念。

現在來看一看弗魯姆金的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信不同的地方在哪裏呢？在於它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錯誤。第一封信裏說中農經濟沒有前途，而第二封信裏則說農業『退化』。第一封信裏說要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即放鬆對富農的進攻，而第二封信裏則說『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第一封信裏關於工業隻字未提，而第二封信則發揮了少向工業建設投資的『新』理論。但是，這兩封信有兩點是一致的，就是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看法是一致的。弗魯姆金在兩封信裏都反對發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顯然，第二封信加深了第一封信的錯誤。

關於「退化」的理論我已經說過了。毫無疑問，這個理論是那些一味叫喊蘇維埃政權要滅亡的資產階級專家捏造的。弗魯姆金讓那些棲身在財政人民委員部周圍的資產階級專家把自己嚇倒了，而現在他自己又企圖嚇嚇黨，想使黨對右傾讓步。關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也講得够多了，因此不必再重複了。讓我們來看看其餘兩點：關於富農經濟和關於工業的基本投資。

關於富農經濟。弗魯姆金說：「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不妨礙富農發展他們的剝削經濟。而不妨礙富農發展他們的剝削經濟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放縱農村資本主義，給它自由，讓它發展。這恰恰是法國自由主義者的老口號：「讓他做吧，讓他走吧」，就是說，不要妨礙資產階級幹自己的事，不要妨礙資產階級自由行動。

這個口號是法國的老自由主義者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在同東縛資產階級而不讓它發展的封建政權進行鬥爭的時期提出的。這樣說來，我們現在應當從社會主義的口號——「要不斷加強對資本主義成分的限制」（見控制數字提綱），轉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口號——不要東縛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怎麼，難道我們想由布爾什維克變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嗎？弗魯姆金的這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口號和黨的路綫之間能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弗魯姆金：「斯大林同志，請把其他幾點也讀出來。」）我把這一點全讀出來：「我們也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同時要和它的奴役性的剝削作鬥爭。」怎麼，可敬的弗魯姆金，難道你以為下半句話會使情況變好而不會變壞嗎？和奴役性的剝削作鬥爭是什麼意思呢？要知道，和奴役性的剝削

作鬥爭這個口號是反對封建農奴制的或半封建的剝削方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我們發動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確實提出過這個口號，並且把我們力求消滅的奴役性的剝削方式和我們當時因資產階級制度仍然存在而不能限制和消滅的非奴役性的、所謂「進步的」剝削方式區別開來。但是那時我們要建立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而現在，如果我沒有弄錯，我們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所持的方針是而且不能不是消滅一切剝削方式，其中包括「進步的」剝削方式。你怎麼能要我們從正在發展並向前推進的社會主義革命向後轉，退到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上去呢？怎麼能這樣胡說八道呢？

其次，不妨礙富農經濟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給富農自由。而給富農自由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給他們政權。法國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在要求封建政權不妨礙資產階級發展的時候，提出的具體要求就是給資產階級政權。當時他們是對的。資產階級爲了得到充分的發展，就必須要有政權。因此，如果推論下去，那就應當說：讓富農參加政權。因爲終究必須了解這一點：剝奪富農的政權而把它集中在工人階級的手中，就不能不束縛富農經濟的發展。這就是讀了弗魯姆金的第二封信自然得出的結論。

**關於工業的基本建設。**在討論控制數字的時候，我們面前有三種數字：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請求八億二千五百萬盧布，國家計劃委員會給七億五千萬盧布，而財政人民委員部只同意給六億五千萬盧布。我們黨中央對於這個問題是怎樣決定的呢？黨中央決定給八億盧布，也就是說，比財政人民

委員部提出的整整多一億五千萬盧布。財政人民委員部給得少，這當然沒有什麼奇怪，因為誰都知道財政人民委員部吝嗇，它也不能不吝嗇。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於弗魯姆金所以堅持只給六億五千萬盧布，並不是由於吝嗇，而是以新創的『可能』論為根據的。他在第二封信和在財政人民委員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的一篇專論中斷言：如果我們撥給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用於基本建設的資金超過六億五千萬盧布，那就必定會使我們的經濟事業惡化。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弗魯姆金反對保持現在工業發展的速度，看來，他不懂得降低這個速度才真的會使我國整個國民經濟狀況惡化。

你們現在把弗魯姆金第二封信裏關於富農經濟和關於工業基本建設這兩點結合在一起，加上『退化』論，你們就會看到右傾的面目了。

你們想知道什麼是右傾，右傾是什麼樣子嗎？讀一讀弗魯姆金的兩封信，研究一下，你們就會明白了。

關於右傾面目的問題就是如此。

但是，提綱不僅談到右傾，還談到所謂『左』傾。什麼是『左』傾呢？我們黨內是否真有所謂『左』傾呢？我們黨內是否有像我們提綱中所說的反中農趨向，超工業化趨向等等呢？是的，是有的。它們究竟是什麼呢？它們就是托洛茨基主義傾向。七月全會早就指出了這一點。我指的是七月全會關於糧食收購政策的著名決議，在這個決議中談到了兩條戰綫的鬥爭；反對那些從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向



後退的人（這是右派），也反對那些要把非常措施變為黨的經常方針的人（這是「左派」，是托洛茨基主義趨向）。

很明顯，我們黨內有托洛茨基主義因素和托洛茨基主義思想的趨向。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前舉行爭論的時候，好像將近有四千人投票反對我們的政綱。（喊聲：「有一萬人。」）我想，如果投票反對的黨員有一萬，那末因為沒有到會而根本沒有投票的同情托洛茨基主義的黨員該有兩萬了。這就是那些沒有退出黨的托洛茨基分子，應當認為這些人還沒有擺脫托洛茨基主義思想。此外，我認為一部分後來脫離托洛茨基組織回到黨內的托洛茨基分子還沒有來得及拋棄托洛茨基主義思想，而且他們大概也不反對在黨員中間散佈自己的觀點。最後，在我們黨的一些組織中，托洛茨基主義思想有些抬頭了。把所有這些加在一起，你們就會得到一切必要的因素來說明黨內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存在。

這是很明顯的：在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存在的情況下，在這種自發勢力向我們黨侵襲的情況下，我們黨內不會沒有托洛茨基主義趨向。逮捕托洛茨基派的骨幹或者把他們開除出黨，這是一回事。肅清托洛茨基主義思想，這是另一回事，而且是比較困難的。我們說：哪裏有右傾，那裏就必定有「左」傾。「左」傾是右傾的影子。列寧談到召回派時說過，「左派」也就是孟什維克，只不過是他們的另一面。這是完全正確的。關於現在的「左派」也應該這樣說。傾向於托洛茨基主義的人實質上就是右派，只不過是他們的另一面，是用「左的」詞句掩飾起來的右派。

因此要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既反對右傾，又反對「左」傾。

有人會說：既然「左」傾實質上就是右的機會主義傾向，那末它們之間的差別何在？兩條戰綫究竟何在？的確，既然右派獲得勝利意味着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增多，而「左派」獲得勝利也會引起同樣的後果，那末它們之間有什麼差別？爲什麼把一些人叫做右派，把另一些人叫做「左派」？如果它們之間有差別，那末差別何在？兩種傾向的社會根源是一個，兩者都是小資產階級傾向，這難道不對嗎？如果這兩種傾向獲得勝利，它們所引起的後果是完全相同的，這難道不對嗎？那末，它們之間的差別究竟何在？

差別就在於它們的政綱不同，要求和手段不同。

例如右派說，「不應當建設德涅泊水電站」，相反地，「左派」反對說，「一個德涅泊水電站建築工程對我們來說算什麼，我們要每年建設一個德涅泊水電站」，（笑聲）——應當承認，這裏顯然是有差別的。

右派說，「不要碰富農，讓他們自由發展吧」，相反地，「左派」反對說，「不僅要打擊富農，而且還要打擊中農，因爲中農也和富農一樣是私有者」，——應當承認，這裏顯然是有差別的。

右派說，「困難來了，還不是屈服的時候嗎」，相反地，「左派」反對說，「困難對我們來說算什麼，你們所說的困難我們根本不放在眼裏，——我們要開足馬力向前飛奔」，（笑聲）——應當承認，這裏顯然是有差別的。

這就是「左派」的獨特政綱和獨特手段的一幅圖畫。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左派」有時能夠用「左」的聳人聽聞的詞句誘惑一部分工人，並且能夠把自己裝扮成右派的最堅決的反對者。可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們「左派」的社會根源和右派是一樣的，他們常常和右派成立協議，結成聯盟來反對列寧的路綫。

正因爲如此，我們列寧主義者必須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既反對右傾，又反對「左」傾。

但是，既然托洛茨基主義趨向是「左」傾，這是不是說「左派」比列寧主義還左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列寧主義是世界工人運動中最左的（沒有引號的）一派。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以前的時期，我們列寧主義者是作爲社會民主黨人中的極左派加入第二國際的。我們沒有留在第二國際，我們在第二國際中宣傳分裂，是因爲我們正是極左派，不願意和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叛徒，和社會和平主義者以及社會沙文主義者處在一個黨內。

這個策略和這種思想後來就成了世界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基礎。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是唯一沒有引號的左派。因此，我們列寧主義者在自己的黨內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政黨。我們在自己的黨內不僅同那些被我們叫做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分子的人作鬥爭，而且同那些想比馬克思主義「更左」，比列寧主義「更左」，以「左的」聳人聽聞的詞句來掩飾自己右的機會主義本質的人作鬥爭。

誰都會明白，把那些還沒有擺脫托洛茨基主義趨向的人叫做「左派」，這應當了解爲諷刺。列寧

把『左派共產主義者』叫做左派，有時候加引號，有時候不加引號。但是誰都會明白，列寧把他們叫做左派，是諷刺他們；是以此着重指出他們僅僅在口頭上，在表面上是左派，而在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的趨向。

既然托洛茨基分子昨天還和公開的機會主義分子結成統一的反列寧主義的聯盟，公開而直接地和國內反蘇維埃的階層勾結起來，那他們怎麼能談得上是左派（沒有引號的）呢？『左派』和右派昨天還公開地結成聯盟來反對列寧的黨，這個聯盟顯然得到了資產階級分子的支持，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而這難道不是說明了，如果『左派』和右派沒有共同的社會根源，如果他們沒有共同的機會主義本質，他們就不能結成統一的聯盟嗎？托洛茨基分子的聯盟在一年前瓦解了。一部分類似沙屠諾夫斯基的右派分子退出了這個聯盟。因此，聯盟的右派今後將正是以右派的面目出現，而『左派』將以『左的』詞句來掩飾自己的右派性質。但是，有什麼保證能說『左派』和右派不會再攪在一起呢？（笑聲）很明顯，這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保證的。

既然我們堅持兩條戰綫鬥爭的口號，這是不是說我們這樣就是宣佈我們黨內必須有中派主義呢？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中派主義呢？你們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正是把事情說成這樣的：有『左派』，這就是『我們』托洛茨基分子，『真正的列寧主義者』；有『右派』，這就是其餘一切人；還有『中派』，他們搖擺在『左派』和右派之間。能不能認為對我們黨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呢？顯然不能。只有那些把一切概念都混淆起來的，早已離開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這樣說。只有

那些看不見和不了解戰前時期的社會民主黨（無產階級利益和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的黨）和共產黨（革命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黨）之間的原則差別的人才會這樣說。

不能把中派主義看做一個空間的概念：比如說，一個地方坐的是右派，另一個地方坐的是『左派』，而中間坐的是中派。中派主義是一個政治概念。它的思想體系是遷就的思想體系，是在一個共同的黨內使無產階級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是和列寧主義相違背的、相對立的。

中派主義對於戰前時期的第二國際來說是自然的現象。第二國際中有右派（佔多數），有左派（沒有引號的），也有中派，中派的全部政策就是以左的詞句來粉飾右派的機會主義，並使左派服從右派。

那時以布爾什維克為核心的左派的政策是什麼呢？是同中派作堅決的鬥爭，爭取同右派分裂（特別是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以後），建立由真正的左派，由真正的無產階級分子組成的革命的新國際。

為什麼那時會產生第二國際內部的這種力量配置和布爾什維克在第二國際中的這種政策呢？因為那時第二國際是迎合小資產階級社會和平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的一個無產階級利益和小資產階級利益聯盟的黨。因為那時布爾什維克不能不集中火力反對企圖使無產階級成分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中派。因為那時布爾什維克必須宣傳分裂思想，不這樣無產者就不能建立自己的一個階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

能不能斷定說，在我們共產黨內也有同樣的力量配置，在我們黨內也應當實行布爾什維克在戰前時期第二國際各黨內實行過的那個政策呢？顯然不能，是因為這就是不了解社會民主黨這個無產階級成分和小資產階級成分聯盟的黨和革命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共產黨之間的原則差別。在社會民主黨人那裏黨的階級基礎是一種，在共產黨人這裏黨的階級基礎完全是另外一種。在社會民主黨人那裏，中派主義是自然的現象，因為不同利益聯盟的黨不會沒有中派，而布爾什維克也必須採取分裂路線。在共產黨人這裏，中派主義的存在是沒有根據的，是和列寧的黨性不相容的，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黨，而不是不同階級成分聯盟的黨。

正因為我們黨的統治力量是世界工人運動中的最左派（列寧主義者），所以從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在我們黨內實行分裂政策是沒有而且不能有任何理由的。（喊聲：『在我們黨內有沒有分裂的可能？』）這裏談的不是分裂的可能性，而是在我們這個一個階級的列寧的黨內實行分裂政策，從列寧主義的觀點看來是不能認為有理由的。

誰不懂得這個原則差別，誰就是和列寧主義背道而馳，誰就是和列寧主義決裂。

正因為如此，我認為只有發了瘋的和失去了最後一點點馬克思主義的人才能當真斷定說，我們黨的政策，進行兩條戰綫鬥爭的政策是中派主義的政策。

列寧在我們黨內向來都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既反對『左派』，又反對明顯的孟什維主義傾向。看一看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看一看我們黨的歷史，你們就會知道，我們

黨是在反對兩種傾向，既反對右傾又反對「左」傾的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一方面同召回派和「左派」共產主義者作鬥爭，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期間以及在十月革命以後，同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這就是我們黨在自己的發展中所經過的階段。大家都知道列寧的一句話：我們必須進行既反對公開的機會主義又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鬥爭。

這是不是說列寧就是中派主義者，他實行了中派主義的政策呢？顯然不是這個意思。

那末，我們的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說到右傾，它當然不是戰前時期社會民主黨人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傾向還不等於是機會主義。我們知道列寧當時是怎樣解釋傾向這個概念的。右的傾向，這是一種還沒有形成機會主義的而且是可以糾正的傾向。因此，不能把右的傾向和已經形成的機會主義看成一個東西。

說到「左」傾，它是一種和戰前時期第二國際中的極左派即布爾什維克絕對相反的東西。「左」傾分子不僅不是沒有引號的左派，而且他們實質上也就是右傾分子，不過和右傾分子有差別，就是他們不自覺地以「左的」詞句來掩蓋自己的真正本質。看不到我們黨內的「左」傾分子和真正的列寧主義者這個唯一的左派（沒有引號的）之間的全部深刻差別，就是反黨的罪惡行為。（喊聲：『而使各種傾向合法化呢？』）如果同各種傾向進行公開鬥爭就是使它們合法化，那就應當承認，列寧早已使它們「合法化了」。

他們這些傾向分子，無論右派或「左派」，都是從非無產者階層的各色各樣分子中招募來的，這

些分子反映着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對黨的侵襲和黨的個別環節的腐化。一部分來自其他政黨的人，黨內具有托洛茨基主義趨向的人，從前黨內各種派別的殘餘，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合作社機關和工會機關中正在官僚主義化的（和已經官僚主義化的）並且和這些機關中明顯的資產階級分子勾結在一起的黨員，我們農村組織中和富農結合起來的富裕黨員以及其他等等，——這就是離開列寧路線的各種傾向的培養基。很明顯，這些分子不能接受任何真正左派的和列寧主義的東西。他們只能培養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或者培養以左的詞句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的所謂「左」傾。

正因為如此，進行兩條戰綫的鬥爭是黨的唯一正確的政策。

其次，提綱中說，展開思想鬥爭應當是我們同右傾作鬥爭的主要方法，這是否正確呢？我認為是正確的。這裏最好回憶一下同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的經驗。我們同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是從何着手的呢？也許是從組織處理着手的吧？當然不是！我們是從思想鬥爭着手的。這個鬥爭從一九一八年進行到一九二五年。在一九二四年，我們黨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就已經做出決議說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傾向。但是托洛茨基還留在我們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裏。這是不是事實呢？是事實。可見我們「容忍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留在中央。為什麼我們容許他們留在黨的領導機關呢？因為當時托洛茨基分子雖然和黨有分歧，對中央的決議還是服從的，對黨還是忠順的。什麼時候我們才開始比較大規模地進行組織處理呢？只是在托洛茨基分子組織了派別，成立了自己的派別中央，把自己的派別組織變為新的黨並開始號召人們舉行反蘇維埃遊行以後。



我認爲我們同右傾作鬥爭也應該走這條道路。雖然右傾正在黨內增長，但是目前還不能把它看做一種已經形成和定形的東西。它僅僅是在形成和定形中。右傾分子有沒有派別組織呢？我認爲沒有。不能說他們不服從我們黨的決議呢？我認爲我們還沒有根據拿這一點來責備他們。能不能斷言右傾分子一定會組織自己的派別呢？我對這一點是懷疑的。因此結論是：展開思想鬥爭應當是我們現階段同右傾作鬥爭的主要方法。這個結論所以正確，尤其是因爲在我們某些黨員中間有着相反的趨向；同右傾作鬥爭不從思想鬥爭着手，而從組織處理着手。他們直截了當地說：你給我們指出十個二十個右傾的人吧，我們一轉眼就會把他們粉碎，這樣就剷除了右傾。同志們，我認爲這種情緒是不對的和危險的。正是爲了不致隨着這種情緒東飄西流，爲了把反對右傾的鬥爭引上正確的軌道，必須明確而堅定地指出：思想鬥爭是我們現階段同右傾作鬥爭的主要方法。

這是不是說我們排斥任何組織處理呢？不，不是這個意思。但毫無疑問這是說，組織處理在這裏應起從屬作用；如果右傾分子沒有破壞黨的決議，我們就不應當把他們趕出這些或那些領導組織和領導機關。（喊聲：「莫斯科的實際情況呢？」）

我認爲莫斯科的領導同志中間未曾有過右傾分子。那裏有過對右傾情緒的不正確的態度。甚至可以說，那裏有過調和趨向。但是我不能說，莫斯科委員會中有過右傾。（喊聲：「組織鬥爭不是有過嗎？」）

組織鬥爭是有過的，雖然佔着從屬地位。有過這種鬥爭是因爲莫斯科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進行

改選，而且各區積極分子會議有撤換他們的書記的權利。（笑聲）（喊聲：『難道我們宣佈過改選書記嗎？』）誰也沒有禁止過改選書記。中央的六月宣言明確指出，如果不能保證下層組織有撤換任何書記和任何委員會的權利，那末開展自我批評就會成爲空談。你能用什麼話來反對這樣的宣言呢？（喊聲：『在黨代表會議以前嗎？』）是的，即使在黨代表會議以前。

我看到某些同志的臉上流露出卜者的笑容。同志們，這是不好的。我看到你們中間有些同志迫切地盼望儘快撤銷某些表現右傾的人的職務。但是，親愛的同志們，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當然，撤銷職務比進行廣泛而周密考慮的關於右傾、右傾危險以及反右傾鬥爭的解釋運動要容易。但是不能認爲最容易的就是最好的。要努力組織廣泛的反對右傾危險的解釋運動，不要吝惜時間，這樣你們就會看到，運動愈廣泛愈深入，對右傾就愈不利。所以，我認爲思想鬥爭應當是我們反右傾鬥爭的中心環節。

至於說到莫斯科委員會，我不知道對於烏格蘭諾夫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做結論時所說的話還能做些什麼補充。他坦白地聲明：

『如果稍微回憶一下歷史，回憶下一九二一年我在列寧格勒和季諾維也夫作戰的情形，就會知道當時「激戰」的規模比現在大些。當時我們戰勝了，因爲我們是對的。現在我們打敗了，因爲我們錯了。這對我們是會有益的。』

可見烏格蘭諾夫現在進行了鬥爭，如同他當時進行過反對季諾維也夫的鬥爭一樣。但是他最近

進行鬥爭究竟是反對誰呢？看來是反對中央的政策。還能是反對誰呢？這個鬥爭在什麼基礎上才能進行呢？顯然是在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基礎上。

因此，提綱完全正確地強調必須反對對離開列寧主義路線的各種傾向採取調和態度，特別是反對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認為這是我們黨的當前任務之一。

最後一個問題。提綱中指出，我們目前應當特別強調同右傾作鬥爭的必要性。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右傾危險在目前是我們黨內的主要危險。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趨向的鬥爭，並且是集中火力的鬥爭，我們已經進行了十年。這個鬥爭的結果是擊潰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基本骨幹。不能說，反對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最近也進行得同樣激烈。這種鬥爭所以沒有進行得特別激烈，是因為右傾在我們這裏還處在形成和定形的時期，它由於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加強（與我們的糧食收購困難有關）而正在加強和增長起來。所以主要的打擊應當對準右傾。

同志們，我在結束講話之前還想指出一個在這裏沒有談到的事實，這個事實在我看來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們政治局委員向你們提出了控制數字提綱。我在演說中維護了這個提綱，說它是絕對正確的。我不談對這個提綱可能提出的個別修正。但是，這個提綱基本上是正確的，能保證我們正確執行列寧的路綫，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這裏我應當向你們聲明，這個提綱是我們在政治局內一致通過的。我認為這個事實多少有些意義，因為一切對我們黨不懷好意的人，反對我們黨的人以及我們黨的敵人不時在我們隊伍裏散佈謠言。我指的謠言是：似乎我們政治局內有右傾、『左』傾、調和態度

以及鬼才曉得的其他什麼東西。就讓這個提綱作爲我們全體政治局委員團結一致的再一次，第一百次或第一百零一次的證明吧。

我希望這次全會同樣一致地通過這個提綱作爲基礎。（鼓掌）

載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真理報」第二七三號

# 給斯摩稜斯克省「線軸」工廠的工人和 雅爾采沃工廠的工人

〔美云〕

祝賀你們在組織更好地進行蘇維埃選舉運動的競賽方面的創舉。

工人階級專政的機關——蘇維埃的選舉應當是工人自己切身的事情。

你們參加選舉運動不能只限於以應有的態度，按布爾什維克的方式在本市進行選舉，進行市蘇維埃選舉。

更困難的但是同樣必要的任務是直接參加農村中的選舉運動。蘇維埃選舉的結果將大大取決於城市工人階級和農村僱農、貧農如何參加運動和影響運動的進程，引導中農和排擠富農，從而保證工人階級在農村中的領導。因此，你們所倡導的發動工人廣泛參加選舉運動的挑戰大會將有很大的意義。

祝你們成功。

約·斯大林

獻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真理報」第二七四號

# 給『紅色工會國際』工廠的工人

(別日察市)

向『紅色工會國際』工廠的工人致兄弟的敬禮。祝賀你們接受了『線軸』工廠和雅爾采沃工廠工人的挑戰。祝你們在進行蘇維埃改選運動中獲得成功。請原諒我不能到你們的工廠去。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載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真理報』第二七八號

# 紀念伏龍芝工農紅軍軍事學院十周年

值此伏龍芝軍事學院十周年紀念日，謹向伏龍芝軍事學院致衷心的祝賀。  
祝它成功和進一步繁榮。

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九日  
「真理報」第二八六號

# 論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危險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主席團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莫洛托夫同志已經在這裏說明了聯共(布)代表團的看法，因此，我要說的只有幾句話。我想談一談，而且是簡單地談一談在討論過程中發現的三個問題。

這些問題是：資本主義穩定問題，在穩定日趨動搖的情況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問題以及德國共產黨問題。

很抱歉，我必須肯定說，在所有這三個問題上，洪別爾、德羅和謝拉兩人都滾到怯懦的機會主義的泥潭裏去了。固然，洪別爾、德羅現在只就形式上的問題發表了意見。但我指的是他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討論德國共產黨內右傾分子和調和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所發表的那篇帶原則性的演說。我認爲這篇演說正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中少數人在這次會議上所持有的立場的思想基礎。因此，對洪別爾、德羅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會議上所發表的這篇帶原則性的演說不能避而不談。



我說洪別爾—德羅和謝拉滾到怯懦的機會主義的泥潭裏去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除了公開的機會主義以外，還有隱蔽的、害怕暴露自己真面目的機會主義。這也就是對右傾採取調和態度的機會主義。調和主義就是怯懦的機會主義。再說一遍，很抱歉，我必須肯定說，我們這兩位同志滾到怯懦的機會主義的泥潭裏去了。

讓我用一些事實來證明這一點。

## 一 資本主義穩定問題

共產國際認為，目前資本主義的穩定是暫時的、不鞏固的、動搖的和腐朽的穩定，這種穩定在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發展的進程中將愈來愈動搖。

這同資本主義的技術和合理化正在發展這個人所共知的事實毫不矛盾。而且穩定的內在的腐朽性和軟弱性正是在這種發展的基礎上增長起來的。

而洪別爾—德羅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發表的演說中向我們說了些什麼呢？他完全否定穩定的動搖性和不鞏固性。他在自己的演說中直截了當地宣稱：「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實際上斥責了關於穩定是腐朽的動搖的等等一般性的含糊的說法。」他直截了當地宣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論述第三個時期的著名條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到穩定的動搖性。能不能認為洪別爾—德羅的這種論斷是

正確的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為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所斷定的正好和洪別爾·德羅在他的演說中所說的完全相反。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論述第三個時期的那段話中直截了當地說：

「這個時期（即第三個時期。——斯大林註）必然會經過資本主義穩定本身矛盾的進一步發展而走向資本主義穩定的進一步動搖。」<sup>①</sup>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急劇尖銳化。」<sup>②</sup>

請注意：「穩定的進一步動搖……」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穩定現在已經動搖和不鞏固了，它在第三個時期的條件下將更加動搖。而洪別爾·德羅竟敢嘲笑所有那些宣稱穩定具有動搖性和腐朽性的人，所有那些宣稱目前工人階級的鬥爭正在沖毀並瓦解資本主義穩定的人，其中包括德國共產黨。洪別爾·德羅嘲笑的是誰呢？顯然是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

由此可見，洪別爾·德羅實際上是打着捍衛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的幌子來修正這些決議，因而墮落到以機會主義的觀點來理解穩定的地步。

從形式方面看，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來分析問題的實質。如果目前的穩定不能說是動搖的、腐朽的或不鞏固的，那末它究竟是怎樣的呢？那就只有承認它是鞏固的，至少是正在加強的。但是，如果我們遇到的是正在加強的資本主義的穩定，那末所謂世界資本主義危機正在尖銳化和加深又作何解釋呢？在這裏不可能有資本主義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危機的加深，這不是很明顯嗎？洪別爾—德羅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地步，這不是很明顯嗎？

其次，列寧說過，在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雙重的過程：一方面是某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增長，另一方面是其他一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腐朽。列寧的這個論點是否正確呢？如果正確，那末資本主義的穩定就不能不是腐朽的，這不是很明顯嗎？

最後，略為談談幾個大家知道的事實。

我們看到這樣的事實：各帝國主義集團正在拚命爭奪商品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市場。

我們看到這樣的事實：各資本主義國家正在瘋狂地擴充軍備，締結新的軍事同盟，公然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

我們看到這樣的事實：兩個巨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和英國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它們竭力把其他一切國家拉進自己的控制範圍。

最後，我們看到這樣的事實：有蘇聯存在，蘇聯各方面的建設，無論經濟方面或政治、文化方面，都在發展並獲得很大的成就；單是蘇聯的存在（更不用說它的發展）就在動搖和瓦解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

既然如此，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怎麼能斷言資本主義的穩定不是動搖的和腐朽的，不是逐年逐日被事物進程本身動搖着呢？

洪別爾—德羅以及謝拉是否會想到他們滾到什麼樣的泥潭裏去了呢？

洪別爾、德羅和謝拉的其他錯誤都是和這個錯誤有聯系的。

## 二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問題

洪別爾、德羅對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以及鬥爭的性質和作用問題的看法也是錯誤的。從洪別爾、德羅在政治書記處會議上的演說中可以看出，工人階級的鬥爭，工人階級對資本家的自發搏鬥，基本上只帶有防禦的性質，共產黨只應當在現有改良主義工會的範圍內領導這一鬥爭。

這對不對呢？不，不對。這樣斷言就是做了事變的尾巴。洪別爾、德羅忘記了，目前工人階級的鬥爭是在穩定日趨動搖的基礎上進行的，工人階級的鬥爭往往帶有遭遇戰的性質，帶有向資本家反攻和正面進攻的性質。洪別爾、德羅沒有看到最近時期工人階級鬥爭中任何新的東西。他沒有看到這樣的一些事實，如洛茲的總罷工，法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爭取改善勞動條件的經濟罷工，德國在反對以同盟歇業對付五金工人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力量的大動員，以及其他等等。

諸如此類的事實說明了什麼呢？預告了什麼呢？說明並預告了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運動新的革命高潮的前提正在增長。這也就是洪別爾、德羅和謝拉沒有看到和沒有注意到的新東西，也就是那些慣於向後看而不向前看的同志們永遠不會注意到的新東西。

向後看而不向前看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做事變的尾巴，看不見事變中的新東西，陷於突然受敵的境地。這就是放棄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德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一九二三年革命時期也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碰了釘子。因此，誰不願意重複一九二三年的錯誤，誰就應當喚醒共產黨員並號召他們前進，誰就應當準備羣衆去迎接即將到來的戰鬥，誰就應當採取一切辦法使共產黨不致成爲事變的尾巴，使工人階級不致陷於突然受敵的境地。

非常奇怪，洪別爾、德羅和謝拉竟把這一點忘記了。

在魯爾鬥爭的時期，德國共產黨人肯定了一件大家知道的事實：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比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更加革命。洪別爾、德羅因此大怒，硬說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真奇怪！爲什麼不可能有？在魯爾約有一百萬工人。其中組織在工會裏的約有二十萬。領導工會的是那些和資本家階級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官僚主義改良分子。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比組織起來的工人更加革命，那有什麼奇怪呢？難道還能不是這樣嗎？

我可以告訴你們俄國革命運動史中的一些更加「奇怪的」事實。我們的羣衆往往比自己的（某些）共產黨員領袖更加革命。俄國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列寧說不僅要教育羣衆，而且還要向羣衆學習，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的。值得奇怪的不是這些事實，而是洪別爾、德羅不懂得革命實踐中這些簡單的道理。

關於謝拉也必須這樣說。他不贊成德國共產黨人在爲組織那些遭到同盟歇業襲擊的五金工人而

進行的鬥爭中越出現有工會的範圍，打破這個範圍。他認為這就是違反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sup>〔五〕</sup>。他硬說，工會國際指示共產黨人只在工會內進行工作。同志們，這是胡說！工會國際根本沒有做過這一類指示。這樣說，就是一定要共產黨去扮演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消極觀望者的角色。這樣說，就是埋葬共產黨在工人運動中的領導作用的思想。

德國共產黨人的功績正是在於他們沒有讓「工會範圍」的胡說把自己嚇倒，他們越出了這個範圍，違反工會官僚主義分子的意志而把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德國共產黨人的功績正是在於他們尋找並摸索到了爭取沒有組織起來的工人並把他們組織起來的新形式。可能他們同時也犯了一些非本質的錯誤。但是搞新的工作是決不會不犯錯誤的。既然只有改良主義的工會是羣衆性的組織，那末我們就應當在這些工會中進行工作，但是由此完全不應該得出結論說，我們必須把羣衆工作局限於改良主義工會中的工作，我們必須做這些工會的規範和要求的奴隸。既然改良派的領導和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參看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工人階級正在對資本主義進行鬥爭，那末能不能斷言，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階級進行鬥爭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打破現有工會的改良主義範圍呢？顯然，不陷入機會主義，就不能這樣斷言。因此，完全可以設想有這樣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必須違反那些賣身於資本家的工會頭子的意志而成立平行的工人階級的羣衆性組織。我們知道美國已經有了這種情況。完全可能，德國也會這樣。

### 三 德國共產黨問題

德國共產黨不要作爲一個有組織的、團結一致的、內部有鐵的紀律的政黨而存在，——同志們，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這不僅是關於右傾分子或調和分子的問題，而且是關於德國共產黨本身存亡的問題。德國共產黨存在着。但是同時在德國共產黨內還存在着從內部瓦解黨並威脅黨的生存的兩種力量。第一、這是右派，它在共產黨內組織了一個有自己的中央和自己的報刊的新的反列寧主義政黨，並且天天在破壞黨的紀律。第二、這是調和派，它以自己的動搖來加強右派。

我不想來證明右派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且拚命反對共產國際。這是早已證實了的。我也不想來證明調和派破壞第六次大會關於不斷同右傾分子作鬥爭的著名決議。這也是早已證實了的。現在的問題是：不能再容忍德國共產黨內的這種情況了。問題是：當右傾分子正在散播社會民主黨腐朽的思想毒素並且不斷破壞黨的紀律的基本原則，而調和分子還給右傾分子幫忙的時候，繼續容忍這種「秩序」就是反對共產國際，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起碼要求。

現在所造成的情況，和聯共（布）在同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的後一階段（當時黨和共產國際不得不把托洛茨基分子逐出自己的隊伍）的情況一樣，甚至更壞。這一點現在大家都已經看到。可是洪別爾、德羅和謝拉沒有看到，或者假裝沒有看到。這就是說，他們甘願支持右傾分子和調和分子，甚至

不惜以德國共產黨的完全瓦解爲代價。

洪別爾、德羅和謝拉在反對開除右傾分子的時候，引證第六次代表大會的著名決議，這個決議規定必須用思想鬥爭方式克服右傾。這是完全對的。但是這些同志忘記了，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根本沒有把共產黨反對右傾危險的鬥爭局限於思想鬥爭的方式。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關於布哈林的報告的決議中，講到對離開列寧路綫的傾向進行思想鬥爭的辦法時說：

「這不僅不排除全力加強黨內鐵的紀律，少數無條件服從多數，下級機關以及黨的其他組織（國會黨團、工會黨組、報刊等等）無條件服從黨的中央，而且是以此爲前提的。」（一九二〇）

非常奇怪，洪別爾、德羅和謝拉忘記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中的這一論點。非常奇怪，所有的調和分子，無論承認自己是調和分子的人或者不承認這個稱號的人，在引證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時總是忘記共產國際的這一重要論點。

我們在德國共產黨內所看到的不是全力鞏固黨內鐵的紀律，而是右傾分子以及一些調和分子肆無忌憚地破壞一切紀律，對於這種令人憤怒的事實該怎麼辦呢？不能再容忍這種情況呢？

我們在德國共產黨內所看到的不是下級機關、工會黨組和黨的某些報刊無條件服從黨的中央，而是右傾分子以及一些調和分子最粗暴地違反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這一要求，對於這種令人

◎ 渣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憤怒的事實該怎麼辦呢？

不能再容忍這種情況呢？

你們都知道第二次代表大會所批准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五〕。我說的就是那二十一個條件。其中第一條說：『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刊物以及黨的一切出版機關必須完全服從黨的中央委員會；不論整個黨在目前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你們知道，右派有兩個報刊。你們知道，這些報刊對於任何服從德共中央的話連聽都不願意聽。試問，不能再容忍這種惡劣現象呢？

二十一個條件的第十二條說，黨必須『按最集中的方式組織起來』，黨內必須『有近乎軍事紀律的鐵的紀律』〔六〕。你們知道，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分子除了自己的、派別組織的紀律以外，既不願意承認鐵的紀律，也不願意承認其他任何紀律。試問，不能再容忍這種惡劣現象呢？

也許你們會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批准的那些條件對右傾分子沒有約束力吧？

洪別爾、德羅和謝拉在這裏大叫大嚷，捏造說有人破壞共產國際決議。現在我們看到右傾分子就是共產國際基本原則的真正的（而不是臆造的）破壞者。爲什麼他們默不作聲呢？這不是因爲他們想開口頭上捍衛共產國際決議的形式來捍衛右傾分子並修正這些決議嗎？

謝拉的聲明是特別有趣的。他賭咒發誓，說他反對右傾分子，反對調和分子等等。但是他由此做

出的結論是什麼呢？你們以為是同右傾分子和調和分子作鬥爭嗎？一點也不是！他由此做出極端奇怪的結論說，他認為必須改組現在的德共中央政治局。

請你們想一想吧：德共中央政治局對右傾危險和調和分子的動搖進行着堅決的鬥爭；謝拉主張對右傾分子和調和分子進行鬥爭；因此，謝拉提議不要觸犯右傾分子和調和分子，而要放鬆對右傾分子和調和分子的鬥爭並以調和主義的精神更換德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員。這就叫做『結論』！

請謝拉原諒我在這裏直言不諱地說，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就像那些企圖顛倒黑白的鄉下辯護士的立場。這也就叫做替機會主義分子做辯護士的辯護。

謝拉提議改組德共中央政治局，也就是說，撤換一些人，用另外一些人去代替他們。為什麼謝拉不直率地公開地說出用誰去代替。（謝拉：『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要誰去，就用誰去代替。』）但是，第六次代表大會根本沒有提議為調和分子辯護。恰恰相反，大會責成我們不斷地向調和主義進行鬥爭。正因為調和分子沒有負起這個責任，所以第六次代表大會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九二八年十月六日通過了一個關於右傾分子和調和分子的著名決議。謝拉想充當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的唯一解釋人的角色。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謝拉的這種奢望是有根據的。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的解釋人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我看謝拉是不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十月六日的決議的，雖然他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出這一點。

結論是什麼呢？結論只有一個：洪別爾、德羅和謝拉在德國共產黨問題上的立場就是替右傾分子

做怯懦的辯護士的辯護而反對德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

#### 四 德共黨內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分子

今天我從幾個人的發言中知道，德國某些調和分子爲了給自己辯護，引證了我在聯共（布）中央十一月全會上的演說<sup>①</sup>中關於同右傾分子鬥爭的方法問題的話。大家知道，我在演說（已經發表）中斷定說，在聯共（布）黨內對右傾危險展開鬥爭的現階段，思想鬥爭是主要的鬥爭方法，但是這並不排斥在個別情況下採用組織處理。我這個論點的根據是：聯共（布）黨內的右派還沒有定形，還不是一個集團或派別組織，還沒有一次違反過或不執行聯共（布）中央的決議。我在演說中斷定說，如果右傾分子轉上派別鬥爭的立場並且開始破壞聯共（布）中央的決議，那末我們就要像一九二七年對付托洛茨基分子那樣對付他們。看來是很清楚了。而德國右傾分子已經轉而採取派別鬥爭的手段並且一貫破壞德共中央的決議，德國調和分子還沒有，看來也不想和右傾的派別組織斷絕關係，那末引證我的演說，把它當做對德國右傾分子有利的論據，當做對德國調和分子有利的論據，豈不是愚蠢嗎？我認爲不能想像再有比這種引證更愚蠢的事了。只有違反邏輯的人才不能明白聯共（布）黨內右傾分

① 見本卷第二二二頁至第二四九頁。——編者註

了的情況和德共黨內右傾分子的情況之間的全部深刻的差別。

事實上，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分子還不是一種派別組織，他們無疑是忠順地執行聯共（布）中央的決議的。相反地，德國的右傾分子已經形成了以自己的中央爲首的派別組織，並且一貫踐踏德共中央的決議。現階段對右傾分子鬥爭的方法在這兩個黨內是不能一樣的，這不是很明顯嗎？

其次，在我們蘇聯沒有社會民主黨這樣一個能培養和刺激聯共（布）黨內右傾危險的有組織的嚴重的力量。相反地，在德國，在共產黨的旁邊存在着更強大的和組織得相當鞏固的社會民主黨，它培養德國共產黨的右傾並使右傾在客觀上變爲它的代理人。只有瞎子才會看不見蘇聯的情況和德國的情況之間的全部差別，這不是很明顯嗎？

最後，還有一種情況。我們的黨是在同孟什維克進行極殘酷的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並且這種鬥爭有好幾年採取了同他們進行直接的國內戰爭的形式。不要忘記，我們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時是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作爲反革命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左翼推翻的。這也就說明了，爲什麼世界上無論哪裏，無論哪一國的共產黨對公開的機會主義進行鬥爭的傳統都不像聯共（布）那樣深。只要回憶一下莫斯科組織特別是莫斯科委員會發生過某種程度的調和主義的動搖，只要回憶一下莫斯科的工人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一下子就糾正了莫斯科委員會的路綫，——只要回憶一下這些情況，就會明白在我們黨內對公開的機會主義進行鬥爭的傳統是多麼深。

關於德國共產黨能不能也這樣說呢？很可惜，不能這樣說，這一點你們大概是會同意的。而且我

們不能否認，德國共產黨還遠沒有擺脫那些培養德共黨內右傾危險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

德國的條件和蘇聯的條件就是如此。這些條件說明，不同的條件決定了聯共（布）黨內和德共黨內對右傾危險進行鬥爭應該採取不同的方法。

只有失去了馬克思主義者起碼的敏感的人才不能明白這種簡單的道理。

在聯共（布）中央十一月全會決議（三）起草委員會上，有些同志建議把決議的基本原理也應用到共產國際其他的支部中去，其中包括德國支部。我們否決了這個建議，聲明德共黨內對右傾危險進行鬥爭的條件和聯共（布）黨內鬥爭的條件是根本不同的。

## 五 關於秘密信和公開信的草案

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各委員會提出的決議草案我要說兩句話。謝拉認為這些草案帶有地方決議的性質。試問爲什麼呢？原來是因爲在公開信的草案中沒有分析產生右傾危險的政治情況。

同志們，這是可笑的。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我們已經做了這樣的分析。需要重複一遍嗎？我認爲不必重複。本來我們可以只限於寫一個簡短的決議，說明右傾分子一貫破壞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因而應該被開除，說明調和分子不同右派作鬥爭，因而應該受到極嚴重的警告。

但是我們這個決議寫得並不簡短，這是爲了向工人解釋右傾的實質，向他們揭露布蘭德勒之流

和塔爾蓋麥之流的真面目，向他們指出這兩種人過去是怎樣的人，現在又是怎樣的人，說明共產國際怎樣長期寬容了他們，希望把他們糾正過來，說明共產黨員怎樣在自己的隊伍裏長期容忍了他們；並說明爲什麼現在不能再容忍這樣的人留在共產國際中了。

正因爲如此，決議草案的篇幅比最初所能預料的要大些。

莫洛托夫同志在這裏已經說過，聯共（布）代表團同意這些決議草案。我只能重複一遍莫洛托夫同志的聲明。

載於一九二八年『布爾什維克』雜誌  
第二十三、二十四兩期合刊

# 答庫什特謝夫

庫什特謝夫同志！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來信收到了。

你的問題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正確的。實際上它經不起任何的批判。不難了解，列寧說『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並不是要說明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將有怎樣一種政權，也不是要說明如果我們認真地實行國家電氣化，就等於已經實現共產主義了。

列寧講這句話是要說明什麼呢？在我看來，他不過是要說明：要走向共產主義，單靠蘇維埃政權是不够的；要走向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必須使國家電氣化，使整個國民經濟轉到大規模的生產；爲了達到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決心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列寧的這句名言只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通過電氣化走向共產主義。

我們常常說，我們的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不是說我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並取消了國家（因爲社會主義的實現意味着國家的消亡）？或者，這是不是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會有階級、國家等等存在？顯然不是這個意思。既然如此，我們有沒有權利把我們的共和國叫做社

會主義共和國呢？當然有。這是從什麼樣的觀點來看的呢？這是從我們決心和準備實現社會主義、消滅階級等等的觀點來看的。

庫什特謝夫同志，也許你同意聽聽列寧對這個問題的意見吧？如果同意，就請聽吧：

「看來，還沒有一個專心研究俄國經濟問題的人否認過這種經濟的過渡性質。看來，也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否認過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個名稱是表明蘇維埃政權有決心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決不是表明承認新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〇二頁）

看來已經清楚了。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刊印



## 墮落到極點了

最近托洛茨基秘密組織的全部活動，迫使黨和蘇維埃政權對托洛茨基派採取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前原則上不同的態度，因此，必須十分明確地提出關於托洛茨基秘密組織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托洛茨基派在街頭的公開發動，是托洛茨基組織表示它不僅破壞黨的原則，而且也破壞蘇維埃制度的轉折點。

在這次發動以前，已經有過多次反黨、反蘇維埃的行動：強佔國家房屋（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開會，設立秘密印刷所等等。但是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前，黨對托洛茨基組織所採取的辦法，證明明黨的領導還是希望爭取托洛茨基分子改過自新，爭取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回到黨的原則上來。從一九二三年的爭論開始，黨在幾年中耐心地執行了這條路綫——主要是思想鬥爭的路綫。甚至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所談的也正是用這種辦法來對付托洛茨基組織，雖然托洛茨基派『已經從策略性的分歧轉到綱領性的分歧，修正列寧的觀點，滾到孟什維主義的立場上去了』（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13)。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的一年，表明了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把托洛茨基派中的積極分子開除出黨

的決定是正確的。在一九二八年內，托洛茨基派從反黨的秘密集團完全變成了反蘇維埃的秘密組織。這就是迫使蘇維埃政權機關在一九二八年內對這一反蘇維埃秘密組織的積極分子採取鎮壓手段的新情況。

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機關不能容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有反蘇維埃的秘密組織存在，雖然這個組織的人數極少，但是它畢竟擁有自己的印刷所和自己的委員會，企圖組織反蘇維埃的罷工；居然準備自己的擁護者進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內戰。托洛茨基派正是墮落到了這種地步，他們從前是黨內的派別組織，現在已經成爲反蘇維埃的秘密組織了。

很明顯，國內一切反蘇維埃分子、孟什維克都同情托洛茨基派，現在都聚集在托洛茨基派的周圍。

托洛茨基派反對聯共（布）的鬥爭是有它的邏輯的，這個邏輯把托洛茨基派引到反蘇維埃的陣營裏去了。托洛茨基首先是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建議他的同夥要打擊聯共（布）的領導而不要把自己和蘇聯對立起來。但是這種鬥爭的邏輯給托洛茨基造成的結果是：他對聯共（布）的領導的打擊，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領導力量的打擊，必不可免地轉爲對無產階級專政本身、對蘇聯、對我們整個蘇維埃社會的打擊了。

托洛茨基分子企圖用一切辦法破壞領導國家的黨以及蘇維埃政權機關在工人階級心目中的威信。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那封寄到國外的不僅在叛徒馬斯洛夫的報刊上而且在白衛

分子的報刊（『舵報』<sup>〔三三〕</sup>等）上登載的指示信中，發表了一個誣騙性的反蘇維埃聲明，說蘇聯現存的制度是『克倫斯基統治的另一面』，他號召組織罷工和破壞集體合同運動，並在實際上準備他的幹部迎接可能發生的新內戰。

另一些托洛茨基分子公開說，在準備內戰這件事上，不應當『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受任何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束縛』。

托洛茨基派在秘密報刊和外國叛徒的報刊上，並通過這些報刊在國外白衛分子的報刊上散播的誹謗紅軍及其領導者的謠言，證明托洛茨基派不惜公開唆使國際資產階級來反對蘇維埃國家。紅軍及其領導者們在這些文件中被說成是未來的拿破崙政變的軍隊。同時，托洛茨基組織一方面到處建立自己的派別組織，企圖分裂共產國際的支部，瓦解共產國際的隊伍，另一方面唆使本來就敵視蘇維埃國家的分子反對蘇聯。

托洛茨基派著作中的革命詞句已經掩蓋不住托洛茨基派口號的反革命本質。由於發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亂，列寧在黨的第十次大會上向黨提出警告說，連『白衛分子都竭力裝扮而且善於裝扮成共產黨人，甚至裝得比共產黨人「更左」，只求削弱並推翻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堡壘』。列寧當時就舉例說明孟什維克怎樣利用俄共（布）黨內的意見分歧，以便實際上鼓舞並支援在喀琅施塔得叛亂的社會革命黨人和白衛分子，而在叛亂失敗的時候則表示自己是蘇維埃政權的擁護者，只不過要做一些彷彿不大的修正<sup>〔三四〕</sup>。托洛茨基派的秘密組織已經充分證明：它是這樣一種偽裝的組織，這種組織日

前正在把一切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圍。現在托洛茨基組織實際上扮演着當時孟什維克黨在蘇聯所扮演的反對蘇維埃制度的那個角色。

托洛茨基組織的破壞活動使蘇維埃政權機關必須對這個反蘇維埃組織進行無情的鬥爭。這也就說明爲什麼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最近採取了一些消滅這個反蘇維埃組織的措施（逮捕和放逐）。

看來還遠不是所有的黨員都清楚地了解到，在過去聯共（布）黨內的托洛茨基反對派和現在聯共（布）黨外的托洛茨基反蘇維埃秘密組織之間已經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可是已經是了解並領會這個很明顯的真理的時候了。因此，個別黨員有時表現出來的對托洛茨基秘密組織的積極分子的『自由主義』態度是完全不能容許的。全體黨員必須領會這一點。而且必須向全國，向廣大工農階層說明：托洛茨基非法組織是反蘇維埃的組織，是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組織。

讓那些站在半路上的托洛茨基分子也考慮一下他們的首領和托洛茨基反蘇維埃秘密組織的活動所造成的這種新情況吧。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跟着托洛茨基反蘇維埃秘密組織反對聯共（布）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同托洛茨基派的反蘇維埃秘密組織完全斷絕關係，完全拒絕給這個組織以任何援助。

# 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和二月初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

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的發言節錄)(簡要記錄)

同志們！不管多麼令人痛心，也不得不確認一個事實，就是我們黨內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團。過去黨一點也不知道有這個集團存在，因為布哈林分子對黨嚴密地隱瞞了這種集團存在的事實。但是現在這已經是盡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了。

從這個集團的聲明中可以看出，它有自己的、和黨的政策相對抗的特殊政綱。第一、它違反黨的現行政策，要求降低我國工業發展的速度，硬說現在的工業發展速度會『招致滅亡』。第二、它也違反黨的政策，要求收縮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建設，斷言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我國農業發展中不起也不能起重大作用。第三、它也違反黨的政策，要求規定私人貿易完全自由並放棄國家在貿易方面的調節作用，斷言國家的調節作用使貿易不可能發展。

換句話說，布哈林集團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集團，它不主張消滅城鄉資本主義成分，而主張讓它自由發展。

同時，布哈林集團反對富農採取非常措施，反對向富農徵收「過高的」稅，放肆地責備黨，說黨採取這些措施實際上就是「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布哈林所以需要這種可笑的責備是為了保護富農，把勞動農民和富農攪在一起，混為一談。

布哈林集團要求黨按照它的政綱的精神根本改變黨的政策。它並且聲明：如果黨的政策不改變，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就要辭職。

這次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在討論過程中弄清楚的事實就是如此。

此外還弄清楚了：布哈林受這個集團的委託，曾經和加米涅夫進行幕後談判，以便組織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聯盟來反對黨和黨中央。看來，布哈林分子並不指望他們的政綱會在我們黨中央取得勝利，所以認為必須背着黨中央來組織這種聯盟。

過去我們是否有過意見分歧呢？是的，是有過的。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一次爆發是在中央七月全會（一九二八年）以前。當時的意見分歧也是發生在這些問題上：關於工業發展的速度，關於團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關於私人貿易的完全自由，關於對富農的非常措施。但是，當時全會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通過了共同的一致的決議。當時我們都認為布哈林及其擁護者拋棄了自己的錯誤，意見分歧也因共同決議的通過而消除了。大家知道的由政治局全體委員簽字的關於政治局內部團結一致、沒有意見分歧的聲明（一九二八年七月），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

我們意見分歧的第二次爆發是在中央十一月全會以前。布哈林的『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一文顯

然表明，政治局內並不是一切都很好，至少有一位政治局委員打算修改或『訂正』中央的路綫。在我們大多數政治局委員看來，絲毫不容懷疑，『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是一篇反黨的折衷主義的文章，它指望減緩工業發展的速度並按照大家知道的弗魯姆金那封信的意見來改變我們黨的農村政策。這裏還要加上關於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辭職問題。原來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那來到控制數字決議起草委員會，聲明說他們要辭職。但是在控制數字委員會工作過程中，全部意見分歧都這樣或那樣地解決了；保持了現在的工業發展速度，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設的繼續展開獲得了同意，保持了向富農徵收的最高稅額，也保持了國家在貿易方面的調節作用，說黨『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的可笑責備在全體委員大笑聲中遭到了否定，三人的辭職聲明收回了。結果是政治局全體委員通過了關於控制數字的共同決議。結果是政治局通過了一項大家知道的決議：政治局全體委員無論在中央十一月全會上或全會外都要宣稱政治局內部是團結一致、沒有意見分歧的。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投票贊成一致的決議只是做做樣子；他們保留了自己和黨不一致的特殊看法；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實際上會真正拒絕担任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共產國際和『真理報』的工作；加米涅夫的檔案中有一種『記錄』，從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中央委員會內部有一個持有自己的政綱、企圖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結起來反對黨的特殊集團，——這一切當時我們能不知道呢？顯然不能知道。

現在大家都清楚了，意見分歧是存在的，而且分歧是嚴重的。看來弗魯姆金的桂冠使布哈林睡不

着覺。列寧早在一九一六年寫給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就萬分正確地說過，布哈林『在政治上極不堅定』。現在這種不穩定性已經由布哈林傳染給他的集團的成員了。

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主要是：他們確信寬容和放縱富農是解決我們糧食困難和其他一切困難的手段。他們認為：如果我們寬容富農，不限制他們的剝削趨向，給他們自由等等，那末困難就會消除，國家政治狀況就會好轉。不用說，布哈林分子的這種確信富農能起拯救作用的幼稚看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簡直不值得批評。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們不了解階級鬥爭的訣竅，不了解富農是勞動人民的死敵，是我們整個制度的死敵。他們不了解實行寬容和放縱富農的政策就是使我國整個政治狀況惡化，使國內資本主義分子更有機可乘，使我們失去鄉村的貧農，使中農灰心喪氣，使我們和我國工人階級決裂。他們不了解怎樣放縱富農都不能減輕我們的糧食困難，因為在規定收購價格和由國家機關調節糧食市場的政策下，富農反正不會自願交出糧食，而我們如果不願意破壞蘇維埃制度，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放棄國家調節貿易的政策。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們不了解這些粗淺的道理。至於放縱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無論在理論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寧政策的原則和列寧主義的原理絕對不相容，那就不用說了。

同志們會說，這一切都不錯，但是出路何在呢？由於布哈林集團的出現，必須採取什麼對策呢？關於擺脫現狀的出路，大多數同志都已經發表意見。大多數同志要求會議表現出果斷的精神，堅決拒絕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辭職（李可夫已經收回自己的辭職聲明）。大多數同志要求中央政治局和中央



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斥責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政綱，要求會議斥責布哈林及其集團企圖和托洛茨基分子拼湊反黨聯盟。我完全同意這些建議。

布哈林分子不同意這樣的決定。他們不願黨章，要求保證他們有派別集團的自由。他們不願黨的切身利益，要求保證他們有違反黨和中央決議的自由。試問，有什麼根據呢？

照他們說來，如果普通黨員不執行中央的決議，那就應當按照黨的法規予以極嚴厲的處分；如果所謂領袖，比如說，政治局委員違反中央的決議，那就不僅不能處分他們，而且簡直不能批評他們，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把批評看做『惡意攻擊』的。

顯然，黨不能採取這種荒謬的觀點。如果我們對領袖們宣佈一種黨的法規，對黨內的『平民』宣佈另一種黨的法規，那末我們就根本沒有什麼黨，沒有什麼黨的紀律了。

他們控訴『惡意攻擊』。但是這種控訴是破綻百出的。既然布哈林有權寫『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之類的荒謬的反黨文章，那末黨員就更有權批評這種文章。既然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自以為有權違反中央的決議，頑固地拒絕在委託給他們的崗位上工作，那末黨員就更有權批評他們的這種行爲。如果把這叫做『惡意攻擊』，那末讓他們給我們解釋一下，他們是怎樣了解自我批評、黨內民主等等口號的。

有人說，如果列寧來處理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一定會比現在中央處理得寬大些。這是完全不對的。現在的情形是這樣：兩位政治局委員經常違反中央的決議，頑固地拒絕留在黨交給他們的崗位

上，而黨中央不但沒有處分他們，反而勸了他們兩個月，勸他們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列寧在這種場合是怎樣處理的，請回想一下吧。難道不記得列寧同志因托姆斯基犯了一個小錯誤就把他趕到土爾克斯坦去了嗎？

托姆斯基：這是季諾維也夫的好意，一部分也是你的好意促成的。

斯大林：如果你想說可以叫列寧相信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那末這只能令人發笑……請回想一下另外一個事實，就是關於施略普尼柯夫的事。列寧因為施略普尼柯夫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黨支部中批評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某一決議草案，就建議取消他的中央委員資格。

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現在粗暴地違反中央的決議並公然制定反黨的機會主義新政綱的罪行，要比上述托姆斯基和施略普尼柯夫的過錯惡劣得多，這一點誰能否認呢？可是中央委員會不但沒有要求把他們中間的哪一位逐出中央委員會或派到什麼土爾克斯坦去，反而只是試圖說服他們留在自己的崗位上，當然，同時也揭穿他們非黨的、有時簡直是反黨的立場。你們還要怎樣寬大呢？

我們大多數中央委員對布哈林分子過於自由主義和寬容了，也許我們這樣做無意中鼓勵了他們反黨的派別『工作』，這樣說不是更正確嗎？

還不到結束這種自由主義的時候嗎？

我提議接受這次會上大多數人的建議，並轉入下面的問題。

## 答比里——別洛策爾柯夫斯基

比里——別洛策爾柯夫斯基同志！

信寫得太遲了。但是遲寫總比不寫好。

(一) 我認爲在文藝方面(以及在戲劇方面)提出「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的問題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確的。「右傾」或「左傾」的概念目前在我國是黨的概念，更確切地說，是黨內的概念。「右傾分子」或「左傾分子」就是離開真正黨的路綫而傾向於這一或那一方面的人。因此，把這些概念應用於像文藝、戲劇等等非黨的和無比廣闊的領域，那就奇怪了。這些概念在文藝界黨的(共產黨的)某個小組裏還可以應用。在這種小組裏可能有「右傾分子」和「左傾分子」。但是，在文藝發展的現階段，把這些概念應用於有各種各樣的流派以至反蘇維埃的和完全反革命的流派的文藝界，那就是把一切概念都顛倒了。如果在文藝界運用階級方面的概念甚至「蘇維埃的」、「反蘇維埃的」、「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確的。

(二) 綜上所述，應該得出結論說：我不能認爲「郭洛萬諾夫主義」<sup>(3)</sup>是「右傾」危險或「左傾」危險，因爲它是在黨派範圍以外的。「郭洛萬諾夫主義」是一種反蘇維埃的現象。當然，不應該由此得

出結論說：郭洛萬諾夫本人不能改好，他不能擺脫自己的錯誤，甚至當他決心拋棄自己錯誤的時候也要追究他和攻擊他，這樣來迫使他出走國外。

又如布爾加柯夫的『逃亡』，同樣不能認為是『左傾』危險或『右傾』危險的表現。『逃亡』是企圖引起人們對某些反蘇維埃流亡者階層憐憫（甚至同情）的表現，也就是企圖為白衛分子的活動做辯護或半辯護的表現。像現在這個樣子的『逃亡』是一種反蘇維埃的現象。

但是我決不會反對上演『逃亡』，只要布爾加柯夫給自己的八個夢再加上一兩個夢，描寫出蘇聯國內戰爭的內部社會動力，使觀眾能夠了解，所有這些自稱為『誠實的』謝拉菲穆之流和各種各樣的編制以外的大學講師被趕出俄國，並不是由於布爾什維克的任性，而是因為他們曾經騎在人民的脖子上（不管他們如何『誠實』），布爾什維克把這些剝削的『誠實』擁護者趕走是體現了工農的意志，因此是做得完全正確的。

（三）爲什麼常常上演布爾加柯夫的劇本呢？大概因爲我們自己的，適於上演的劇本不夠。鬧劇本荒的時候，甚至『土爾寶一家的日子』也算好劇本了。當然，『批評』和要求禁止非無產階級的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認爲是最好的。問題不在於禁止，而在於通過競賽，創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藝術性的蘇維埃性質的劇本，來代替舊的和新的非無產階級的低級作品，逐步地把它們從舞台上排擠下去。而競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因爲只有在競賽的情況下才能使我們無產階級的文藝形成和定形。

至於『土爾賓一家的日子』這個劇本本身，它並不那麼壞，因為它給我們的益處比害處多。不要忘記，這個劇本留給觀衆的主要印象是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爾賓這樣一家人都承認自己的事業已經徹底失敗，不得不放下武器，服從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說，布爾什維克是不可戰勝的，對他們布爾什維克是毫無辦法的。』『土爾賓一家的日子』顯示了布爾什維主義無堅不摧的力量。

當然，作者對這種顯示是一點也『沒有過錯』的。但是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呢？

（四）確實，斯維捷爾斯基同志常常搞出最令人難以置信的錯誤和歪曲行爲來。但是同樣確實的是，劇目委員會在其工作中犯的錯誤並不比他少，雖然是另一方面的錯誤。請回憶一下『火紅的烏』、『平等者的陰謀』以及其他類似的低級作品吧，這些作品不知爲什麼很樂意地讓真正資產階級的室內劇院上演了。

（五）關於『自由主義』的『謠言』，最好是不去談它，——製造和傳播『謠言』的事，讓莫斯科的商人太太們去搞吧。

約·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第一次刊印

# 給『紅三角』工廠的男女工人

敬愛的『紅三角』工廠的男女工人同志們！值此『紅三角』工廠改行七小時工作制之際，請接受我親切的祝賀。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你們的兄弟姐妹們要工作十、十二、十四小時。而我們工農國家的男女工人從此每天只工作七小時了。

讓所有的人都知悉，蘇聯工人站在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最前列！

讓我們的旗幟——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成爲世界各國工人的旗幟！  
請原諒我不能到你們那裏去參加你們的慶祝會。

約·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

載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

列寧格勒真理報，第二十八號

# 致普羅斯庫羅夫城第一紅色哥薩克團的 紅軍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的賀電

(六)

向紅色騎兵師第一紅色哥薩克團的紅軍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致兄弟的敬禮。祝你們工作成功並戰勝了農的敵人。

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刊印

# 給『農業報』的祝詞

向『農業報』<sup>〔5〕</sup>致敬並致良好的願望！祝它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和闡明農業的發展問題方面獲得成就。

希望它能成爲引導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艱鉅事業前進的積極工作者——建設者的組織中心。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

『農業報』創刊號



# 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

(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你們的來信都收到了。這些信和我最近幾個月來收到的其他同志關於同一問題的許多信是相似的。然而我決定只回答你們，因為你們把問題提得更露骨，從而可以幫助把問題弄明白。固然，你們在自己的信中對所提出的問題做了不正確的解答，但這是另一回事，——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再談。

我們就來談本題吧。

## 一 『民族』概念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早有了自己的民族理論。依據這個理論，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的共同體。大家知道，這個理論已經是我們黨內所公認的了。

從你們的信中可以看出，你們認爲這個理論不够完備。因此，你們建議給民族的四個特徵加上第五個特徵，這就是：具有自己的單獨的民族國家。你們認爲沒有這第五個特徵，就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

我認爲你們所提出的、給『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個特徵的那個公式是大錯特錯的，不論在理論上或者在實踐上——政治上都不能證明是對的。

按照你們的公式，就只好僅僅承認那些和其他國家分離而有自己的單獨國家的民族才是民族，而一切不能成立獨立國家的被壓迫民族，就只好從民族範疇中一筆勾銷，並且被壓迫民族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只好從『民族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概念中取消了。

不僅如此，按照你們的公式，就只好認定：

(甲) 愛爾蘭人只是在『愛爾蘭自由國』成立以後才成爲民族，而在這以前他們不是民族；

(乙) 挪威人在挪威從瑞典分離出來以前不是民族，而只是在分離以後才成爲民族；

(丙) 烏克蘭人在烏克蘭是沙皇俄國的組成部分的時候不是民族，他們只是在中央拉達和斯柯羅帕茨基統領統治之下從蘇維埃俄國分離出來以後才成爲民族，但是他們在把自己的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同其他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以後，又不再是民族了。

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

顯然，使人得出這樣荒謬的結論的公式不能認為是科學的公式。

在實踐上——政治上；你們的公式不可避免地會引導到替民族壓迫、帝國主義壓迫做辯護，這種壓迫的體現者根本不承認那些沒有自己單獨的民族國家的被壓迫的和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是真正的民族；他們認為這種情況給了他們壓迫這些民族的權利。

更不必說，你們的公式會引導到替我們各蘇維埃共和國內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做辯護，這些人硬說各蘇維埃民族在把自己的民族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以後就不再是民族了。

關於『補充』和『修改』俄國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問題就是如此。

剩下的只有一個出路：承認俄國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是唯一正確的理論。

## 二 民族的產生和發展

你們的嚴重錯誤之一就是：你們把現有一切民族都攪在一起，看不見它們之間的原則差別。

世界上有各種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發展起來的，當時資產階級打破封建主義和封建割據局面而把民族集合為一體並使它凝固起來了。這就是所謂『現代』民族。

你們斷定說：民族還在資本主義以前就已經產生並存在了。但是，在資本主義以前，在封建主義

時期，既然國家分裂爲各個獨立的公國，這些公國不僅沒有用民族的紐帶彼此聯系起來，而且根本否認這種紐帶的必要性，那末民族怎麼能產生和存在呢？和你們的錯誤論斷相反，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是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為當時還沒有民族市場，還沒有民族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還沒有那些消滅各該族人民經濟的分散狀態和把各該族人民歷來彼此隔絕的各個部分結合爲一個民族整體的因素。

當然，民族的要素——語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逐漸形成的。但是這些要素當時還處在萌芽狀態，至多也不過是將來在一定的有利條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種潛在因素。這種潛在因素只有在資本主義上升並有了民族市場、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時期才變成了現實。

說到這裏，應該指出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書中關於民族的產生問題所講的那些出色的話。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從氏族聯系的發展中推論出民族聯系和民族統一的產生，列寧在和他論戰的時候說道：

『這樣說來，民族聯系乃是氏族聯系的延續和綜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關於社會歷史的觀念，大概是取材於一些用作小學教材的童話。按這個啓蒙課本的原理說來，社會歷史是這樣的：起初是家庭，這是任何一個社會的細胞……然後家庭發展爲部落，部落又發展爲國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鄭重其事地重複這種幼稚的胡說，這不過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對俄國歷史的進

程也沒有任何概念。在古俄羅斯還可以說有過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紀，在莫斯科皇朝時代，這種氏族聯系毫無疑義已不存在了；就是說，當時國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聯合上，而是建立在地方的聯合上；地主和教堂接納了從各地來的農民，而這樣組成的村社純粹是地域性的聯合。但在當時很難說已有真正的民族聯系；當時國家分成各個領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國，這些公國還保存着從前那種自治制度的鮮明遺跡，有其管理方面的特點，有時候還保存着自己的特殊的軍隊（地方諸侯是帶領着自己的軍隊去作戰的）、特殊的稅關等等。僅僅在俄國歷史的新時期中（大約自十七世紀起），這一切區域、領地和公國才真正在事實上融合成一個整體。請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這種融合並不是由氏族聯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續和綜合引起的，而是由各個區域間日益頻繁的交換，由逐漸增長的商品流通，由各個不大的地方市場集中成一個全俄市場引起的。既然這個過程的領導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資本家，所以這種民族聯系的建立也就無非是資產階級聯系的建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一卷第一三七頁至第一三八頁）

所謂『現代』民族產生的情形就是如此。

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的政黨在這個時期始終是這種民族的主要領導力量。爲了『民族統一』而鼓吹民族內部的階級和平；掠奪異民族的領土來擴大本民族的領土；不信任和仇視異民族；壓迫少數民族；同帝國主義結成統一戰綫，——這就是這種民族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政治內容。

這種民族應該評定爲資產階級民族。例如法蘭西、英吉利、意大利、北美利堅以及其他類似的民族就是這樣的民族。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制度建立以前的俄羅斯、烏克蘭、韃靼、阿爾明尼亞、格魯吉亞以及俄國其他的民族也是這樣的資產階級民族。

顯然，這種民族的命運是和資本主義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隨着資本主義的滅亡，這種民族勢必退出舞台。

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小冊子中說，『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民族運動實質上既是資產階級的運動，它的命運自然就和資產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只有資產階級滅亡，民族運動才會徹底滅亡』，『只有在社會主義世界裏，完全的和乎才能建立起來』<sup>(2)</sup>，這裏指的正是這種資產階級民族。

關於資產階級民族的情形就是如此。

但是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民族。這就是新式民族即蘇維埃民族；這種民族是在俄國資本主義推翻以後，在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政黨消滅以後，在蘇維埃制度確立以後，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的基礎上發展和形成的。

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的政黨是團結和領導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爲了消滅資本主義殘餘，爲了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在民族內部結成聯盟，爲了各個民族及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由發展而消滅民族壓迫的殘餘；爲了建立各民族人民間的友誼和確立國際主義而消滅民族

主義的殘餘，在反對侵略和侵略戰爭的政策鬥爭中，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一切被壓迫的和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結成統一戰綫，——這就是這種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會政治面貌。

這種民族應該評定為社會主義民族。

這些新式民族是由於資本主義被消滅而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的基礎上通過以社會主義精神根本改造舊式民族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誰也不能否認，現在蘇聯各社會主義民族——俄羅斯民族、烏克蘭民族、白俄羅斯民族、韃靼民族、巴什基爾民族、烏茲別克民族、哈薩克民族、阿捷爾拜疆民族、格魯吉亞民族、阿爾明尼亞民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不論按階級成分和精神面貌說來，或者按社會政治的利益和趨向說來，都和舊俄境內各個相當的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根本不同。

這就是歷史所知道的兩種民族類型。

你們不同意把民族的命運（這裏是指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的命運）和資本主義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你們不同意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隨着資本主義的消滅也將消滅的論點。可是，如果不把這些民族的命運和資本主義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究竟又能把它和什麼東西聯系在一起呢？隨着資本主義的消失，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民族也勢必消失，這難道很難理解嗎？難道你們認為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在蘇維埃制度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能存在和發展嗎？這怎麼行……

你們耽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的民族的消滅就等於所有民族的消滅，任何民族的消滅。爲什麼呢？有什麼根據呢？除了資產階級民族以外，還存在着其他的民族，社會主義民族，它們的團結性

和生命力遠遠超過了任何資產階級民族，這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你們的錯誤就在於：除了資產階級民族以外，你們看不見其他的民族，因而你們忽視了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廢墟上產生的蘇聯各社會主義民族形成的整個時代。

問題就在於：資產階級民族的消滅並不就是所有民族的消滅，而僅僅是資產階級民族的消滅。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的廢墟上，新式民族即社會主義民族產生和發展起來，這種民族比任何資產階級民族都團結得多，因為它們沒有那些腐蝕資產階級民族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且它們的全民性遠遠超過了任何資產階級民族。

### 三 民族和民族語言的未來

你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在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和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之間劃了一個等號，認定不僅在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候，而且在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候，民族差別和民族語言的消失、民族的融合以及統一的共同的語言的形成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這裏，你們把完全不同的東西混淆起來了，即把「民族壓迫的消滅」和「民族差別的消滅」混淆起來了，把「民族國家壁壘的消滅」和「民族的消亡」、「民族的融合」混淆起來了。

不能不指出，把這些各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來，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是完全不能容許的。在我們這



裏，在我們國家中，民族壓迫早已消滅了，但是由此決不應該得出結論說：民族差別已經消失了，我國各民族已經消滅了。在我們這裏，在我們國家中，民族國家壁壘如邊防、稅關早已取消了，但是由此決不應該得出結論說：各民族已經融合起來了，各種民族語言已經消失了，這些民族語言已經被我們一切民族的某種共同語言代替了。

你們不滿意我在東方民族共產主義大學裏的演說（一九二五年）<sup>(3)</sup>，因為在那次演說中我否認了下面這個論點的正確性：在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例如在我們國家內勝利的時候，各種民族語言將要消亡，各個民族將要融合起來，而且將要出現一種共同語言來代替各種民族語言。

你們認為我這種說法和列寧的一個著名論點是矛盾的，這個論點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消滅人類分為許多小國家的現象和各民族間的任何隔離狀態，不只是为了使各民族互相親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為一體。

其次，你們認為我這種說法和列寧的另一個論點也是矛盾的，這個論點是：在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候，民族差別和民族語言將開始消亡，在這個勝利以後，各種民族語言將開始被一種共同語言所代替。

同志們，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是嚴重的錯誤。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和「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這些各不相同的現象混為一談，攪在一起，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容許的。不應該忘記：這些各不相同

的現象反映着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這兩個時代不僅在時間上（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本質上都是互不相同的。

民族猜疑、民族隔閡、民族仇視、民族衝突，當然不是被某種「天生的」民族惡感推動着和支持着的，而是被帝國主義征服異民族的野心以及這些民族對於民族奴役的威脅所感到的恐懼推動着和支持着的。毫無疑問，只要世界帝國主義存在，這種野心和這種恐懼也將存在，——因此，在絕大多數國家裏，民族猜疑、民族隔閡、民族仇視、民族衝突也將存在。能不能斷言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消滅就是大多數國家內帝國主義和民族壓迫的消滅呢？顯然不能。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雖然嚴重地削弱了世界帝國主義，但是仍然沒有創造而且不能創造為世界各個民族和各種民族語言融合為一個共同的整體所必需的條件。

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的區別，首先在於前者消滅一切國家裏的帝國主義，消滅征服異民族的野心以及對於民族奴役的威脅所感到的恐懼，根本消除民族猜疑和民族仇視，把各個民族在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內聯合起來，從而創造為一切民族逐漸融合為一個整體所必需的實際條件。

這就是這兩個時期的根本區別。

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把這兩個不同的時期混為一談，攙在一起，就是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請看我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裏的演說吧。在這個演說中說：

『人們（例如考茨基）談論在社會主義時期隨着一切語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統一的全人類的語言。我不大相信這個無所不包的統一語言的理論。無論如何，經驗不是證實而是推翻了這種理論。直到現在，情形是這樣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了語言的數目，因為它震動了人類的最下層，把他們推上政治舞台，喚起早先大家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許多新的民族追求新的生活。誰能想到過去的沙皇俄國是一個至少有五十個民族和民族集團的國家呢？可是十月革命打斷了舊的鎖鍊，把許多被遺忘了的民族和族推上舞台，給了他們新的生活和新的發展。』(1)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我是反對考茨基這一類的人的，因為他（即考茨基）對於民族問題始終是門外漢，他不了解民族發展的訣竅，不理解民族穩定性的巨大力量，他認為遠在社會主義勝利以前，還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民族融合就已經是可能的，他奴顏婢膝地讚揚日耳曼人在捷克的同化『工作』，輕率地斷定捷克人差不多已被日耳曼化了，捷克人作爲一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其次，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我在演說中所指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的時期，而僅僅是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並且我當時認定（現在繼續認定）：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沒有提供各個民族和各種民族語言的融合所必需的條件，相反地，這個時期爲以前受沙皇帝國主義壓迫而現在被蘇維埃革命從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各民族的復興和繁榮造成有利的環境。

最後，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你們忽視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之間的巨大差別，因而不了解斯

大林演說的含義，結果就陷入了你們自己的錯誤的迷宮。

現在來看一看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以後各個民族消亡和融合的幾個論點。

請看從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一文中引用的列寧的一個論點，這個論點不知爲什麼在你們的信中沒有全部引證出來：

『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就是要消滅人類分爲許多小國家的現象和各民族間的任何隔離狀態，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親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爲一體……正如人類只有經過被壓迫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才能達到階級的消滅一樣，人類只有經過一切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即他們有分自由的過渡時期，才能達到各民族必然的融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三五頁至第一三六頁）

請看列寧的另一個論點，這也是你們沒有全部引證出來的。

『只要各民族間和各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國際策略的統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樣性，不是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運用共產主義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細節上加以正確的變更，使這些原則正確地適應並且適用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頁）

應當指出，這段引文是從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摘引來的，這本書是在一九二〇年即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以後，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以後出版的。

從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寧不是把民族差別消亡和民族融合的過程歸入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時期，而是僅僅歸入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的時期；就是說，歸入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勝利的時期即世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奠定的時期。

其次，從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寧認為把民族差別消亡的過程歸入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在我們國家內勝利時期的企圖是『可笑的幻想』。

此外，從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所發表的演說中否定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在我們國家內勝利的時期民族差別和民族語言消亡的可能性是絕對正確的，而你們堅持一種和斯大林的論點完全相反的意見是絕對錯誤的。

最後，從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你們把社會主義勝利的兩個不同的時期混淆起來是不了解列寧，歪曲列寧在民族問題方面的路線，因此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背離列寧主義的道路。

如果認為在世界帝國主義剛剛失敗以後，可以用所謂從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實現民族差別的消滅和民族語言的消亡，那是不正確的。這種看法是最錯誤不過的了。企圖用從上面下命令的辦法，用強迫的辦法來實現各民族的融合，——這就是幫助帝國主義者，斷送民族解放事業，葬送組織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團結的事業。這樣的政策無異於同化政策。

你們當然知道，同化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庫中絕對不容許有的，因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

此外，大家知道，民族和民族語言的特點是具有非常的穩定性以及對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土耳其的同化主義者（所有同化主義者中最殘酷的一種）蹂躪和摧殘巴爾幹各民族達幾百年，但是他們不僅沒有能夠消滅這些民族，反而不得不投降了。沙皇俄國的俄羅斯化主義者和普魯士德國的日耳曼化主義者，其殘酷幾乎不亞於土耳其同化主義者，他們摧殘和蹂躪波蘭民族有一百多年，正如波斯和土耳其的同化主義者摧殘、蹂躪和戕害阿爾明尼亞民族和格魯吉亞民族達幾百年一樣，但是他們不僅沒有能夠消滅這些民族，反而也不得不投降了。

必須考慮到所有這些情況，以便從世界帝國主義剛剛失敗以後民族發展的觀點來正確地預見事變可能的進程。

如果認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第一個階段將是民族和民族語言消亡的開始，將是統一的共同語言形成的開始，那是錯誤的。相反地，在第一個階段民族壓迫將被徹底消滅，這個階段將是以前被壓迫的民族和民族語言發展和繁榮的階段，將是確立各民族平等權利的階段，將是消滅民族互相猜疑的階段，將是建立和鞏固各民族間國際聯系的階段。

只有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第二個階段，隨着統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的逐漸形成而代替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類似共同語言的東西才會開始形成，因為只有在這個階段，各民族才會感覺到

除了自己的民族語言以外，還必須有民族間的一種共同語言，——這是爲了交際的便利，爲了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總之，在這個階段民族語言和民族間共同的語言將平行地存在。可能是這樣；最先形成的將不是一個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種共同語言的世界經濟中心，而是幾個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這一批民族的共同語言的區域經濟中心，只有在這以後，這些中心才會聯合爲一個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種共同語言的世界社會主義經濟中心。

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後一個階段，當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已經充分鞏固，社會主義已經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經在實踐中深信共同語言優越於民族語言的時候，民族差別和民族語言才開始消亡而讓位於一切人們共同的世界語言。

在我看來，各民族的未來的大致的圖畫，各民族在將來融合的道路上發展的圖畫就是如此。

#### 四 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

你們的錯誤之一在於：你們不是把民族問題看做社會的社會政治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從屬於這個總問題的一部分，而是看做某種獨立自在的和永恆的、在歷史進程中基本上不變更自己的方向和性質的東西。因此，你們看不見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所看到的東西，這就是：民族問題並不是始終具有同樣的性質，民族運動的性質和任務是依革命發展的不同時期而變更的。

這一點在邏輯上也就說明這樣一個可悲的事實：你們如此輕率地把革命發展的各不相同的時期混爲一談，攪在一起，不懂得在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上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的變化會引起民族問題的性質和任務的相應的變化，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也要隨之而改變，因此，不能把黨在民族問題上的和革命發展某一時期相聯繫的政策同這個時期硬行分開，而隨便搬到另一個時期。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出發點始終是下面這個原理：民族問題是革命發展總問題的一部分，在革命的各個不同階段上民族問題具有和各該歷史時期的革命性質相應的各種不同的任務，因此，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也就隨之而改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時期，歷史在俄國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作·爲·當·前·的·任·務，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就把民族問題的解決和俄國民主變革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們黨認爲：推翻沙皇制度，消滅封建殘餘並實現國家完全民主化，就是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可能做到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最好辦法。黨在這個時期的政策就是如此。

列寧關於民族問題的一些著名論文就是屬於這個時期的，其中有一篇是『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在這篇文章中列寧寫道：

『……我肯定地說：如果資本主義世界一般地還有解決民族問題的可能，那就只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實現徹底的民主主義。爲了證明這一點，我順便舉了瑞士做例子。』（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卷第二十三頁）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小冊子也是屬於這個時期的，在這個小冊子中也寫道：

『只有資產階級滅亡，民族運動才會徹底滅亡。只有在社會主義世界裏，完全的和平才能建立起來。可是把民族鬥爭減到最小限度，從根本上消除它，盡量使它無害於無產階級，這在資本主義範圍內也是可以做到的。瑞士和美國的例子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爲此就必須使國家民主化，使各個民族有自由發展的可能。』(17)

在後一個時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兩個帝國主義聯盟間的長期戰爭摧毀了世界帝國主義的威力，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達到了極點，殖民地和附屬國也隨同『宗主國』的工人階級加入了解放運動，民族問題轉變爲民族殖民地問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同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被壓迫民族的統一戰綫開始變爲實際的力量，社會主義革命因而成了當前的問題，——在這個時期，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已經不能滿足於前一時期的政策，他們認爲必須把民族殖民地問題的解決和社會主義變革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黨認爲：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把帝國主義軍隊從殖民地和附屬國境內驅逐出去並保證殖民地和附屬國有分離和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權利，消除民族仇視和民族主義並鞏固各族人民間的國際聯系，組織統一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和在這個基礎上樹立各族人民間兄弟般的合作，就是在這個時期的條件下解決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最好辦法。

黨在這個時期的政策就是如此。

這個時期還遠沒有充分顯示自己的力量，因為它才剛剛開始，可是毫無疑問，它將表現出自己的決定作用……

應當單獨提出我國革命發展的目前時期和黨的當前政策的問題。

應該指出：我國暫時還是決心推翻資本主義的唯一的國家。而且它實際上已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在世界範圍內的實現，尤其是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的勝利，暫時還是很遠的事。

其次，應該指出：我們既然推翻了早已擯棄自己的舊民主主義傳統的資產階級政權，也就附帶地解決了「國家完全民主化」的任務，消滅了民族壓迫制度和實現了我國各民族的權利平等。

大家知道，這些辦法是消滅民族主義和民族仇視、確立各族人民互相信任的最好的方法。

最後，應該指出：民族壓迫的消滅已經導致我國先前各被壓迫民族的民族復興，它們的民族文化的發展，我國各族人民友好的民族間的聯系的鞏固和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合作的建立。

必須記住：這些復興起來的民族已經不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而是在舊式民族的廢墟上產生的、勞動羣衆的國際主義政黨所領導的新式民族即社會主義民族。

因此，黨認為必須幫助我國各個已經復興的民族完全站立起來，振興和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興辦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學校、劇院和其他文化機關，使黨的、工會的、合作社的、國家的、經濟的機關

民族化，就是說，使這些機關在人員成分上是本民族的，培養本民族的黨和蘇維埃的幹部，制裁所有那些企圖阻撓黨的這種政策的分子（固然人數不多）。

這就是說，黨支持而且將來也要支持我國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的發展和繁榮，黨將鼓勵鞏固我國各個新式民族即社會主義民族的事業，黨將保護和捍衛這個事業而反對所有一切反列寧主義的分子。

從你們的信中可以看出，你們不贊成我們黨的這種政策。第一、這是因為你們把新式民族即社會主義民族和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混淆起來，不懂得我們新式蘇維埃民族的民族文化按內容來說是社會主義的文化。第二、這是因為——請原諒我不客氣——你們在列寧主義問題方面很蹩腳，並且對民族問題了解很差。

請你們至少注意一下下面這個粗淺的道理。我們都在講我國有進行文化革命的必要。如果認真地對待這件事情而不是誇誇其談，那末在這方面至少必須實現第一個步驟：首先使初等教育成爲不分民族的全國公民的義務教育，然後中等教育也如此。顯然，不這樣做，我國任何的文化發展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所謂文化革命了。而且不這樣做，我國就既不會有工業和農業的真正高漲，也不會有可靠的國防。

但是，既然我國文盲的比例還很高，我國許多民族中文盲竟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那末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

爲此必須在全國建立稠密的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學校網，供給精通本民族語言的教師幹部。爲此必須使所有的管理機關，從黨的和工會的機關到國家的和經濟的機關都民族化，就是說，使這些機關在人員成分上是本民族的。

爲此必須興辦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報刊、劇院、電影院和其他文化機關。

有人會問：爲什麼要使用本民族語言呢？這是因爲千百萬人民羣衆只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獲得巨大的進步。

既然如此，我認爲就不怎麼難以了解：列寧主義者在民族問題上除了我國現行政策以外，不能實行任何別的政策，當然，如果他們願意繼續做列寧主義者的話。

難道不是這樣嗎？

好吧，就在這裏結束。

我想，我已經答覆了你們所有的問題和疑問。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



## 註釋

(一) 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六日巡視西伯利亞的時候訪問了邊區的主要產糧區。約·維·斯大林參加了聯共(布)西伯利亞邊區委員會常務局會議(在諾沃西比爾斯克)、聯共(布)各州委員會常務局會議以及巴爾納烏爾、比依斯克、魯勃佐夫斯克和鄂木斯克等州黨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這些會議都有蘇維埃代表和收購機關代表參加。由約·維·斯大林所實行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措施，西伯利亞的黨組織保證了糧食收購計劃的完成。——(正文第三頁)

(二)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組織報告，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工農檢查院的總結報告，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總結報告，關於制定發展國民經濟五年計劃的指示和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聽取了代表大會處理反對派問題委員會的報告，選舉了黨的中央機關。約·維·斯大林於十二月三日做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並於十二月七日做了關於這一報告的結論。十二月十二日，代表大會把約·維·斯大林選入關於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起草委員會。代表大會批准了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並委託黨中央委員會繼續執行維護和平及鞏固蘇聯國防力量的政策，繼續用同樣速度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擴大並加強城鄉的社會主義成分，採取消滅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代表大會做出了關於制定蘇聯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示。代表大會通過了全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擬定了擴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計劃，並做出了關於爭取農業集體化的方法的指示。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是作為農業集體化代表大會而載入黨的史冊的。代表大會在旨在消滅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的關於反對派的決議中確定，黨與反對派間的意見分歧已經發展為綱領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對派已經走上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並宣佈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和宣傳其觀點的行爲與留在布爾什維克黨內不能相容。代表大會批准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

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關於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開除出黨的決定，並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中所有的積極分子開除出黨。（關於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二頁至第三八四頁。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和決定，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一三頁至第三七一頁）——（正文第十頁）

（三）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五頁。——（正文第十頁）

（四）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迫使黨進行的爭論。一九二七年十月，即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兩個月，黨中央委員會宣佈了全黨的爭論。關於此次爭論，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七八頁。——（正文第十三頁）

（五）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六二頁。——（正文第十五頁）

（六）有中央檢查委員會委員參加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於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十一日舉行。全會討論了本年度糧食收購工作和組織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糧食收購運動的問題，政治局委員會關於消除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的缺點的實際措施的報告以及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會一九二八年工作計劃。約·維·斯大林在四月十日的全會會議上就政治局委員會的報告發表意見，並被選入關於沙赫特事件和克服經濟建設缺點的實際任務的決議最後修訂委員會。全會通過了關於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以及其他領導工作人員每年出差到各地的特別決定，以便加緊克服地方工作中的缺點並在實踐中改善中央機關的領導。（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七二頁至第三九〇頁）——（正文第二十五頁）

（七）指帕巴斯的沙赫特區及其他區內資產階級專家反革命組織的暗害活動。該組織於一九二八年初被破壞。關於沙赫特事件，見本卷第三十一頁和第四十五頁至第五十四頁，並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八頁至第三八九頁。——（正文第二十五頁）

（八）「工農檢查院專員」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真理報」上定期刊出。「工農檢查院專員」的目的是吸引廣大勞動羣衆參加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正文第二十九頁）

（九）「青年團真理報」（日刊）是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

四日創刊。——（正文第二十九頁）

（一〇）弗·伊·列寧「關於在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綱要給維·米·莫洛托夫的信」（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三三頁至第二三四頁）。——（正文第三十三頁）

（一一）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規定了黨對中農的新政策即和中農建立鞏固的聯盟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原則是弗·伊·列寧在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中提出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七五頁至第一九六頁。關於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〇六頁至第三一一頁）。——（正文第四十一頁）

（一二）指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發出的第三十三號「關於組織工業企業管理」的指令及其附件「關於金屬工業和電器工業中技術廠長的權利和義務綱要」。——（正文第四十九頁）

（一三）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下列幾個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結和前途以及對青年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駐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團的總結報告；因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而產生的青年的勞動和教育問題；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童工作以及其他問題。五月十六日約·維·斯大林在代表大會的閉幕會上發表了演說。——（正文第五十六頁）

（一四）指蘇共（布）中央給各民族共產黨中央、聯共（布）各中央局、聯共（布）各邊區委員會、各區域委員會、各省委員會、各州委員會和各縣委員會的「爭取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各級農村工作部的基本任務）」的公告。這個公告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會書記維·米·莫洛托夫簽署，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真理報」第一一二號上發表。——（正文第六十三頁）

（一五）一九一八年由雅·米·斯維爾德洛夫發起，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附設宣傳鼓動短期訓練班，一九一九年一月該訓練班改名為蘇維埃工作學校。根據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在這個學校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央蘇維埃工作和黨工作學校。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中央蘇維埃工作和黨工作學校改組為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斯維爾德洛夫大學慶祝成立十周年。——（正文第六十九頁）

（一六）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約·維·斯大林在代表大會



上做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代表大會規定了黨的中心任務是爲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基礎而鬥爭。代表大會在決議中着重指出了在依靠農業的條件下進一步鞏固工人階級和中農的聯盟去同富農作鬥爭的重要性。代表大會指出了必須支持和推進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業文化，通過合作社把更多的農戶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代表大會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七十三頁至第一三七頁。關於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五頁至第三六九頁）——（正文第七十九頁）

(二七) 指弗·伊·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五日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報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八〇頁至第三九四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九八一頁至第九九四頁）。——（正文第八十頁）

(二八) 指弗·伊·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關於俄國共產黨的策略」的報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五四頁至第四七二頁）。——（正文第八十二頁）

(二九) 指發表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真理報」第二二八號上的聯共（布）中央「告全體黨員，告全體工人書」（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八〇七頁至第八〇九頁）。——（正文第八十五頁）

(三〇) 弗·伊·列寧的「皮梯利姆·索羅金的寶貴自供」（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七一頁）。——（正文第八十七頁）

(三一) 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四二五頁。——（正文第九十頁）

(三二)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八三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五二二頁。——（正文第九十二頁）

(三三)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三九頁。——（正文第九十六頁）

(三四) 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四四七頁，第四四八頁，第四五〇頁。——（正文第九十七頁）

(三五) 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舉行。約·維·斯大林在十二月二

十三日上午會議上發表了「黨和反對派」的演說（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卷第二一四頁至第二二八頁）。——（正文第九十八頁）

〔二十六〕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引自但丁的「神曲」作為座右銘的一句話（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四三二頁）。——（正文第一〇〇頁）

〔二十七〕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一五頁。——（正文第一〇二頁）

〔二十八〕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七二頁至第三八〇頁。——（正文第一〇四頁）

〔二十九〕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二頁。——（正文第一〇五頁）

〔三十〕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五五頁。——（正文第一〇五頁）

〔三十一〕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四二頁。——（正文第一〇六頁）

〔三十二〕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上第四四七頁、第四四八頁。——（正文第一〇七頁）

〔三十三〕卡·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二七頁）。——（正文第一一一頁）

〔三十四〕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九〇頁。——（正文第一一五頁）

〔三十五〕「交易所報」（「交易所新聞」）是低級趣味的資產階級報紙，於一八八〇年在彼得堡創刊。這個報紙的名字已經成為一切無原則的和下賤的行爲的通稱。一九一七年十月月底該報被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查封。——（正文第一一九頁）

〔三十六〕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全會聽取了關於即將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一些問題的報告，並基本上同意了共產國際綱領草案。全會通過了關於下列問題的決議：關於根據整個經濟狀況而採取的糧食收購政策問題，關於建立新的國營農場（穀物農場）問題，關於改進培養新專家的工作問題。約·維·斯大林在七月五日、九日和十一日的全會會議上發表了演說，這些演說都刊載於本卷。（聯共（布）中央全會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

註 釋

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九一至第四〇四頁。——（正文第一二三頁）

〔五七〕一九二八年七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所討論的共產國際綱領草案，是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七月）上成立的綱領起草委員會制定的。約·維·斯大林參加了該委員會並領導了綱領草案的制定工作。草案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綱領起草委員會所通過，並得到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贊同，這一草案成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所批准的共產國際綱領的基礎。關於綱領草案，見本卷第一七五頁至第一百七頁。——（正文第二二五頁）

〔五八〕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二〇七頁至第二四六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三七二頁至第四〇六頁。——（正文第二二九頁）

〔五九〕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匈牙利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從成立的最初幾天起就處在艱難的環境中。國家既遭遇嚴重的財政和糧食危機，又同國內反革命和對蘇維埃匈牙利組織經濟封鎖與軍事干涉的協約國進行鬥爭。參加匈牙利共和國政府的匈牙利社會民主黨人在後方和前後進行背叛的破壞活動，同協約國的代理人勾結起來陰謀顛覆蘇維埃政權。一九一九年八月，匈牙利革命被國內反革命和干涉者的聯合勢力鎮壓下去了。——（正文第一三〇頁）

〔六〇〕指一九二三年秋季德國深刻的革命危機。由於革命運動的強大，在薩克森和紹林吉亞成立了工人政府，在漢堡發生了工人武裝起義。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革命遭到了失敗。——（正文第一三〇頁）

〔六一〕弗·伊·列寧的「土地問題提綱初稿」（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九頁至第一四一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七七九頁至第七八九頁）。——（正文第一三二頁）

〔六二〕見「共產國際綱領草案」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第五十二頁。並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七十五頁至第七十六頁和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七二一頁。——（正文第一三五頁）

〔六三〕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討論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活動的總結報告，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的總結報告，討論了消除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辦法，共產國際綱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問題，蘇聯的經濟狀況和聯共（布）黨內的狀況，批准了共產國際章

程。代表大會指出了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增長必然會引起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急劇尖銳化。代表大會根據工人階級鬥爭的新條件規定了共產國際的任務。在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狀況和聯共（布）黨內狀況的決議中，代表大會指出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和這些成就對於鞏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陣地的意義，並號召全世界勞動者保衛蘇聯。約·維·斯大林被選入代表大會主席團，綱領委員會以及草擬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任務的提綱的政治委員會。——（正文第一二七頁）

〔四〕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彙編」一九三九年莫斯科版第三二五頁。——（正文第一四五頁）

〔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九三頁。——（正文第一四六頁）

〔六〕「貧農報」（日刊）是聯共（布）中央的機關報，於一九一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一四七頁）

〔七〕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一二頁。——（正文第一五三頁）

〔八〕「紅色報」（日刊）是列寧格勒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於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出版的。——（正文第一五七頁）

〔九〕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附設於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地方經濟會議。——（正文第一六一頁）

〔十〕「伏爾加下游」雜誌（月刊）是伏爾加下游區域計劃委員會和薩拉托夫省計劃委員會於一九二四年在薩拉托夫創辦的，從一九二六年起改由薩拉托夫省和邊區計劃委員會出版。一九三二年八月至一九三三年由邊區計劃委員會在斯大林格勒出版。——（正文第一六六頁）

〔十一〕糧食總社即穀物和油料作物生產、加工和銷售農業合作社的全俄中央聯合社，於一九二六年成立，一九三二年撤銷。——（正文第一六九頁）

〔十二〕公會社會主義是社會民主主義改良主義內部極端敵視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派別，二十世紀初產生於英國。公會社會主義否認國家的階級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鼓吹把工人、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聯合到民族工業公會聯盟中去，把公會變為資產階級國家範圍內的工業管理機關。公會社會主義否認革命的鬥爭方法，使工人階級陷於癱瘓狀態並完全順從資

產階級。——（正文第一七七頁）

〔五〕這封信是約·維·斯大林爲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蘇聯舉行的「國防周」寫的。——（正文第一八九頁）

〔五〕全俄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大會由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召開，目的在於組織女工和農婦的政治教育工作，吸引她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一千一百四十七名代表。十一月十九日弗·伊·列寧在代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關於代表大會及其意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一六〇頁至第一六二頁和「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四九頁至第三五一頁）——（正文第二二一頁）

〔五〕有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檢查委員會參加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舉行。全會審查了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國民經濟控制數字，並討論了下列問題：關於七小時工作制的初步總結和繼續實行問題，關於吸收工人入黨和調整黨的發展問題，討論了聯共（布）北高加索邊區委員會關於農村工作和提高農業的措施的報告。約·維·斯大林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全會會議上就議程的第一個問題發表了「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演說。十一月二十日，約·維·斯大林被全會選入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決議修訂委員會。（聯共（布）中央全會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〇五頁至第四二八頁）——（正文第二二二頁）

〔五〕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斯摩棱斯克「線軸」總廠工廠舉行了爲更好地進行蘇維埃選舉而組織全省競賽的羣衆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工人通過了保證全體工人和家屬都參加蘇維埃選舉以及組織選舉前挑戰大會的決議，並向雅爾采沃紡織工廠和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加路格等省其他工廠的工人發出了挑戰書。工人寫信給約·維·斯大林和米·伊·加里寧，說他們已經把約·維·斯大林和米·伊·加里寧選爲選舉前挑戰大會的名譽主席，並請求對組織更好地進行蘇維埃選舉的競賽問題給予指示。——（正文第二五〇頁）

〔五〕見「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六冊。提綱、決議、決定、宣言彙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第五十七頁。——（正文第二五五頁）

〔五〕紅色工會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日在莫斯科舉行。大會討論了下列問題：國際工會運動的總結和當前的任務，工會運動中的青年工人問題，組織問題，對法西斯主義和黃色工會鬥爭的方法，殖民地和半殖

民地國家內的工會運動等。代表大會在決議中着重指出，在資本主義穩定日趨動搖的情況下階級鬥爭正在增長和尖銳化，工會國際的全部活動都應當是爲了爭取羣衆並領導他們對資本進行鬥爭。代表大會指出，工會國際的中心任務是爭取改良主義的工會，不顧改良主義首領的反抗而去領導罷工。代表大會在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中着重指出，革命的工會應當進行把無產階級廣大階層吸收到工會組織中來的經常工作。——（正文第二五九頁）

〔五〕見「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六冊。提綱、決議、決定、宣言彙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第八十頁。——（正文第二六一頁）

〔六〕指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批准的關於「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的決議。經專門委員會討論後提交大會審查的這個決議的提綱是弗·伊·列寧起草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一頁至第一八七頁。——（正文第二六二頁）

〔六〕指「關於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國民經濟控制數字」的決議，該決議在約·維·斯大林領導下由聯共（布）中央十一月全會決議起草委員會擬定，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全會會議上通過。全會在決議的結論部分指出了進行兩條戰綫鬥爭的必要性並規定了對聯共（布）黨內的主要危險右傾危險進行鬥爭的方法（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四一九頁至第四二〇頁）。——（正文第二六六頁）

〔六〕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於反對派」的決議，見「蘇共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五三年版卷下第三六八頁至第三七〇頁。——（正文第二七〇頁）

〔六〕「舵報」是白俄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柏林出版。——（正文第二七二頁）

〔六〕弗·伊·列寧的「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黨的統一的決議草案初稿」（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一八頁，「列寧文選」兩卷集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第八二頁）。——（正文第二七二頁）

〔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五卷第一六八頁。——（正文第二七七頁）

〔六〕「郭洛漢諾夫主義」表現於某一部分戲劇工作者企圖把舊的資產階級的習氣和工作方法搬到蘇維埃劇院裏來。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大劇院以樂隊指揮郭洛漢諾夫爲首的一批演員反對革新，反對創造適合廣大勞動者階層增長了的要  
求和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的新劇目。這一批人和劇院全體工作人員對立起來，並拒絕提拔青年演員。黨所採取的改革蘇維埃

劇院工作的措施保證克服了「郭洛萬諾夫主義」。——（正文第二八〇頁）

〔六〕 約·維·斯大林致普羅斯庫羅夫城紅色騎兵師第一紅色哥薩克團的紅軍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的賀電，是爲慶祝紅軍建軍十一周年而發出的。——（正文第二八四頁）

〔六〕 「農業報」（日刊）是蘇聯人民委員會的機關報，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版，後來改爲「社會主義農業報」。——（正文第二八五頁）

〔六〕 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三〇〇頁、第三〇七頁。——（正文第二九一頁）

〔七〕 約·維·斯大林的「論東方民族大學的政治任務」（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頁至第一五二頁）。——（正文第二九四頁）

〔七〕 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八頁至第一三九頁。——（正文第二九六頁）

〔七〕 見「斯大林全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三〇七頁至第三〇八頁。——（正文第三〇二頁）

年 表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三月)

一九二八年

- 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和聯共(布)列寧格勒區域委員會書記謝·米·基洛夫談話。
- 一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和特維爾棉紡織托拉斯管理委員會主席談生產合理化問題。
- 一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與布良斯克省黨的機關和蘇維埃機關的代表談工業工作和集體合同問題。
- 一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與農業合作社、糧食總社、糧食公司和蘇聯貿易人民委員部的代表談話。
- 一月十五日 因西伯利亞邊區的糧食收購進行得不能令人滿意，約·維·斯大林赴西伯利亞。
- 一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諾沃西比爾斯克市出席聯共(布)西伯利亞邊區委員會常務局會議，這個會議有收購機關的代表參加。
- 一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在巴爾納烏爾市召開有比依斯克州和魯勃佐夫斯克州黨組織代表參加的聯共(布)巴爾納烏爾州組織積極分子會議，討論完成糧食收購計劃問題。
- 一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魯勃佐夫斯克州委員會常務局會議上就該州糧食收購進程問題發言。



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鄂木斯克州委員會常務局會議上參加關於糧食收購問題的討論。

二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從西伯利亞回莫斯科。

二月九日至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的工作。

二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和聯共(布)下城省委書記安·亞·日丹諾夫談話。

二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給聯共(布)各級組織的信——「收購運動的初步總結和今後黨的任務」。

二月二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慶祝紅軍建軍十周年的賀電在「紅星報」第四十六號上發表。

二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莫斯科蘇維埃紀念紅軍建軍十周年的慶祝大會上發表「論紅軍的三個特點」的演說。

二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紅軍建軍十周年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三月二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與「真理報」編輯部和「布爾什維克」雜誌編輯部的工作人員談話。

約·維·斯大林和聯共(布)鄂木斯克州委員會書記談糧食收購問題。

三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與聯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員會和省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談區域劃分問題。

四月六日至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的工作。

四月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就中夫政治局委員會關於消除因沙赫特事件而暴露的缺點的實際措施的報告發表演說。約·維·斯大林被全會選入關於這一問題的決議最後修訂委員會。

四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做「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的報告。

四月三十日

爲慶祝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科斯特羅馬市弗·伊·列寧紀念像揭幕，約·維·斯大林向科斯特羅馬工人致賀電。

五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五一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五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接見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代表團。

約·維·斯大林和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金屬工業總局局長談金屬工業的改造問題。

五月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

五月二十六日

爲紀念「青年團真理報」創刊三周年，約·維·斯大林向該報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青年團真理報」第一二二號上發表。

五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慶祝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成立十周年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一二二號上發表。

年表

五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的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

約·維·斯大林和紅色教授學院、共產主義科學院、維·米·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談糧食戰綫上的情況。

五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接見聯共（布）土拉、斯摩稜斯克、雅羅斯拉夫里和弗拉基米爾等省省委書記。

六月八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共產主義科學院黨建組組員評論斯列普柯夫論自我批評的提綱。

六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列寧和聯合中農問題（答斯·同志）」一文。這篇文章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真理報」第一五一號上發表。

六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寫「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答弗魯姆金）（關於弗魯姆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的來信）」。

六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的「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一文在「真理報」第一四六號上發表。

七月四日至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七月五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發表「論共產國際綱領」的演說。

七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發表「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的演說。

七月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發表「論工業結合和國營農場」的演說。

七月十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列寧格勒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做「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總結」的報告。

七月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爲「國防周」寫的「給列寧格勒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協會」的信在列寧格勒「紅色報」第一六三號上發表。

七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爲代表大會主席團委員。

約·維·斯大林參加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的聯共(布)代表團的會議並被選入代表團核心小組。

七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入共產國際綱領起草委員會。

七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入草擬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任務的提綱的政治委員會。

八月三十一日  
約·維·斯大林寫信給瓦·弗·古比雪夫。

九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會議上被選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九月三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會議上被選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十月九日  
「真理報」第二三五號發表約·維·斯大林寫的「悼念伊·伊·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同志」的悼詞。

十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伊·伊·斯克沃爾佐夫「斯切潘諾夫的葬禮」。

十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發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的演說。

十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答什·同志」。

約·維·斯大林接見鐵路工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十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爲慶祝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十周年「致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五二號上發表。

十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接見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大學生中央常務局的代表。

十一月六日

約·維·斯大林出席莫斯科蘇維埃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十一周年的慶祝大會。

十一月七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慶祝典禮，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勞動者的遊行隊伍。

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  
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主持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十一月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紀念女工和農婦第一次代表大會十周年」的祝詞在「真理報」第二六七號上發表。

十一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發表「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演說。

十一月二十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被選入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蘇聯國民經濟控制數字決議修訂委員會。

十一月二十五日

約·維·斯大林爲祝賀斯摩稜斯克省「綠軸」工廠和雅爾采沃工廠的工人組織更好地進行蘇維埃選舉運動的競賽寫給他們的信在「真理報」第二七四號上發表。

十一月二十六日

約·維·斯大林接見聯共（布）莫斯科市組織的區委書記。

十一月二十七日

約·維·斯大林接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人員。

十一月二十九日

爲慶祝別日察市「紅色工會國際」工廠的工人進行蘇維埃選舉運動，約·維·斯大林向他們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真理報」第二七八號上發表。

十二月四日

約·維·斯大林和工農通訊員代表團談話。

十二月九日

約·維·斯大林慶祝伏龍芝軍事學院成立十周年的賀電在「真理報」第二八六號上發表。

十二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和「消息報」工作人員談話。

十二月十九日

約·維·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上發表「論德國共產黨內的右傾危險」的演說。

約·維·斯大林和科米區域的領導工作人員談區域劃分問題。

十二月二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寫「答庫什特謝夫」。

## 一九二九年

一月底和二月初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發表「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的演說。

二月二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答比里·別洛策爾柯夫斯基」。

爲慶祝「紅三角」工廠改行七小時工作制，約·維·斯大林向該廠男女工人致賀電。賀電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列寧格勒真理報」第二十八號上發表。

二月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和烏克蘭作家代表團談話。

二月二十二日

約·維·斯大林電賀普羅斯庫羅夫城第一紅色哥薩克團的紅軍戰士、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慶祝紅軍建軍十一周年。

三月一日

約·維·斯大林慶賀「農業報」創刊的祝詞在該報創刊號上發表。

三月十四日

約·維·斯大林在聯共（布）列寧格勒區域第二次代表會議上被選爲聯共（布）列寧格勒區域委員會委員。

三月十八日

約·維·斯大林寫完「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答梅什柯夫、柯瓦里楚克及其他同志）」。

三月三十日

約·維·斯大林參加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蘇聯人民委員會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聯合舉行的祝賀米·伊·加里寧就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十周年的慶祝大會。